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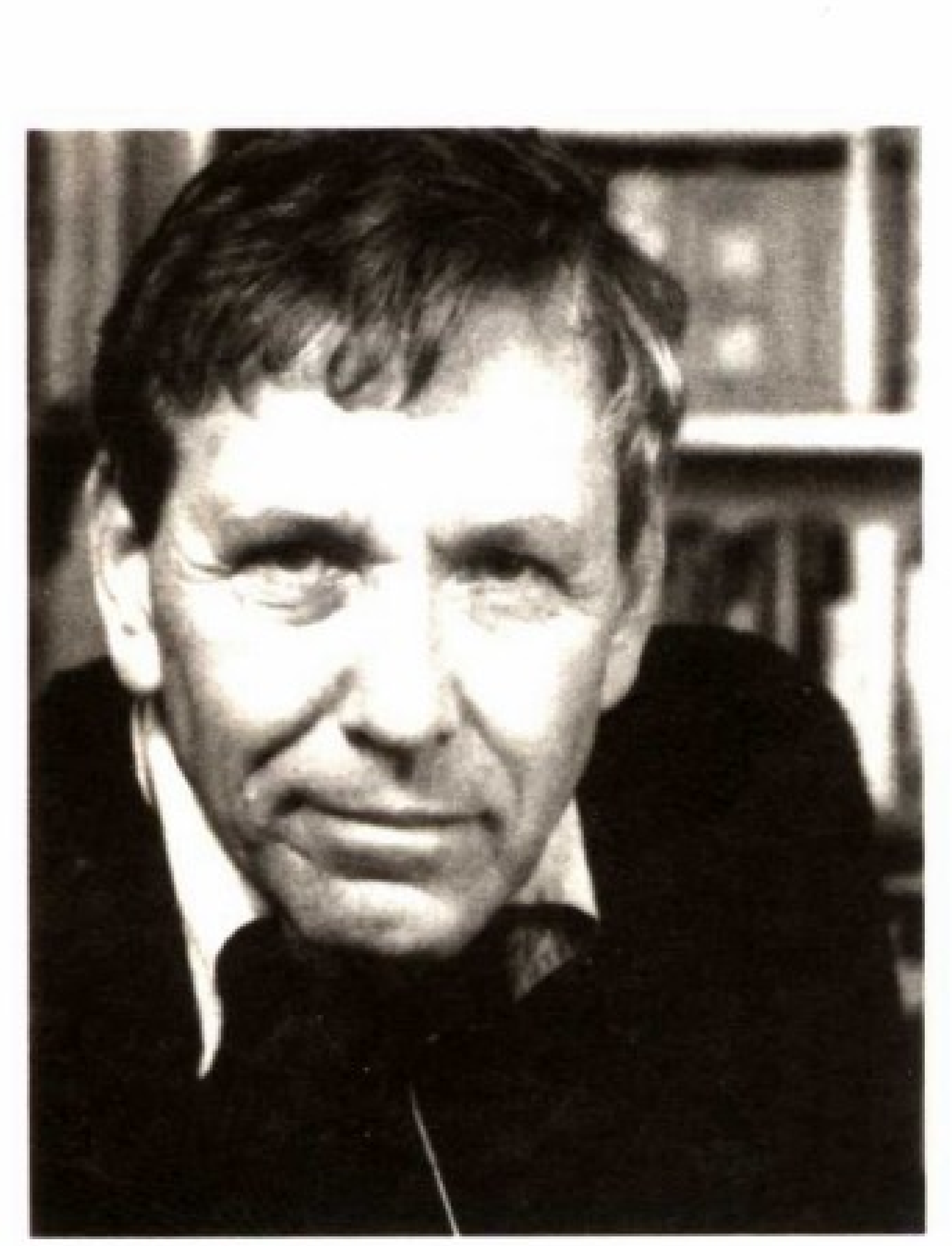
莫称之为夜晚

〔以〕阿莫斯·奥兹著　庄焰译

当代以色列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2005年歌德文化奖得主

奥兹的魅力在于充满诗意的语言，星光灿烂、寂寞凄清的沙漠之夜和情人间没有硝烟的战场令人唏嘘慨叹；更在于从这细微琐碎的生活中折射出的复杂历史，那才是真正惊心动魄之处。

万语文化



Amos Oz

中年的西奥和诺娅没有孩子，但并不缺乏激情。他们在南美相遇，热恋之后已经生活在一起八年。西奥是一个半退休的市镇规划家，厌世而抵御外界。诺娅是教师，比西奥小十五岁，渴望变化和目标。他们的关系因为诺娅的学生伊曼纽尔的神秘、或许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事件而突然陷入危机。一个关于压抑的野心与爱情的故事，苦涩而温柔——阿莫斯·奥兹用温和的幽默，以及对一对中年恋人关系的剖析带出了沙漠小镇里天翻地覆的阴谋。

《星期日邮报》：『奥兹描绘了一个以色列小镇……将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变化谱成一部饱含人性的交响诗。奥兹对细节的敏锐令人羡慕，但让他名列国际一流大师之列的是他的宽宏大度。』

《纽约时报书评》：『饱满而充满隐喻的天才之笔。根基便是这位作家对人类生命富含洞察力、创造性、宽容而关怀的叙述。』

《星期日电讯报》：『奥兹对地域的感觉让人想起福克纳。他像托尔斯泰一样追求完美，他笔下那些倒运、腐化的主人公令人联想到贝娄，但他们广阔的感情疆土以及被小事纠缠的特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

《卫报》：『奥兹具有启示性的天才，能够将以色列复杂的历史融入最卑微的家庭生活中表现出来……一部杰作！』

《观察家》：『很久以来我读到的最好的书……是奥兹迄今为止最有诗意的小说。』

ISBN 7-5442-2714-6




ISBN 7-5442-2714-6
定价：20.00元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莫称之为夜晚

〔以〕阿莫斯·奥兹著　庄焰译

南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4-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称之为夜晚/(以)奥兹著;庄焰译.一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4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ISBN 7-5442-2714-6

Ⅰ.莫... Ⅱ.①奥...②庄... Ⅲ.长篇小说一以色列一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9350号

MO CHENG ZHI WEI YEWAN
莫 称 之 为 夜 晚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作　　者: 〔以〕阿莫斯·奥兹
译　　者: 庄 焰
策　　划: 万语文化
责任编辑: 杨 雯
特约编辑: 任余白
装帧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65千字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14-6
定　　价: 20.00元

阿莫斯·奥兹(1939-)，以色列文坛最富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也是最具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生于耶路撒冷，14岁开始在以色列集体农场生活。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主攻哲学和文学。后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现居坐落于以色列南方沙漠中的小城阿拉德，是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

奥兹迄今已发表了十一部长篇小说：《或许在他方》(1966，中译本《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1968)、《触摸水，触摸风》(1973)、《完美的和平》(1982)、《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第三种状态》(1991，英文版1993)、《莫称之为夜晚》(1994)、《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一样的海》(1998)、《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一直到死》(1971)、《鬼使山庄》(1976)；杂文、随笔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黎巴嫩斜坡》(1987)、《天国的沉默》(1993)、《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和平》(1994)、《故事开始了》(2000)；儿童文学作品：《索姆哈伊》(1978)等。

左派的奥兹强调要理智地认识以色列历史和政治。作为1977年开始的以色列『今日和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批评文章和政治活动使他成为以色列令人瞩目的重要人物。作为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深深扎根于他祖国跌宕不宁的历史中。在他的小说和纪实文学中都可以看到一条细察人性的主线，反映人性的脆弱却又尊重人性的多样性，将以色列动荡的政治和宗教风景展现给世界。《新闻周刊》评价他时说道：『奥兹是那样雄辩，富含人性关怀，甚至稍有宗教色彩。一个复杂的人，朴素庄重，为了真理不惜得罪任何人。』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欧美世界影响很大，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

奥兹曾获法国『文艺长官』称号。1992年获法兰克福和平奖。1997年，为表彰他的文学贡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授予奥兹名誉博士学位。1998年以色列建国50周年之际获得以色列国家奖。2004年，奥兹的新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一经在法国问世，便获大奖；2005年8月28日，值德国文学巨匠歌德生日之际，奥兹又从德国法兰克福市长手里接受了著名的歌德文化奖。歌德文化奖创立于1927年，是欧洲颇富盛名的一个奖项，每三年颁发一次，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作家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均是此奖得主。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权威性 时代性 经典性

我们需要一场告别上个世纪传统经典的新名著阅读运动

[日本] 大江健三郎 《愁容童子》《我在暧昧的日本》

[美国] 托妮·莫瑞森 《柏油孩子》《最蓝的眼睛》

[美国] 苏珊·桑塔格 《中国旅行计划》《沉默的美学》

[美国] 奥利弗·萨克斯 《苏醒》《单腿站立》

[意大利] 阿利桑德罗·巴里科 《海上钢琴师》《用吉他射击的人》

[中国] 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

[英国] 汤姆·斯托帕 《乌托邦彼岸》《戏谑》

[西班牙] 罗莎·蒙特罗 《地狱中心》《女性小传》

[俄罗斯] 弗拉季米尔·马卡宁 《先驱者》《透气孔》

[墨西哥] 塞尔西奥·皮托尔 《夫妻生活》《逃亡的艺术》

[以色列] 阿莫斯·奥兹 《鬼使山庄》《莫称之为夜晚》

[埃及] 哲迈勒·黑托尼 《落日的呼唤》《宰阿法拉尼区奇案》

媒体协助：腾讯网 www.qq.com

● 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

——为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而作（代总序）

陈众议

◎缘起

这套丛书是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的一个分号。它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一次学术访问。那是2000年9月，大江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北京。这是1949年以来应邀来华访问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用作家徐坤的话说，“他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彰显”。这显然是参照二十世纪初泰戈尔访华所留下的无形遗产而言的。大江先生在北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莫言，并与王蒙、铁凝、余华、阎连科、徐坤等中国同行及社科院的学者和领导进行了亲切交谈并有感而发，提出了在中国举办“世界文学论坛”的动议。

这套丛书便是这一动议的见证。

◎意义

人类以并不乐观的状态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政治利益引发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然而，相信正义、博爱与和平的人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热忱进行着消解冲突的努力。本丛书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明证。

丛书为世界著名作家和中国读者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友好交流的平台。他们的著述将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文化不同于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它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小到一个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某种共同的习性；这种习性，可以抽象为世界观，也可以具体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嗜好。总之，它是以有别于他人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的共性。正因为这种特殊性，而且又是后天的，所以才有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互补的必要和可能。实际上，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交流是为了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而非倾轧或取代。

事实上，世界文化正是在相互了解、求同存异中不断演化、进步并形成今天这种大自然般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多彩局面的。无论情愿与否，这种局面已经形成。我们希望它的未来没有血腥，而是不同文化友好交流、健康演化、取长补短、自我完善的过程。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又注定要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如何保护和发展人类文化生态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耀眼明珠，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形象反映，是各民族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意志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而恩格斯则认为，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人不可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却可以通过文学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文学历来并将永远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理解的桥梁。

作为编译者，我们将努力使丛书成为文学的盛宴、和平的盛宴。盛宴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近二十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它将使我国读者感同身受地了解一批世界著名作家、文化名人及其斑斓的世界和关怀，而且对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将不无裨益。

◎基数：为了拿来的甄别

话说有个印第安人居住在深山老林。一天，他有幸来到遥远的海边，看到集市上到处都在买卖舢板。于是，他也掏钱买了一条。他历尽千辛万苦把舢板带回家中，并学着海边人家的样儿把它供在房屋顶上；只不过别人屋顶上的舢板都是底儿朝天的，而他的舢板却仰面躺着。不久，天降大雨，盛满雨水的舢板压坍了房屋……这是一则古老的寓言，意思是别人的宝贝对自己未必有用，稍有不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面对多元的花花世界，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难说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编译眼前这样一套体现多元文化的丛书有助于我们处理认知和估价、传承与创新、借鉴与自主、向背与审美的复杂关系。马克思关于席勒化的说法众所周知。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席勒的依据。马克思除了尊称席勒为“市民天性”的权威裁判，还援引席勒名言，谓“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事实上，认识观和价值观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同样，进步和审美或者革命和美感，也是不可以划等号的。以马克思为例，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价值观而影响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之，也不因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知而动摇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而且为推翻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制度尽心竭力，但是他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他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吗？然而，马克思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趋势而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则进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的正确：意识对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与此同时，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课题。以二十世纪而论，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后”宏大理论的自话自说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中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借袁可嘉先生的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玩弄技巧的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了江湖艺人的把势。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然而，古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故事情节（或谓“稗官野史”），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的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的策源地（是谓“文史一家”）。其中如《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触龙说赵太后》、《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及《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等众多美妙的段子，其实都可以视作最初的小说，具有小说的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的轻忽，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甚晚。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二十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及小说史研究也是后来的事，但古希腊人对“类小说”的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然露出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的态度，其实已经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小说（情节）的重

视。亚里士多德视情节为文学的首要问题，认为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因此，《诗学》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章节是有关情节的。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过去的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的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称“国王死了，两年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深爱着他的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诠释。倘使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故事是两个世仇家族子女的爱情悲剧，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戏剧、小说甚至史诗一直是精华要素，因而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主题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和凸现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中，主题是自然显露甚至深藏不露的。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是那样的淡然，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而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还是帕里斯，个个都是英雄。是非、善恶等价值取向尚不在诗人（或行吟诗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中。古希腊悲剧也是如此。我们的先人却不然。他们处理文史的方式似乎比较老到。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原因，固然在其修史记事的抱负，但《艺文类聚》中《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和褒贬印证了他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倒确是“早熟的民族”。如今，当主题愈来愈成为诗人、作家首先考虑或急于张扬的要素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崇尚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首先，浪漫主义文学是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认为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因具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获得生命。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

了某些故事套路甚至于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然没有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表现意志、宣扬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时代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自然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他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考是对人类社会，也是对肉体与灵魂这对冤家矛盾的昭示。灵与肉、“道”与“器”，人类缺其一便不成其为人类。曲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不可或缺。然而，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做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璇玑。虽然从文学创新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西方，最早关注和凸现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并没有因为强调主题而忽视情节。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莎士比亚还是在塞万提斯那里，情节依然是文学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受众的欢迎，他们一度受到经院作家的轻视，被冠以“通俗”。马克思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他像一位双脚踏入河床的巨人，在感受河水鲜活翻腾的同时，俯瞰人类文明之流从远古奔向未来。而他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我假定的这个 X（两条曲线）的交汇点。在这里，情节和主题是那么和谐、那么水乳交融。新鲜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和北欧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生成为美妙的情节。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富有力度，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高扬的批判意识和价值取

向（或谓主题思想）背后，则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现代建筑师般的精确图景。用昆德拉的话说，这些精确的图景、过细的谋划使原本相对自由的小说创作形式改变了方向。再后来是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或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以及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赤裸裸的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鲜明表征，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总之，比起我们过去总结的现代主义成因种种（如科技进步对形式变化或技巧翻新、世界大战对文学宣言或先锋思潮，等等），跨国公司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更具有说服力吗？无论接受美学如何重视读者（其实这里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人），无论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毫无时代意义（借镜作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以金庸、琼瑶作品为代表）如何受到欢迎，无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审美、认知、现实意义的所谓“通俗文学”（如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怎样顽强地存活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都不能改变情节＋主题——两条曲线所组成的这一个 X。

然而，一如马克思，我们不该因为文学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呈现出这样那样的规律而放弃人文应有的作用与反作用。何况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复杂社会中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为了拿来的甄别、为了借鉴的认知，即给读者一个基数，一个几经筛选的基数，一个尽量多元、多维的空间，既有西方和东方，也有新交和故人（如笔耕正健的大江先生和刚刚仙逝的桑塔格）；既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赓续，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复归。

总之，我们以最简捷、也最深刻的方法请来了这十余位作家。希望读者在这一文学的盛宴中得到最大的欢愉和启迪。

● 中国梦与翘首期盼的中国行

——我所熟悉的阿莫斯·奥兹

钟志清

在整个生活与思维空间为撰写博士论文占满之际，为即将付梓的两卷本阿莫斯·奥兹作品集作序让我有些感到不堪重负，这主要是因为身为博士候选人，在难获文科博士学位国家之一的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系读书，难免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压力，但是，出于对辛苦筹备世界作家大会的社科院外文所同人和译者履行承诺的义务，我又无法推却，于是提笔与读者共话日渐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所喜爱的以色列优秀作家阿莫斯·奥兹及其创作，结果，竟在暗夜行路中感受到某种愉悦。

阿莫斯·奥兹是是目前以色列文坛最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之一，也是最具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迄今已发表了十一部长篇小说《或许在他方》(1966，中译本《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1968)、《触摸水，触摸风》(1973)、《完美的和平》(1982)、《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第三种状态》(1991，英文版 1993)、《莫称之为夜晚》(1994)、《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一样的海》(1998)、《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一直到死》(1971)、《鬼使山庄》(1976)；杂文、随笔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黎巴嫩斜坡》(1987)、《天国的沉默》(1993)、《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和平》(1994)《故事开始了》(2000)；儿童文学作品《索姆哈伊》(1978) 等。

奥兹 1939 年生于耶路撒冷，父母在排犹声浪在欧洲四起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分别从俄国和波兰移民到当时的巴勒斯坦。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博学多才，嗜书如命，懂十几门语言，

一心向往做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范尼娅漂亮贤惠，多愁善感。奥兹在英国统辖下的耶路撒冷度过了充满幻想的童年时代，他在回忆自己童年经历时曾经说："父母将我送到一座希伯来基础小学，学校教我缅怀古代以色列王国的辉煌，并且希望它在烈火与热血中复兴。"在那个喧嚣躁动、英雄神话与日常生活混为一谈的时代，奥兹的理想是"做一个英雄"。

十二岁那年，母亲不堪忍受缺乏色彩的生活自杀身亡。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奥兹童年时代的美好梦想，而且对他心理意识的形成及日后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兹本来就和父亲经常发生争执，母亲故去后，他对家庭的反叛意识愈来愈强。十四岁那年，奥兹离家投身到胡尔达基布兹，并把自己的姓氏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在那个颇带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世界中，开始了创作生涯。后来，基布兹将奥兹保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学位，毕业后到基布兹任教。功成名就后，奥兹又获得机会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1997 年，为表彰他的文学贡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授予奥兹名誉博士学位。奥兹现居住在坐落在南方沙漠中的小城阿拉德，是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

奥兹自幼受家庭影响，阅读了大量希伯来语经典作家及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表现出出色的文学天赋。在希伯来传统文学中，奥兹酷爱《旧约》中优美、简洁、凝练、具有很强张力的语词，他一直试图在创作中保留住这种传统。此外，奥兹对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和布伦纳、别季切夫斯基等现当代希伯来文学大家备加推崇。阿格农小说中娓娓动人的叙述方式，使奥兹深受启迪，他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展现出当代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与喜怒哀乐。而且，欧美文学、俄苏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一批小说家如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作品，对奥兹影响弥深。他描写恐惧、负疚、罪与罚及诸多非正常思维状态下的人类情感，把一个个复杂而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原形人物托到读者面前。他像许多现代作家一样，喜欢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其作品意象深邃，词汇意义丰富，具有许多层面。作为"新浪潮文学"

创作中杰出的代表，他把笔锋伸进玄妙莫测、富有神秘色彩的家庭生活，引导读者一步步向着当代以色列家庭生活内核切近，窥视到当代以色列人生活的本真和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其文本背景多置于富有历史感的古城耶路撒冷和风格独特的基布兹，展示出以色列人特有的社会风貌与世俗人情，突现茫茫无垠的内盖夫沙漠、风雨中飘摇不定的耶路撒冷古城、狂热冲动的基布兹社会、沐浴在文明之光下的特拉维夫等别具一格的以色列自然风光，形成典型而突出的以色列特色。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欧美世界影响很大，被翻译成 30 多种文字，曾在许多国家获多种文学奖，其中包括 1998 年以色列建国 50 周年之际颁发的以色列国家奖。2004 年，奥兹的新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一经在法国问世，便获大奖；2005 年又在德国获得“歌德文化奖”。

令奥兹在以色列名噪一时并奠定其国际地位的作品是发表于 1968 年的《我的米海尔》。小说采用女性话语，丰富地表达出女性意识和女性心理特征，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该书用第一人称形式写成，通过女主人公汉娜的眼光观察世界，感受人生。汉娜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新女性，自幼想嫁给一个举世闻名的学者。在一见钟情的情况下，同希伯来大学地质系大学生米海尔结为伉俪。米海尔虽然称不上才华盖世，但却勤勉用功。由于生活压力、性格差异、对家庭幸福概念的不同理解、汉娜本人的心理障碍与性格弱点等诸多原因，这对年轻人之间逐渐产生裂痕。汉娜不禁失望、痛苦、歇斯底里，终日沉湎于对旧事的追忆，在遐想的孤独世界里尽情宣泄着自己被压抑的期待和欲望。到小说结尾，已明显暗示出汉娜会自杀。《我的米海尔》所开创的“婚姻悲剧”或者说“家庭悲剧”模式在奥兹日后创作的《黑匣子》、《了解女人》、《莫称之为夜晚》等几部长篇小说中得以沿袭并创新，在以色列文坛别立一宗。

《莫称之为夜晚》的中心主人公西奥和诺娅是没有结婚但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一对情侣。诺娅比西奥年轻 15 岁，他们在富有异国情调的中美大陆相识，西奥放弃了当时一份比较重要的工作，追随自己的梦中情人诺娅来到令他神往的以色列，住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小城泰勒凯达尔。年逾花甲的西奥在

自己的国家从事小镇规划工作，不缺乏荣誉，但缺乏工作意义。诺娅则在中学教英语文学。同奥兹以往的家庭小说相比，西奥与诺娅似乎显得更加不满于现状。造成二人心灵隔阂与关系淡漠的原因不在于年龄差距，而在于生活志趣与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和生活环境的逼仄。居住在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沙漠小镇，缺乏娱乐与消闲机会，这种没有距离没有新意的生活让长期厮守的情侣互相产生不满与厌倦。曾经身为战争英雄的西奥在只有风卷沙尘但没有激情火花的生存境况中感到失望，性格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苟且顺从。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使得精力充沛、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诺娅心生怨愤，进而加剧了自己对没有孩子的夫妻生活产生不满，有时竟然借和同事发生性关系来弥补心灵的空虚，后来逐渐将兴趣转移到帮助从俄罗斯移民来到以色列的音乐家开拓事业上。

按照奥兹的创作习惯，他不会像当今年轻作家那样仅将笔锋滞留在情侣二人世界空间内，作品所展示的意义远远超过情爱悲剧本身。小说中透视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色列社会所面临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边缘话语与主体意识、欧洲非洲中东文化碰撞的冲突与悖论，而这一切，则借助于沙漠边缘小镇这一空间场景象征性地体现出来。

此外，小说的语言富有诗意美，掩卷之后，星光灿烂、寂寞凄清的沙漠之夜和情人间没有硝烟的战场依旧会徘徊在你的脑海，令人唏嘘慨叹。这大概就是奥兹作品的内在魅力之所在吧。

《鬼使山庄》由三个凄美动人、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组成，曾在以色列获“比亚利克奖”。三个短篇小说的背景均置于耶路撒冷古城的郊区，第一个短篇小说《鬼使山庄》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主要人物“父亲”汉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移民巴勒斯坦，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与幻想，岁月荏苒，他在巴勒斯坦娶妻生子。小说开卷，正值英国在巴勒斯坦统治即将结束的前夜，从医的“父亲”在看电影时抢救了英国高级官员那突然昏厥的嫂子，故而收到一张带有感激色彩的烫金请柬，携家眷出席在高级官员官邸举行的五月舞会。不料，这次富有戏剧性的舞会竟然悲剧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那位来自华沙、总是抱怨生活的漂亮太太在舞会上在一向有射香猎

艳老手之称的瑟阿兰将军的怀抱中沉醉，从此一去不归。他孤零零地一个人回家去与幼子希勒尔共度余生。小说中的"父亲"和同辈人虽然怀有复国梦想，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创立辉煌的业绩，甚至没有意识到国家即将独立这一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悄然逼近。

希勒尔在第二个短篇小说《列维先生》中显然更名为尤里，成为小说的叙述人。邻居是位来自立陶宛的老诗人内哈姆金，终日参照《圣经》的描述和其他资料，用废火柴建构圣殿模型。"这个工程已经进行多年了，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却遥遥无期"。内哈姆金的儿子暗中从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地下抗英活动，尤里的父母以及到小说末尾才出现的列维先生似乎均与这一活动有牵连，至少知晓其中奥妙。但他们却在瞒着小主人公，小主人公便在观望成人世界中享受童年的快乐，在不断的自我认知中走向成熟。

第三个短篇小说题为《思念》，采用的是类似长篇小说《黑匣子》的书信体布局方式。叙述主人公伊曼纽尔－纳斯博姆医生身患绝症，在平静与绝望中开始"生命的最后冲刺"。并连续给弃他而去远赴美国的妻子一封接一封地写信。透过人在生命尽头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写真，我们所了解的并非限于家庭生活与夫妻情感，更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色列建国前夕巴勒斯坦地区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和因欧洲难民涌入而日渐复杂的生活场景。纳斯博姆与妻子米娜两人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然而纳斯博姆性格犹豫不决，即使他想做一件事，也总要怀疑自己的动机，他的微笑中常常带着困惑。而妻子米娜则尖刻、果断，几乎视罕有的妥协为生死攸关的大事。《我的米海尔》所探及的"误会结合"、"失败婚姻"这一带有某种永恒色彩的主题模式再次出现。与《我的米海尔》不同的是，男主人公在弥留之际依旧怀恋旧日温情，流露出对妻子的强烈爱恋。同时，对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拓荒者那"默默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出无限的崇敬。

文如心声，作为一个目睹以色列建立并同她一起成长的希伯来语作家，奥兹不仅借主人公之口抒发出自己强烈的爱国之志，同时也表达出以色列左翼作家对和平的强烈渴望。用主人公的话说，即使能够赢得胜利，战争仍然是种可怕的事。我们要设法避免战争。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色列知识阶

层的形象的化身，渗透着作家的政治理想。数十年后的今天咀嚼奥兹作品，反观以色列现实，仍然会令读者产生无尽的回味与思考。

我国对奥兹的介绍，始于短篇小说。自1998年以来，译林出版社独具眼光购买了奥兹作品的五部版权，在中国学术界、创作界与普通读者当中引起反响。池莉、徐坤以女作家特有的品位，对奥兹的《我的米海尔》表现出强烈认同，池莉甚至不止一次谈及奥兹简约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对她本人的震撼及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我想这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奥兹在中国读者群体中所获得的可喜成功。2004年，台湾一家出版社又从译林出版社购买了《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的一部分版权，出版《我的米海尔》和《了解女人》的中文繁体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也在2004年将《黑匣子》的中译本推向市场，在纯文学作品中卖势甚好。从这个势头上看，相信即将出版的《莫称之为夜晚》、《鬼使山庄》两部如泣如诉的优美之作定会取得理想的读者效应。

之所以将序言题目拟为《中国梦与翘首期盼的中国行》实际上是在记载一段真实而感人的经历或者说故事。早在1996年，我在特拉维夫大学首次与奥兹见面并交谈时，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学，尽管他的父亲能讲十几门语言，却始终没有攻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奥兹本人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渴望认知与了解中国，在他看来，中文和希伯来文都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两种语言都留下了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创作，双方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有许多地方需要互相了解。他曾经将自己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这一普通事件诗意化，称之为“从亚洲最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坐落于同一大陆上的东方大国去旅行”，“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之桥”，“在两种文化间进行私人交谈”。并且，试图求得与中国读者心灵上的贴近与沟通，他说，“现代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尽管差别很大，但我相信，我们在家庭生活的组合、家庭生活的温情、家庭生活的深处等方面有共同之处：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与情感通常带有普遍性。我不但希望我的小说在富有人情味上让中国读者觉得亲切，而且要在战争与和平、古老身份与全方位变化、深邃的精神传统以及变革与重建文化的

强烈愿望方面唤起人们对现代以色列状况的特殊兴趣。”

他曾将自己的中国心结比做“中国梦”。但由于创作累身，教务繁忙，加上以色列大学严格的规章制度，奥兹不得不多次婉拒以色列外交部和作家协会等部门向他发出的访问中国的邀请，他的“中国梦”始终没有化作现实。为实现这一梦想，奥兹于2002年便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准备到北京参加外文所主办的世界文学论坛大会，并为此特意推迟了自己的欧洲之行。遗憾的是，会议两度延期，奥兹的中国行亦在翘首殷殷期盼之中。

2004年5月9日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

● 内容简介

中年的西奥和诺娅没有孩子，但并不缺乏激情。他们在南美相遇，热恋之后已经生活在一起八年。西奥是一个设计理念曾经饱受争议的半退休的市镇规划家，厌世而抵御外界。诺娅是教师，比西奥小十五岁，渴望变化和目标。他们的关系因为诺娅的学生伊曼纽尔的神秘、或许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事件而突然陷入危机。当诺娅卷入纪念那个男孩的社区计划之后，她和西奥之间的平衡开始动摇。

故事发生在沙漠边上的一座新城里，给我们展现出两个人对同一事件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看法：西奥是热切却有点愤世嫉俗、冷嘲热讽，诺娅则缺乏耐性而理想主义。男孩的死亡之谜以他俩的未来在边远沙漠小镇形形色色倒运、夸张的角色——令人费解但印象深刻、讲述了一个关于弃儿猩猩的奇怪故事的伊曼纽尔的父亲；纵欲的丑角穆奇；永远的捍卫者路德米尔；乐观的离婚女子琳达；强悍的市长巴特希瓦；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的常客们；还有伊曼纽尔的那条赖皮、垂耳狗——的衬托下渐渐清晰。

阿莫斯·奥兹用充满恬淡和智慧特色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从未得以舒展开来的压抑的野心和爱的苦涩而温柔的故事——他用温和的幽默，以及对一对恋人关系关怀的剖析带出了小镇里天翻地覆的阴谋。

晚上七点钟，他坐在二楼公寓的阳台上，看着日光渐渐逝去，等待着。最后一抹光承诺了些什么，它又将传达些什么呢？

下面是个空院子，有一块草坪、几丛夹竹桃、一把长椅和一座荒了的九重葛凉亭。院子尽头的那道石墙勾勒出这片空地的轮廓，石头的颜色比院子更新、更浅——事实上，此刻围墙石头看起来甚至比原本的重量更轻了些。墙的那边立着两棵柏树。它们沐浴在晚间的光线中，是黑色的，缺少绿意。连绵的秃山那边，远处卧着沙漠，不时有一个灰色的旋涡卷曲成形，颤着、扭着向前拖几步，吹开了，沉寂下来。一会儿又会在别处重现。

天渐渐灰了。有几朵云静止不动，其中一朵微微映出落日的光辉。从这个阳台上看不到正在落山的太阳。一只鸟儿在院子尽头的石墙上发出激动的尖叫，仿佛发现了什么忍无可忍的事。你怎么样？

夜幕降临。城里四处的街灯渐次亮起，窗里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渐强的风带来营火和灰尘的味道。月光给紧邻的山丘戴上死一般的面罩，让它不再像山丘，倒像是弱音之后曲调中的一个音符。在他眼里这里仿佛是世界的尽头。他不介意自己身处世界尽头。他已经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从今开始他将等待。

他离开阳台，进屋，坐下，裸露的双腿放在茶几上，双臂从扶手椅两侧沉沉地垂下来，好像是被什么拽向凉爽的地板。没有打开电视，也不开灯。下面街上传来汽车轮胎轻轻碾过的声音，接着是一阵犬吠。不知是谁在听收音机，没有清晰的频率，只是若隐若现地简单重复着。他喜欢这种声音。楼里，电梯滑过他住的那一层，没有停。隔壁公寓里，一个女声在广播里念着

新闻，好像是外语，他拿不准。楼梯上一个男人说，那毫无可能。另一个声音答道，好啊，那你别走啦，会发生的。

冰箱的抽噎声静下来的时候能听到从干枯河床里传来的蟋蟀声，像是给寂静打的拍子。微风拂过窗帘，掠过架子上的报纸，穿过房间，搅乱屋里植物的叶片，从另一扇窗走了，又回到沙漠中去。他一时抱住了自己的肩膀。感受到的愉悦让他想起一个真正的城市里的夏夜，比如他曾经待过几天的哥本哈根。那里的夜晚不会突然降临，而是和缓地渐入佳境。曙光的面纱会持续三四个小时，仿佛夜晚努力延伸着，欲图触摸黎明。各式铃声响起，一声嘶哑的巨响，像是咳嗽声。融入夜晚天空的轻柔细雨汇进海峡、水道里的波纹。一辆明亮的街车从雨中穿过，空空的，他觉得自己仿佛看到年轻的女售票员在和司机聊天，她的手搭在司机手上，余下的又是细雨，仿佛夜晚的光亮不是穿越了细雨而是发自其中，整夜被池中的灯光照耀的小广场喷泉那静静的水束与雨滴相遇。一个褴褛的中年醉鬼坐在池边打盹，灰色的留着平头的脑袋沉在胸前，没穿袜子的脚裹在鞋里浸在水中，一动不动。

现在几点了？

他对着黑暗看了一下手表，但看到反着光的手表时却忘记了问题。这是否就是伤痛转化为悲哀这个渐渐颓落的过程的征兆？狗又吠起来，这次叫得狂暴猛烈，声音从后院或是空场里以及干枯河床的方向、甚至更远的黑暗中的山丘处传来，贝督因[①]牧羊犬和迷失的羔羊，渐渐地，吠声转为哀鸣，大约是嗅到了狐狸的气息，另一声哀鸣响起应和，透骨，绝望，仿佛是在哀悼着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就是一个夏夜里的沙漠，古老，冷漠，平静，无生无死，存在着。

透过阳台的玻璃门，越过院子尽头的石墙眼望山丘，他感觉到一阵感激之情，但为了什么他并不确定。他是真的在感谢山丘吗？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短小精悍，农民模样的宽脸盘，一副暗藏狡猾的多疑或是怀疑的表情。他有一头剪得很短的灰发和一把引人注目的花白胡子。无论在哪里，他占的空间都像是比自己身体所需的要大。他的左眼总是半闭着，不是使眼色的那

①贝督因（Bedouin），阿拉伯游牧民族，生活在中东沙漠地区，现逐渐定居城市中——译注。

种样子，而是像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小昆虫或是什么微小物体。他坐着，清醒至极，但瘫软无神，像是从沉睡中刚刚醒来。他觉得沙漠和黑暗之间宁静的联系十分宜人。这个晚上，让别人忙于找乐吧，忙于各种安排吧，忙于遗憾吧；至于他，他心满意足地认可此时此刻，丝毫不觉得空虚。他眼中，沙漠很好，月光作证。对面的窗中，三两颗星星在山丘上闪烁。他温和地宣布：现在你可以呼吸。

只有在暑热散开的晚上才能喘上几口气。又一个疯狂的日子过去了。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赶时间上了。从八点到一点四十五分是在学校：两小时的文学课，两小时批改入学考试的卷子，再花上一个小时给俄罗斯移民的孩子们，其实他们对“被放逐的神性”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堂课上，一个叫伊娜或者尼娜的漂亮小姑娘扯到了比亚利克①：她的词汇都与圣经相关，她从莱蒙托夫②那里得来的情感，她诗歌的年代错误。她继而又用俄语背起几行诗，可能是想例证一下她喜欢的诗歌类型。我打断了她。尽管我并不怎么喜欢这门课的主题，而且需要尽力克制自己才能不说出：让神性见鬼去吧。

十一点十五分课间休息时，我坐在读书室的空调旁边准备下一节课的内容，但马上就被叫到副校长办公室，见到一个被一位老教师的言语惹火了的年轻教师。我对双方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建议他们互相原谅并将此事遗忘。很奇妙，这样的老套路，特别是像原谅这样的词，只要用得时机得当、不偏不倚，就能引发泪水横流，导致停战。这样美丽的词汇能抚平伤害，大概是因为导致伤害的也是美丽的词汇。

我为了赶一个十二点十五分在工会会议室开的会省掉了午餐，只吃了一个新鲜的色拉三明治。我们想尝试激起人们对诊疗所计划的同情。广场空空如也，被阳光灼烧着。在花坛稀疏的迷迭香丛中站着一个头戴黑色贝雷帽、戴眼镜的矮胖移民，他像死过去一样静止地斜靠在锄头上。他头顶上的太阳被炽热的烟气围绕。一小时以后，四点钟时，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的律师

①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 1873－1934），犹太民族主义诗人，现代希伯来诗歌奠基人。生于俄国，1922年移民德国，两年后移居特拉维夫，1927年开始直至去世一直为希伯来作家联盟主席——译注。

②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俄国诗人——译注。

仑·阿贝尔从特拉维夫赶来，穿得像个被妈妈强行套上一身生意人行头的备受娇宠的孩子。我们和他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坐定，听他解释繁琐的资金问题。五点差一刻，我带他来见市财政官，我浑身汗津津的，腋窝开始泛酸，发出陌生女人的味道；从那儿出来以后又去找穆奇磋商，他许诺要写的一份备忘录还没有写出来，反而花了半个钟头叨唠他自己的事以及政府是如何的不得要领。他的T恤衫上印着一个叫“恶魔之泪”的新摇滚组合的花哨照片。接下来我又去了教育中心和广场上的药店，在关门前一刻钟赶到超市，还从取款机里取了点现金，又取了送去修理的熨斗。回家时天已经黑了，我已经被热度和疲惫拖垮，到家后看见他坐在起居室的扶手椅里，没开灯也没有声音。又一次静坐示威提醒我，他的孤独源于我的活跃。这都快成为有定式的仪式了。我，主要承担在我们十五岁的年龄差中的责难。他，不断地原谅我，因为他是那样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

他独自准备晚餐：你累了，诺娅，坐下，看看新闻。他做了一份洋葱炒蛋，搞出一盘几何图案的色拉，切了几片黑面包，和奶酪一起放在木餐板上，还有雕成玫瑰花蕾模样的小萝卜。然后等着我的赞叹，好像他是再次屈尊去点燃一个农奴小屋炉火的托尔斯泰伯爵。

新闻结束后他插上水壶，给我泡了草药茶，他在我头下、脚下各放了一个软垫，还放上一张唱片：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但当我拿起电话问穆奇·佩莱格他写的备忘录打好了没有，然后又打给路德米尔和琳达让他们为取得规划许可再做些准备时，他的大方耗尽了。他站起来收拾洗净了碗碟，然后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好像我有义务追过去似的。如果他不这样抗议的话我可能会洗个澡跑到他身边，告诉他发生的一切，问问他的建议。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确定自己一定会那么做。他在任你随波逐流的时候十分难以相处——他彻底明了我们这个计划的问题所在，以及我不该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一言不发、洗耳恭听、小心避免发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像个耐心的叔叔决心腾出珍贵的时间听小姑娘讲是什么惊吓了她的娃娃。

十点一刻，我冲过冷水澡，又冲了热水澡，然后瘫倒在自己的床上，试

图集中精力看一本关于上瘾的症状的书。隐约听到他屋里传出 BBC 的声音：全球广播。近来，他和隐居时的贝京[1]一样，也每晚都调频至伦敦。他是在追寻什么没有在这里公开的事件的新闻吗？还是在寻求不同的视角？或是利用广播与自己交谈？也许他只是在做睡觉的努力。他的失眠症渗透进我的睡眠，剥夺了我可能会有的几个好梦。

过了一会儿我已经累得无法坐直，当我摘下眼镜、熄灯、丢掉那本书时，还能听到走廊里他的裸足发出的如漏水般的声音。为了不打扰我，他毫无疑问是踮着脚尖的。再就是冰箱打开、龙头水流，还有关灯、锁门的声音。多年以来，他的秘密夜游总让我疑心公寓里闯进了陌生人。有时午夜时分我想我感到了他在门上的触摸，我累得几乎要向他的哀伤让步说"好吧"，然而他已经又踮着脚尖顺着走廊走掉了——他也许去了阳台，不开灯。他喜欢夏夜的阳台。然而也许什么也没发生，那些脚步声、门上的触摸、他那能穿越墙壁的哀伤。那些都可能仅仅是一团雾，因为我已经睡着了。我这一天很辛苦，明天放学后还要到穆奇·佩莱格那儿开个会，也许还得去一趟贝尔谢巴[2]，敲定规划许可的事。我必须睡好，明天得比今天更清醒。明天又是辛苦的一天。还有酷暑。还有时光飞逝的速度。

①贝京（Menachem Begin，1913－1992），生于波兰。1977 年起担任以色列第六任总理，因与埃及达成历史性的和解而与萨达特共获 1978 年诺贝尔和平奖。1979 年与埃及总统萨达特签署了戴维营和平协议，其中规定了西奈半岛的归属、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建立自治政权以及两国和平前景等问题。1983 年冬夫人谢世后辞去总理一职，直至去世一直隐居生活——译注。

②贝尔谢巴（Beersheba 或 Be' er Sheva），以色列南部内盖夫地区中心城市——译注。

这回它没有径直滑过墙的那一侧，升到上面一层去，而是伴着刺耳的刮擦声停了下来，接着门又关上，继续上行。冰凉、安静，一只壁虎，黑暗中石头般的眼睛，看着花昆虫在光线中扑扇飞舞，这就是我对她的感觉：她裙子的窸窣声响，她行动之前意志的脉冲，还有那行动本身，高跟鞋在电梯和公寓大门之间激起的传闻，开锁：一如既往，没有摸索，钥匙一下子插入锁孔。

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用最大流量讲着话，声音年轻而欢快，省略掉所有的句尾。她从公寓的这头穿到那头，把大厅、厨房、厕所和我头顶上起居室的灯逐一打开，身后留下一抹金银花的香气，途经之处点起一串电灯，仿佛照亮她降落的跑道。整个公寓眯起了眼睛，头晕目眩。

她到我身边，把购物篮、公文包和两个超载的塑料袋放在茶几上，问道：你干吗坐在黑暗里，西奥？然后自己回答道：你又睡着了，抱歉吵醒你了，其实你该感谢我，要不晚上你怎么睡得着？

她俯下身来，在我头上草草地印下一个同志式的亲吻，把我的光脚从茶几上拿下来。我以为她要在我身边坐下来，但是没有，她踢掉鞋子，猛地转过戴着蓝宝石、罩在浅色裙子里的身子，跳进厨房去了。回来时拿了两只盛了矿泉水的高脚玻璃杯说，渴死我了。喝掉水以后，她孩子气地用手背抹抹嘴说，有什么新闻？接着又跳起来打开电视，这才在我椅子的扶手上好好坐着待了一会儿，似乎靠着我但又没有真的靠过来，她把挡着眼睛的金发拢在两边，像是撑开一垂幕布，又说道，让我来告诉你我疯狂的一天吧。

她停顿下来。突然拍了一下额头，从我身边跳到另一张扶手椅中，说，抱歉，西奥，等我一分钟，我得马上打几个电话，你能做个色拉吗？从今天早上开始我除了一个三明治什么都没吃，已经快饿死了，我这儿只要一两分钟就好了，然后咱们聊。她把电话拉到腿弯处抱了一个钟头。一边聊天一边心不在焉地把我端过去的晚餐吞了下去，没有任何其他的暗示建议、感情表示或是简单的评价，只是在她允许通话对方辩护的那一点点时间里大嚼着食物。我注意到她好几次说道，实现它，你开玩笑，还有，上帝啊，来吧，别逗我了，以及太棒了，绝妙，双手把牢它。她的手比她身上其他部位都要苍老，手指像体力劳动者一样满是纹路，皮肤皱在一起，手背上布满纵横交错的蓝色血管和一块块色斑，看起来像一块土。仿佛她的真实年龄都被从身体里赶到了手上，在那里耐心地将颓败预先储备起来，以迎接衰弱。

然后，有二十分钟，可以听到浴室门里的喷水声和她年轻的声音在唱一首和红玫瑰、白玫瑰有关的老歌，接着就是吹风机和柜橱抽屉打开的声音。她终于清爽喷香地出来了，裹在一件浅蓝色棉质浴袍里，说道，我垮了，出局了，早上再聊吧。她说晚安，西奥，别生气，别熬夜，她看起来并不疲乏，柔软而动人，大腿充满活力，在浅色的浴袍下呼吸。接着她又说：多么疯狂的一天。她关上了身后的门。翻了几分钟书，轻笑起来，显然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段落。一刻钟以后她熄了灯。

她和往常一样，不记得把喷头开关拧紧。我在走廊里就能听见水流的声音。我过去把它拧到最紧。盖上牙膏盖，关上厕所灯，按照她的路线绕遍公寓，一盏一盏地关上所有的灯。

她有倒头便睡的天赋。像个讨人喜欢的小学生做完了功课，整理好书桌，梳了头，充满信心地确信一切正常，大家都对她满意，明天是新的一天。她安心舒适地对待自己，对待黑暗，对待院子尽头两棵茂盛的柏树那边的沙漠，以及包裹着她的床单和她熟睡时紧紧抱在胸前的绣花软垫。她的睡眠激起我的不平之感，或许只是单纯的嫉妒；盛怒之中，尽管我很清楚没道理发怒，但这并不能抚平我的恼怒，反而带来更多的烦闷。

我穿着汗衫坐在卧室的桌子前把频率调到伦敦。在新闻播报的间隙，有

个关于阿尔玛·马勒[1]生平与爱的小板块。主持人说男性世界难以理解她的内心，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人物，而非真实的她；然后就开始解释真实的阿尔玛·马勒。她说到一半我就不听了，示意她男性世界毫无进步。我赤着脚到厨房里去搜冰箱。喝了一两口冰水后，我被冰箱里发出的爱抚般的微光击中了。为了不失去它使得自己再次被甩在黑暗里，我给自己倒了点冰酒，又剥开一块三角形的奶酪。过了一会儿，我发觉自己在整理冰箱架子。我嗅了嗅已经打开的盒装牛奶，既怀疑牛奶又怀疑自己的嗅觉。我把一串颜色不对的香肠扔进垃圾桶，把酸奶按日期排成一行，往塑料格里摆满鸡蛋。对着一罐金枪鱼我稍有犹豫，但最后妥协了，给它蒙了一层保鲜膜。我从储藏柜里拿下来几瓶果汁，把它们塞进冰箱门以填补空隙。将装蔬菜的那一层清理整齐，又整理了装水果的那层。我努力克制才击退了进攻冰室的诱惑。我踮着脚尖走到她的房门口：如果你需要，我就在这儿。如果不，我至少还能抓到一丝她熟睡的气息；也许我能吸收一些她剩下来的睡眠。

从那里，到阳台，到那把褪了色的老式椅子。

夜几乎是透明的，整个世界沐浴在一片冷冷的银光之中，无声无息。两株柏树像是由玄武岩雕成，月亮般的山峦好似层层包裹在青冷如蜡的月光之中，影影绰绰的动物四处蜷卧，也是如月般的感觉。山谷里，阴影叠着阴影。有一只蝉，停下来时我才注意到。人们如何误解了阿尔玛·马勒、真实的她又是什么样的呢？即便这个问题真的有答案，我也已经错过了。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镶嵌在空洞里，理论上来说不可能有答案。眼前黑暗中荒瘠的山丘抹掉了问题中的“几乎可以肯定”或是“理论上来说不可能”以及空洞性，我知道你什么呢，诺娅，你又了解我什么呢？我还是停下来吧。倘若你体会到的我只是有时眼望沙漠时心境下的我。我又如何看你呢？比如：一个比我年轻十五岁的女人，和生命本质的脉搏同频，那种存在于言语、怀疑之前的原生的、富含节奏的脉搏。有时，毫无预谋的，她就触动了你的心灵，像幼兽或者雏鸟。

①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1879－1964），奥地利犹太裔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的妻子——译注。

多年以前我学会从星图上识路。那是在军队里，甚至更早，在青年活动中学到的本事。晴朗的夜晚，我还能辨认小熊星座和北斗星，也还认得出行星，但已经分不清哪个是木星、金星或者火星。在眼前的空寂中一切仿佛都凝住了，连行星都站住了，夜晚似乎就要这样持续到永恒。所有的星星像是楼上地板上的小孔，在天穹的彼岸闪烁。而一旦将幕布拉起，光辉便会湮没世界，万物清晰。

屋里有个很好的望远镜，在床头架子第二层左边。我可以进去拿出来看个清楚。好像是内海弥亚把从偷窥狂格罗沃依那里得来的望远镜留给了她，要么是给了她的表兄约什库。还有三四样这样的物件潜藏在屋里，别的都扔掉了。有一次在排队的时候她对我说，像他那么被娇宠坏了的人简直比穴居人都过分。不过她马上就打住了，从此再没提起过。即便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她也能有效地控制自己，还有我。她的脚总是坚定地踏着刹车板。我也很小心，我知道限度：好像玻璃杯相碰，要适可而止。

从东边，从山那边，吹来一股透人的沙漠之风，像一柄凉森森的镰刀。荒野在悄悄地呼吸，黑暗中的尘埃和石块仿佛是平静水面的延展。忽然地，凉爽下来了。将近午夜两点。我不累，但要摸黑回屋去，宽衣上床。伦敦广播将告诉我我们这里还不得而知的实况。今晚的全球动向？纳米比亚的部落纷争、孟加拉国的洪水、日本猛升的自杀率，接下来会是什么？等着瞧吧。接下来的是朋克音乐，残忍，尖锐，粗暴而嗜血，来自伦敦，周三凌晨两点一刻。

我早上六点醒来开始起草备忘录。穆奇·佩莱格会再看一遍，而琳达主动要求把它打出来。午餐时，我得把它交给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还得把备份给市长和财政官。还应该给谁？我必须找人讨个主意。也许我应该找一份政府规章彻底研究一下。我到底要不要问问西奥？那是他一直期待着的，像猎人一样。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承担不了这个挑战。他知道我跌了一两个跟头以后一定会径直跑向他。这会儿，他十分老练地不置一词，不加干涉。像一个允许蹒跚学步的小孩爬上爬下的大人，却在小孩看不见的地方时刻留心，伸着手，以防小孩掉下来。

备忘录的开头部分是“计划进展”。尽管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却想不出更合适的标题。我们的一个学生死于一起“服用毒品导致的”事故。教员休息室里萦绕着各种关于这个事件的相互矛盾的传言。我对这个出问题的男生很感兴趣，尽管我和他不过只有几句话的交情。伊曼纽尔·奥维埃托是个安静的学生。他是有三十个女生上的文学课里仅有的三名男生之一。近些年来羞涩的学生已经绝迹，学生们都变得在课间休息时吵闹不止，在上文学课的时候昏昏欲睡。疲惫，游离，一脸难以对付的瞧热闹般的蔑视，他们呆呆地瞪着福楼拜①和我，仿佛我们要卖给他们什么关于仙鹤和小孩的神话传说。但伊曼纽尔有些特别的气质，总让我联想到冬天。一次他没有按时交一篇关于阿格农②的作文，我在课间找到他询问原因。他垂下睫毛，好像听

①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小说家——译注。

②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1888－1970），以色列小说家。生于波兰，犹太望族后裔。1913 年前往德国研究德、法文学。1924 年定居耶路撒冷。他的小说多以犹太人小镇为背景，颂扬和传播犹太民族的灿烂文化。1966 年，阿格农因“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赞誉他是“现代希伯来文学的首要作家”——译注。

到了什么关于爱情的问题似的，然后温和地回答说因为那个题目和他本人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严厉地打断了他，谁说有什么关系了，我们现在说的是义务。他无言以对，我残忍地让他僵在那儿一分钟之久，才冷冷地说，就这样，一周之内交上来。

十天后他交上了作文。那是一篇分析合理、理解深刻的优秀作文。结尾一句后面他在括号里加了一句个人附言：尽管是义务，最后还是找到了些许自己和故事的关系。

有一次在楼梯上，我问他上课时为什么从来不举手，我肯定他是想发言的，我很想时常听到他的发言。这次他也是先停顿一下，才犹犹豫豫地说，他觉得词句是个圈套。前不久，我在课堂上说耶胡达·阿米亥[①]是想要表述他反战的思想，突然伊曼纽尔深思的声音如梦中呓语般响起来，语调上升，质疑道：不论诗人想说或是不想说什么，都挡了诗的道儿？

我决定要抽空和他聊聊。

但我没有抽出空来，我忘了，一直拖着。我负责三个班的课程外加两个文学小组，包括给新移民开的特别小组。每个班都差不多有四十人，人人一脸痛苦相。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现在都懒得费力气去记名字了。学生几乎都是女生，整个夏天穿着浅色的两边开衩的短裤晃来晃去；名字差不多都叫塔丽。实际上，每个班上都会有人不断纠正我，说我不是塔丽是塔尔，或者反过来。

事实上直到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对伊曼纽尔的了解还不如他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多：他从十岁起就住在特尔科达，和他在银行工作的独身姑妈住在一起，他母亲几年前死于奥林匹克劫机事件，他父亲在尼日利亚做军事顾问。教员休息室里的暧昧传言说这个男生爱上了一个比他大几岁、住在埃拉特[②]的姑娘，那个姑娘吸毒也许还贩毒。我在事故发生之前没太留意这个传闻，因为教员休息室里总是充满了各式流言。整个城市在这一点上也如出

①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以色列著名诗人。他在思想和语言上都有一个将希伯来文学现代化的构想。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引入了很多诸如“坦克”、“飞机”这样的词汇，及大量的新闻科技术语，以反映现代生活，对古老的极度书面化的希伯来语冲击很大。他的诗歌内容广泛，从欢笑到哭泣，从诅咒到自嘲。他的抒情主人公是独立的、完整的、带着集体经验的个人，通过自己的眼睛来公正、忠实地观察这个世界——译注。

②埃拉特（Elat），以色列南部港口，位于巴勒斯坦地区——译注。

一撇。

他从姑妈家失踪十天后，人们在埃拉特附近废弃的铜矿不远处找到了他。他从一个悬崖上跌了下来，或是自己跳下来的，摔断了脊骨瘫在悬崖底下，明显是熬了一天半夜才力竭而亡的。大家都希望他至少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一直清醒着的，但这一点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以前曾被带到过那里，也吸了毒，或者是被迫吸了，很可能是没禁得住诱惑。我试着不去听这些传闻，它们总是伴随着激动的声音、令人惊讶的伪善手势和高兴的神秘暗示：瞧，怎么叫死气沉沉的地方呢，瞧，我们都上了全国新闻了，真正的生活激昂也光顾这里了，来了个知名记者还有摄影师，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在外边转来转去，但行政人员规定任何人不得接受采访，所以我们只好回答无可奉告。

葬礼由于孩子父亲的姗姗来迟推迟了两次。几天以后孩子的姑妈也去世了，教员休息室里的谈话内容变成了：多么突然啊、内疚之情以及命运之手。我努力不去听这些嘀嘀咕咕的废话。实际上我在见到孩子的父亲之前就厌恶起他来了。一个缺席的父亲，一个在尼日利亚的军火贩子，多半会是满腹抱怨，可能会责怪我们。仅仅根据不多的这些与结论相连的线索，要做出远距离的判断十分困难。我设想这位父亲以前是个突击队员，成功、喜欢评判、自以为公正善良。于是我决心不和教员代表小组一起在葬礼前到科达饭店他的房间里去看望他。他来自非洲丛林，为了责怪我们造成的他儿子的可怕结局，终于屈尊来到这里，责问我们怎么会视而不见，为什么会忽视了，不可能全体教员都没在意吧？最后我还是去了，也许是因为想起了男孩站立的姿势，安静不紧张但扰乱人心，害羞，像是扎回到他自己世界的海底然后再浮上来，用耳语般的声音告诉我词句是个圈套。这句话里含有无声的求助信号，我没抓住或是抓到却忽视了。所以我拒绝承认或是意识到了又否认——如果我和伊曼纽尔谈过话，哪怕我努力靠近他，然后耸耸肩说甩掉包袱，卸下沉重，你瞎想之类的，结果可能会不同。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在男孩和姑妈的葬礼前几个小时去酒店他父亲的房间里见了阿弗拉翰·奥维埃托。于是引出了从那以后充满我生活的这件事。

还有那条狗的一段故事。伊曼纽尔·奥维埃托有一条狗，一只总和人保持距离的郁闷的家伙。从早晨到下课它都会卧在校门对面那片生长着、不如说是烂掉了的稀疏的撑柳林里，等着男孩。你要是向它扔石头，它便筋疲力尽地站起身，拖到几码外再趴下继续等待。不幸发生以后，这条狗开始每天早晨到教室来，完全无视它在走廊里掀起的混乱。它浑身疥癣，耷拉着耳朵，下垂的肌肉几乎拖到了布满灰尘的地板。在这些哀悼的日子里，没有人敢上去将它赶走或者逗弄它，以后也没人那样做。它整个上午都趴在那儿，那颗三角形的悲伤的头一动不动地放在前爪上。它的据点在教室的一个角落，字纸篓旁边。要是谁扔一个面卷或是意大利腊肠给它，它连闻也不闻一下。你跟它说话，它也没有反应。那令人同情的、棕色的、迷惑不解的神情让你不由得会调转头去看着别处。下课以后，它便夹着尾巴卑微地潜出学校，直至第二天早上八点上课铃响之前不见踪影。那是一条贝督因牧羊犬，周身是这里土地的颜色：暗灰色。满身灰尘。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它可能是哑的，因为在我记忆中它从未吠过，连哀鸣都没有一声。

有一次我都想把它领回家，给它洗洗澡、喂养它、逗它开心：它对一个永远也不会再回来的男孩的这份不灭的奉献触动了我。要是我拿勺子喂它牛奶，找兽医好好照料它，在走廊里给它造个窝，兴许它最终会适应而且接受我的抚摸。西奥讨厌狗，但他肯定会让步的，因为他是个妥协派。真希望我能让他明白他的过度周到让我感到压抑。我都能看见他眯起小眼睛，左边那只，英国退伍陆军少校似的银灰胡子掩盖了轻微的颤动：你瞧，诺娅，要是你真那么在乎，那就这么办好了。想到这里我放弃了狗。它是个排外的家伙，种种迹象表明它并不需要什么新的依赖。

一天早上它被车撞了。尽管如此，它还是踩着铃声准时来到教室。那条被碾过的后腿像折断了的树枝。它把自己拖到老据点，像往常一样趴下，没有一声呜咽。我下定决心要打电话给公共健康部门的兽医，让他们来照顾它，把它领走，但一天结束后它就消失了，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回来。我们都觉得它是拖着自己到什么隐蔽的地方等死去了。几个月后，一个年级聚会的晚上，在欢迎辞、小节目、点心饮料和校长讲话结束之后，夜里一点大家离

开了会场。这时那条狗又出现了，瘦骨嶙峋，畸形，行尸走肉一般，用前腿拖着残疾的后腿前行，穿过学校大门对面污秽的撑柳林前面路灯洒下的灯光，从黑暗爬向黑暗。除非那是另一条狗，或者只是个影子。

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起身迎接我们，他后背靠在阳台门上，从那个阳台能看到东边暑气中隐约闪亮的山顶。酒店双人床上放着一个关着的小旅行箱，桌上有两个柠檬，桌后椅子的靠背上罩着一件轻便的夏季外衣。他是个个头不高、虚弱、窄肩的男人，逐渐稀疏的头发渐渐变得灰白，皱纹密布的脸庞晒得黝黑，让他看起来像个退休的冶金工人。他并非我想像中的军事顾问或国际军火商的模样。当他开口和我们讲话时我更加惊讶了，他没等大家正式吊唁就开始谈到有必要阻止其他的孩子成为毒品的受害者。他的声音单调，稍带犹豫，好像怕激怒我们似的。他问到伊曼纽尔是不是学生中惟一受害的，还问我们注意到这件事多久了。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因为假如不把教员休息室的流言计算在内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事后才了解实情的。副校长磕磕巴巴地说了些套话，称伊曼纽尔是失踪之后才开始吸毒的，是在埃拉特，就是说也许是在最后几天。即便是他的姑妈也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变化，不过那也是很难看出来的。父亲回答说我们也许永远都会被蒙在鼓里。又一次的沉默，这次时间颇为持久。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用两只布满皱纹的手蒙住脸——那是棕色的农民的手，手指上布满鳞片——然后又把手放回腿上。副校长又开始说话，其间阿弗拉翰·奥维埃托问到谁最熟悉伊曼纽尔。副校长的声音模糊成喃喃的咕哝。沉默。一个贝督因招待，黑皮肤，身材苗条得像个漂亮姑娘，戴着一个白色领结，推进来一辆装着水果、奶酪和饮料，盖着白布的餐车。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签单付了钱。别客气，他说，说了两次，但没有人动。突然他转向我静静地说道：你一定是诺娅，他喜欢上你的课，他有文学天赋。

我惊呆了，没有加以否认。我咕哝了几句陈腐的话，说那是一个敏感的男孩，不太合群，有点，嗯，沉默寡言。父亲朝着我的方向笑了一下，是那种不太习惯笑的人的笑容：好像把百叶窗打开一条小缝展示一间美丽房间，里面有华丽的吊灯、书架和在壁炉里燃烧的炉火，然后再关上窗，仿佛窗户

从未打开过一样。

六周以后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在上午课间休息时突然出现在教员休息室里，要我们帮忙实现一个计划：他在考虑捐出一笔钱来在特尔科达为来自全国其他地方吸毒上瘾的的年轻人和学生们建一所小型康复中心。他希望用这个中心来纪念他的儿子。特尔科达是个安静的小城，沙漠也许能帮上点忙：眼望荒凉广阔的空间可以激起各种反省，也许真能救助一两个人。当然他能理解肯定会有来自地方上的反对，即便如此，也可以先试着整理出一些或许能减少恐惧的基本条款来。

我不是伊曼纽尔的班主任，所以当他来问我能否组织一个非正式的小组做些前期调查并写下困难所在，再摸清摆平当地人的可靠办法时，我大吃一惊。尽管他本人几个月才来以色列一次，但是他的律师，仑·阿贝尔，随时听从我的调遣。如果我拒绝他的提议，他能够理解，那么就再找别人。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瞧，他说，又露出短暂开启的百叶窗的缝隙里展现出壁炉炉火和华丽吊灯那样的笑容，你是整个学校里惟一他喜欢的老师。有一次他写信给我说你给了他一支铅笔，他用你给他的铅笔写的信。

我不记得什么铅笔。

然而，我还是答应了。也许是因为产生了想和伊曼纽尔还有他的父亲保留某种联系的模糊愿望。什么样的联系？当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说起那支不存在的铅笔时，闪过一种瞬间的相似——不是和他儿子之间的——而是和一个我多年以前遇到的男人之间的相似。他的脸、他的溜肩膀，特别是他柔和的声音和遣词造句的方式——比如他说的“激起各种反省”——都让我想起曾经在迦南山的一个健康基金疗养院遇到的诗人以斯拉·扎斯曼。我们，有我父亲、扎斯曼夫妇、楚玛姑妈和我，常在黄昏时坐在疗养院草坪的斜坡上。那时夜晚的颜色更迭着、无形的清风在山边嬉戏。父亲坐在轮椅里，腰部以下麻痹，像个上了岁数、发胖的拳击手或摔跤手。他的脸粗糙起伏，身体的重量压着绷紧的轮椅，黑色的收音机攥在手里仿佛一个随时会扔出去的手榴弹，一张大黑羊毛毯盖住他无用的膝盖，他弯曲的肩膀表达着暴力的狂

怒，好像在爆发的瞬间被变成了石头。我们围着他坐在躺椅里，面对天边加利利山那渐渐屈从于夜晚微光的光线。以斯拉·扎斯曼给我们看手写的诗，那些诗和当时以色列流行的诗歌大相径庭，像竖琴的乐音般打动了我。一天晚上他说：诗歌像是被玻璃杯罩住了的火星，因为词句是一片片的玻璃。他挤出一个转瞬即逝的笑容，有点后悔说了这个隐喻。然后假期结束了，扎斯曼一家谦卑地来道别，像是为舍弃我们先行而去做出无言的道歉，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父亲在一股无名怒火中砸碎了他的收音机。我和楚玛姑妈用出租车把他拉回了家。几周之后我听到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说以斯拉·扎斯曼去世了。我到内坦亚的书店去想买他的诗集，我不知道书名，而书店店员没有听说过这本书。楚玛姑妈给父亲买了一台新收音机，它完整存在了两周左右。

我要求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和我约定，我将不从调查小组的工作中接受任何酬劳，他听了以后未置一词。三周以后我在邮箱里接到第一张汇款单。自那以后，他每月通过他的律师给我寄三百美元，由我决定其中多少用于支付工作小组的开支和交通报销，以及多少用于补偿我花在计划上的时间。我四次要求律师仑·阿贝尔停止汇款，都没能奏效。

西奥警告我，你被吸进去了，丫头。这样处理资金只会招致不愉快和麻烦，难以想像一个冷静的生意人会头脑发热做出这样的事。如果他就是想捐点钱纪念他儿子，为什么不干脆设立个基金会，有财政官和正式的会计？要是别的情况，如果他想要在商业上冒冒险，开个面向富人子弟的诊疗所，一个封闭的鸟巢，三百美元可不够报答你为平息公众意见付出的劳动。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怎么被利用了，诺娅。你什么时候开始掺和进给吸毒者张罗诊疗所的事儿了？这项计划不可能会得到居民的赞同——谁会想要在自家的后院里摆一个鸦片烟馆？

我说：西奥。我是个大姑娘了。

他眯起眼睛没有再说什么。

他回到走廊继续熨烫他的衬衫去了。

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整个城镇都反对。有人匿名给地方报纸投稿说他

们不会容忍这里变成全国的垃圾站。我一切都得从头学起。那些我心不在焉从广播上听来的、报纸上瞥来的东西，操作、费用、资本基金、组织、董事会、预算；这一切还都非常模糊但令人兴奋。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可能会登上周末增刊的彩色头条。其实晚报已经试探过想要采访我，我拒绝了，因为还不清楚这样的报道会给计划带来帮助还是破坏。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学。我会学的。

有时候我用他人的身份对自己说：因为诺娅干得了。因为这是件好事。

除我之外，小组还有三个成员：马拉基・佩莱格（全城都管他叫穆奇），路德米尔和琳达・达尼诺。琳达是个患有哮喘症的离异女子，热爱艺术；她为了守在穆奇身边才志愿参加了小组。她的贡献是用文字处理机打字。穆奇・佩莱格是为了我才加入小组的：即使我为食腐肉的乌鸦开个结业学校他也会参加。至于电力公司的退休雇员路德米尔，他是好几个委员会的喧嚣的成员：采石场和迪厅的敌人、公开指责不完善的路标的人、本地报纸热情洋溢的每周专栏“野外来声”的撰稿人。夏天他穿着卡其布大短裤在城里游来荡去，鞋带子拍在满是纹理晒红了的脚上啪嗒啪嗒作响，每次看见我他都会说，没有火哪有烟①，然后笑着抱歉道，别生气啊，亲爱的，开个玩笑。

在实际工作中，我得承担所有的责任。我已经陷在里面好几个星期了：跑社会安全、健康教育部门在南边的办公室，扯着反毒品滥用联盟的袖子不放，围攻困难青年机构，哄着家长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哀求发展机构，回应本地报纸，追着市长巴特希瓦，而她到目前为止甚至还拒绝把这个设想提到日程上来。我已经去了四趟耶路撒冷、两趟特拉维夫，每周去本地区政府办公室所在地贝尔谢巴朝圣一次。在特尔科达，这里的朋友和熟人们看我的时候已经开始带有一些讽刺式的担忧了。在教员休息室，他们说，你想从这些多余的麻烦里捞些什么好处，诺娅？你受什么刺激了？不管怎么说，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而我说：走着瞧。

我不怨这些朋友和熟人。如果是其他哪个老师突然鼓噪起来要在这里成

①原文是 Noa smoke without a fire。有句成语是 No a smoke without a fire（没有火哪有烟）。因为女主人公诺娅的英文名字是 Noa（诺娅），这里将句子中的 No a 连载一起组合成女主人公的名字，形成双关语——译注。

立，比如说，一个传染病实验室，我猜我自己也会感到困惑或者愤怒。与此同时，市长耸着肩，工会不做任何承诺，家长们充满敌意，穆奇·佩莱格总用那些女人赠他的东西还有那些只有他才清楚怎么给女人的东西来扰乱我，路德米尔也来劝诱我加入关闭采石场的宣传活动。公共图书馆里，馆员帮我找齐了所有关于药品上瘾对策的书籍，放在专门的一格里。有人在上边贴了个标签：为瘾君子诺娅保留。

西奥应我的要求一言不发。

至于我：我在学。

这是个有八九千居民的新兴小城。最早建的是四方形的住宅，住着驻军基地里兵役人员的家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附近发现了几口很有希望的油井，所以决定兴建小城。但这些油井令人大失所望，计划便也就此搁置了。城里的主要通路赫茨尔[①]大道雄风勃勃：六条车道沿着怪石嶙峋的荒漠高原边缘展开，花坛充当中间隔离带，花坛中是远方运来的红土。路边种着棕榈树，被强风吹得东倒西歪。大道两边的铁栏杆包着麻袋布以防沙尘暴，引水浇灌的黄蝴蝶树树苗像是还没确信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这条主道引出十五条同样的街道，都以总统、总理的名字命名，伸向东伸向西。每条街道都有一排绿色的街灯和与之相配的按一定间距设置的绿色长凳。还有邮筒和公共汽车站以及方便路人寻找十字路口的指路标，不过交通流量十分稀疏。

沙漠来风常常光顾装饰性的花园，它饱受风沙袭击，已被人们遗忘。尽管如此，楼前还有一些坚守着的草坪，伴着些许夹竹桃和玫瑰丛。那些楼本身已被热度和风沙侵蚀。布满四层、六层公寓楼的街区成排，前阳台都封闭着铝框、挡风推拉玻璃。楼体原本都抹了白灰，但现在的颜色全成了暗灰：经年之后，白灰变成了沙漠的颜色，仿佛融入那种颜色就能缓和猛烈的日照和沙尘。太阳能板在每个屋顶上闪光，像是小城试着以自己的语言和缓太阳的暴晒。

各公寓街区之间有很大的空地。大概多年前哪个晒晕了的规划人策划出一个花园郊区，留下建公园和小农场的空地，打算在街区之间种上能在楼宇

①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奥地利记者、作家。生于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被称为“犹太复国之父”。死后被神化为以色列国父般的人物——译注。

之间含苞吐蕊的果树。这些年，这些空场变成了条状的沙漠，点缀着一山一山的垃圾、植物和死气沉沉的物体之间分界线上横跨着的几丛灌木。还有几棵桉树和撑柳，被干旱和咸风打击得萎靡不振，朝东方弯下腰，像夜半石化了的逃难者。

小城西北部是高尚住宅区，有成百所住宅。大都攀在山坡上以便分出层次。这儿没有柏油的平屋顶，都是红瓦，经冬历夏后早已变成灰色。在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氛围中，点缀着几座按瑞士山中小屋建造的木屋，落脚在一块从加利利山运来的泛红的岩石上，有围栏和拱门，高低起伏带圆窗的山墙上甚至还有风向标。它们在这方沙漠上象征着森林和草场。这是小康居民——职业人士、军官、经理人、工程师和高级技师——的聚居区。

位于对角的东南部落脚在一条狭长的窄谷里，有一条常被流沙侵袭的崎岖不平的路延伸着。沿路摆放着瓷器、金属器皿的成品。有一家小型洗衣机厂，接着是作坊、车库、仓库、铁皮棚屋和密不透风的小屋。还有一些没有地基、用光秃秃的水泥块和木板搭起来的建筑结构。各种作坊店铺在这里增生扩展：锁匠铺、木匠作坊、电工店、车体构造铺子、天线商店、电视机修理店、管道商店、太阳能热水器商店。小屋和小屋中间是铁丝网，已经塌了、朽了，掩埋在沙里。门口的沙子沾着厚重的机油，腻腻的。整个夏天那里都泛着腐尿和热橡胶的味道。太阳无情地烘烤着一切。山下是一座丢弃旧汽车的垃圾场，然后就是市立公墓。这条路在拦着两道铁丝护网的悬崖这里达到尽头。都说那边是个禁入的山谷，装了什么秘密装置。这个山谷再过去，又是些嵌有山洞和裂缝的黑色峭壁。那里是山羚羊的栖息地，时常看得见它们的身影出现在地平线上，俯冲奔向晚上亮着微光的垂暮；狐狸在那里造窝，蝎子和毒蛇也在那里挖穴。更远处，是连绵的白垩砾石和板岩山坡，分布着干涸河床和沉淀的层层黑色山麓碎石，一直延伸到荒山深处。荒山常围绕在耀眼的烟霾中，远远望去时常呈现蓝色，像云间幻景，从无形的海面升起并将会立刻退回其中。

公共汽车一天六次从贝尔谢巴来，停在购物中心外那个被大家叫做“红绿灯边”的广场，它的正式名叫欧文・科西查广场。贝尔谢巴来的旅客在这

里下车，司机消失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在那儿待上二十分钟，抽根烟喝杯咖啡，等着要去城里的乘客在车站聚集。广场对面是一个没铺柏油的停车场，飞腾着的滚滚细沙，落定后便给商店、餐馆和办公室蒙上一层面纱。广场四周都是简单的沿海样式的高楼——两家银行、修缮过的巴黎电影院、亦充餐馆用的几家咖啡馆，和一家也销售全国彩票的破败台球厅。在这块被上述建筑定义了的地区中间是一块铺着红灰相间地面的广场。广场中心立着一根水泥柱，以纪念覆没的勇士。纪念碑四角种着柏树。一棵死了。柱子上的金属字写着“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　杀[①]”，倒数第二个字没了。下面是一个照着圣经律法做的匾，写着二十一个名字，从阿弗拉罗·约瑟夫到舒民·齐奥拉·乔治。这块匾中间已经裂开，从中长出了旋花。纪念碑边上是个水泥造的饮水喷泉，用英语和希伯来文刻着《圣经》短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②]——为纪念多尼娅和阿道博特·泽斯尼克而建，1983 年。三个水嘴向下弯曲朝向盆底，其中两个滴滴答答地漏个不停。

银行大楼屋顶杂乱的金属广告板架中挂着一幅巨幅标语：我今天存了。西奥的办公室在健康基金对面、市政厅左边的楼里。办公室门上挂的名称是“规划”。同一层还有牙医德莱兹纳和尼尔的诊所，再往前是公证人和会计杜比·维兹曼的办公室，还提供影印和与各种文件相关的服务。闲暇时，杜比·维兹曼画沙漠风景，他的五幅树胶水彩画曾在赫兹贺茨利亚一个私人画廊的联展中展出过。他的办公室有一面墙上框起一个珍珠母蚌做装饰，旁边贴了一张《国土报》[③]放大的报道，因为里面提到了他的名字。尼尔大夫是个攀岩爱好者，德莱兹纳大夫的太太是一个歌手的远亲，那个歌手前年冬天在这儿开过演唱会还给歌迷发放了签名照片。

两个贝督因人，都不小了，并肩坐在工会楼门口的台阶上，都穿着牛仔裤。一个上身穿着 Betar[④]的 T 恤衫，另一个身穿破军装。个子矮些的那个把小臂搁在膝盖上，掌心向上，皴裂的手指上放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用大拇指

①原文是 The beauty of Israel is slain upon the high places（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出自《圣经·旧约·撒母尔记下》1：19——译注。
②原文是 Ho, everyone that thirsteth, come to the waters，出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55：1——译注。
③《国土报》（*Ha' aretz*），以色列主要报纸之一，1918 年创刊，无党派希伯来文日报，日发行量约 5.5 万份——译注。
④Betar，犹太复国青年团体——译注。

不停地揉搓着。另一个慢慢儿地把报纸在膝盖中间搓成一大团。他的眼睛紧盯着天空，也可能是在盯着警察局屋顶上闪着光的无线天线。等待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贩，是个德裔犹太人，拖着脚走过去，脖子上悬着个篮子，里面装着一摁就会跳的青蛙、陀螺、肥皂、梳子、刮胡泡沫和台湾产的洗发香波。他戴着眼镜，驼背，头戴一顶无边帽。他茫然地对那两个贝督因人笑了笑，那两位不知他的意图，礼貌地冲他点了点头。

“好莱坞照相——底片放大及其他摄像器材”：店关着还拦着防盗铁栏。布满灰尘的窗子里面，在一张《晚报》[①]上印的总理贝京的照片下面挂着一则告示：“店主耶胡达和扎契同时服役，本店从即日起关张至下月一日。请大家谅解。”三个信教的年轻人，其中一个是白化病，坐在葬仪店门前的金属凳子上交谈。那个上了年纪的小贩停在他们身边，想要加入谈话；他咳嗽、叹息，用手指做着手势：那么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就像油和水？不过，犹太人之间也一样，即使他们是兄弟。一个年轻人进去给他倒了杯水，老人谢了他，喝了，叹了口气，把装着青蛙和肥皂的篮子拿起来往脖子上一挂，拖着脚朝红绿灯方向慢慢走去。装订商卡什纳坐在他舒适的小窝里，没在装订，因为他正沉浸在一本支离破碎的书里。他的金边眼镜滑到鼻梁的一半。从他的浅笑中可以断定那本书投他所好，也可能给他带回了些许回忆。广场的远处种着三棵印度梓树，枝叶稀疏，甚至都形成不了什么遮阳的树阴。

沙茨伯格的药店里贴着一张告示：“不记账赊药”。一个罗马尼亚口音的大胖子嘟囔道：这个记账是什么意思？一个穿着满是灰尘的凉鞋、肩上用一条绳子代替带子拴着一挺轻机枪的邋遢青年主动答道：记账就好比打个折扣。

为了扩充电脑宫，他们在拆一堵墙。即将开业：电脑网络全面特展。现货眼下还围在为防尘而设的塑料护板里面。正在被拆毁的那面墙上有一幅海报，一个戴眼镜的冷美人跷着二郎腿，面对电脑屏幕：她着迷地玩着电脑，都没注意路人往她的裙子里偷看。一个金发少年对着巴黎电影院的外墙专心玩球：停球、过人、传球、停球、过人。玩了那么久都没变个花样。他神情

①《晚报》(*Ma' ariv*)，1948 年创刊，希伯来文晚报，基本支持政府立场，日发行量 15 万份——译注。

专注，表情饱含着责任感，仿佛最小的失误都将导致灾难。一个身穿国防卫队制服的老人在他即将踢碎一扇玻璃窗之前制止了他。少年立刻听从了，把球装进袋里，人没动。他在等。空气又脏又热。光线几乎是白色的。头顶上的高压线缠着一个挂了几个月的风筝，像一具挂在绞架上的尸体。还有，从今天开始恩德培三明治店开始卖肉馅馅饼：阿弗拉姆到贝尔谢巴去买来了制作设备。他急于知道这会不会受欢迎。然而，这是急不得的，需要等上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等着瞧。一边不停地祈祷。

早上七点一刻我们在厨房喝着咖啡，我说：今天放学后我还得去一趟贝尔谢巴，见见部里的贝尼兹利。要是他们不帮忙的话我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别对我说你的想法，至少现在别说。也许今天晚上回来之后我会想听。看看吧。

他从报纸上抬起眼来，还穿着那件汗衫，肩膀处已经晒得褪了色。他六十岁了，但身体还是精壮而健康。他向我投来一束爱怜而好奇的目光。人们有时会用这样的目光看拒绝上幼儿园和抱怨肚子疼的孩子们。你要相信他吗，还是该严厉一些？他完美的军人胡子震颤了一下，闪过一丝怀疑。突然他用大手按住我的手说，你是个大姑娘了，知道该怎么办。

西奥，我说，我不是笨蛋。你要是希望我现在罢手的话就请直说，诺娅，别干了。你试着说出来，看会怎么样。

你让我别掺合，你的请求通过了。故事结束。再来杯咖啡？

我没说话。我实在太害怕口角了。

他的灰发、经验丰富的脸庞、精心修理的银灰色胡须、半闭的左眼都时常会让我想到富有的农民，疑心重重的地主，将生活归类为冲突和对抗的男人，一个女人或是一位邻居：综合了大方与强悍。

这时，他像是从刚才得到了偶发的快乐，一边把面包在手指中间卷成球一边说：

晚上去看电影吧。正上演一个情色喜剧。咱们好久没有晚上一块出去了。你去贝尔谢巴时开车小心点，我没关系，今天不用车，当心路上的坑洼和大卡车。别超车，诺娅。越少超车越安全。记得把油加满。等一下，我认

识你要找的贝尼兹利，我一手带出来的人是他的老师，要我给他打个电话吗？在你见他之前递个话？

我请他不要这样做。

他继续看起《国土报》来。嘟囔了两句日本人什么什么的。我抓起公文包，为了赶第一堂课再不抓紧点的话就得跑着去了。到了门口我止步又返回来和他交换了兄妹式的亲吻，吻在头上，头发上。回头见，谢谢你借我车。今天早上我仍旧没有问他工作上有没有新进展。反正答案都是一样的：西奥已经对新事物失去兴趣很久了。今天晚上从贝尔谢巴回来后，我要跟他出去吃晚餐，然后在巴黎电影院看电影。他总是按着我的节拍走，尽管他并非出于真心，只是出于忧虑的同情。要是他不关心我，我肯定会受伤。而我则对他不公平。也许这些就是现在不论他说什么都会激怒我的原因。还有他的克制不语，以及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十点，课间时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要问他有什么新进展。我要谢谢他把雪弗莱借给我一整天。我要说对不起，我要保证记得加满油，照他的提议晚上和他一起去看电影。

不过，为什么道歉呢？

无论如何，课间时教员休息室的电话前总是排着长队，而且别人总是支着耳朵听着，然后他们就该说他们听到诺娅向西奥道歉了，谁知道为了什么。这么一个小城。到这儿来全是我的错，这是我选中的地方，西奥让步了，同意了。我多希望他能不再让步、不再每次都在他放债人的账头上添加记录。

什么账头？根本就没有。我又对他不公平了。

穆奇·佩莱格站在学校门口等我。怎么了？没什么，就像木匠问处女为什么她的肚子那么大的时候处女的回答一样。他只是来告诉我从今天开始他要寻找能免费为我们做计划的建筑师。如果我要求，哪怕只要我不拒绝的话，西奥本来是可以帮我们的。但我什么时候表示拒绝了？谁说了任何有关计划的事？我什么时候给过伊曼纽尔一根铅笔然后又忘了？全都是梦。一个奇怪的男孩，孤独，他觉得词句是个圈套，他垂下眼帘，害羞，沉入自己世

界的海底，还有他那只在校外过道上等他的幽灵犬。一定是他编了铅笔的故事。但他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呢？是不是我开始忘记发生过的事情了？是不是我不经心地给过他铅笔？

葬礼后六周，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来让我答应负责张罗一项非正式的调查以确定设立上瘾儿童康复试验寄宿学校的可能性，我们俩一直坐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直到黄昏。我们点了盛在高脚玻璃杯里的冰咖啡，他用他那柔和的声音对我说小城和沙漠将如何有助于康复过程，甚至能激发各种反省。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动着粗糙的手，仿佛想要把一个看不见的、不愿被捏成球状的物体圈在手中。我看着，觉得不可思议。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这样对我说——拿我姐姐来说，就是伊曼纽尔的姑妈，她在这儿住了将近十年，她也在这奇妙的强烈日照和安静的结合中找到了些安慰人心的东西。想当作家的伊曼纽尔也是如此，他没准儿真有当作家的天分，这方面你大概了解得比我深，我怎么又谈起他来了？他总在这儿。站在我面前，苍白，抱着自己的肩膀，这是他的习惯。他会突然抱住自己的肩膀，好像不够暖和似的。我觉得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而是从远方来到我身边，来和我在一起分担我的忧伤。不是什么回忆，也不是想念他，就是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套头衫，站在我面前，苍白，没有笑容，一言不发。胳膊绕在肩上，靠在一堵墙上，重心都搁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闲着。你能明白吧：就在那儿啊。

这几年来，阿弗拉翰·奥维埃托不时到小城来，和他话不多的儿子一起在山里散步，或是在日落时分一起在街上溜达一两个钟头，静静地看着小城如何变大，又建了个公园，又铺了条路，又添了张长椅。有时候他们甚至晚上也出来走走，一夜之间，马路拓展了，东边又开始了造房新工程。他那一代人看到新屋在荒地上拔地而起还会激动万分，而伊曼纽尔则显然更喜欢荒地。但他们俩都喜欢这样的夜游，沿着空空如也的街道，相互之间一言不发。那时他们的个头就已经差不多一样高了。要不是因为工作，他本可以待得更久些：沙漠适合他。他可能会永远待下去。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清真实情况，因为谁也分不清真实和期盼。不过，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桌布上抬起眼来，从皱纹密布的棕色面庞上的蓝眼睛深处涌出一个

灿烂的笑，一瞬就消失了、复归沉寂，头也再次低垂了下去。我无心地将手指搭在他手上，像在触摸粗糙的地表，很快我就意识到并抽回手来，几乎忍不住要为这一没有得到许可的触摸向他道歉。

他说，你瞧，事情就是这样的，然后又积极地考虑了一下说：没事儿了。我觉得很尴尬，问道：那时你在非洲，在你住的地方有沙漠吗？问题一出口我马上就后悔了，这问题提得太蠢了，而且鲁莽，暗含着对他间接的批评，我没有权利批评他。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给我们一人要了一杯矿泉水，清一清嘴里甜腻的冰咖啡黏黏的余味。他说：非洲的沙漠。嗯，实际上我工作的非洲的那个部分可没有沙漠。正相反，那里是密林。你要是没事儿我给你讲个故事。不管你有没有空儿我还是讲吧。我们在尼日利亚的头几年里，租了一幢殖民者的房子，房主是个英国医生。不，不是在拉各斯，而是在森林边上的一个小镇。不比特尔科达大多少，非常穷。只有一所荒废了的英国邮局、一台发电机、一个警察局、一座教堂、十几家惨不忍睹的商铺、几百个灰泥和树枝搭的小窝棚。伊曼纽尔才三岁，他是个可爱的孩子，总是戴着一顶苏格兰格子呢小帽，人家一跟他说话他就眨眼睛。埃雷拉，他母亲，我太太，当时在附近镇上一个作为援助项目建起来的防疫站里当儿科医生，全职工作。她总梦想着在热带行医。阿尔伯特·施韦泽①占据了她所有的想像。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闯荡。几个女仆（有一个是意大利人）负责打理家务，还请了个年轻的当地人做园丁。院子里养了羊、狗、一群鸡，简直就是个动物园，还有一只神经病鹦鹉，下次我再讲它的事儿。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可讲的。我们还养了一只小猩猩，是一个周末在森林里发现的，它当时明显是迷路了或者是个孤儿。伊曼纽尔注意到它从路边一个废旧轮胎中间盯着我们看，用那种令人心碎的眼神。它一下子就看中了我们。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不是专家，但是心理学上好像管这叫铭印②。那头小猩猩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我们都喜欢它，争着看它会钻进谁怀里睡觉。伊曼纽尔开始的时候把罐

①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法籍德国人，医生。在神学、哲学、音乐方面均颇有建树。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堂兄弟。施韦泽看到非洲急需医疗的状况，于30岁时立志献身非洲医疗事业。自1913年在加蓬开设第一家诊疗所起终身为自己的目标奋斗。78岁时由于所作贡献获得195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②铭印（Imprinting），心理学术语。指幼小动物认知、亲近族类（特别是母亲）的一种习得过程——译注。

头牛奶装进奶瓶喂它。每当埃雷拉给伊曼纽尔唱起催眠曲，那头小猩猩就会拿一张小毯子裹住自己。不久它学会了摆餐桌、晾衣服、收衣服，甚至学会抚弄猫咪直到它发出舒服的咕哝声。它还特别会讨人欢心。亲吻、关爱、拥抱，它渴望情感上的表示，付出和接受，无休无止。比我们多很多，也许是它觉得它必须这样来维持、加强和我们之间的身体联系。不过这也很难说。它那么饱含情感，甚至能觉察到谁不高兴了、孤独了或是受到伤害了，然后献身地逗我们开心：它会演一出模仿秀：照镜子化妆的埃雷拉，瞪眼睛眨眼睛的伊曼纽尔，战争中拿着电话的我，欺负母鸡的园丁。我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伊曼纽尔简直离不开它，他们一个盘子里吃饭、一起玩。有一次它还从毒蛇口中救了伊曼纽尔，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还有一次它献给埃雷拉一条美丽无比的围巾，不知是从哪儿偷来的，我们没能找到失主。我们要是出去访友把它留在家里，它就会跟在吉普车后面跑，一边伤心地哭着，像个被人虐待了的孩子。要是被训斥了，它会生气，然后消失，上树或上房，好像是下定决心要和我们诀别，不过过后又会带着重修旧好的清澈意愿回来讲和，努力示爱以期补偿，它给埃雷拉擦眼镜然后戴在猫的脸上，直到我们毫无办法只好原谅它、爱抚它。不过，它要是觉得我们错怪了它就会继续斗争下去。比如，有一次我因为商店丢了水果打了它。这样的情况下它就会一言不发地站在屋子角落里，批判地看着我们，好像在说，你怎么堕落成这样了，世界会给你应得的审判，直到让我们感觉我们错怪了它。惟一修好的方法，照它不容误读的暗示来看，是打开封着的铁皮糖盒。伊曼纽尔得黄疸病的时候，小猩猩学会了从冰箱里拿冷饮、递温度计，它还不停地给自己测体温，好像怕自己也得病似的。就这样过了几年这只猩猩发育到了青春期，胸口和脸上长了隐士长须般的白毛。它成年后第一件事就是爱上了埃雷拉。它粘住了她，几乎寸步不离。我必须得说，它以一种动人的方式追求她，梳她的头发，吹凉她的咖啡，给她递袜子，不过还有些越来越难以接受的性方面的举动。它会触摸感受她的裙子，把裙子含在嘴里，当她弯腰时紧抱在她身后。不胜枚举。我就不说细节了。晚上我们关在卧室里时它被嫉妒的怒火冲昏了头，一直站在窗口外发出受了伤似的悲戚呜咽。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有

趣甚至动人，不久它开始在她窗下唱夜曲，不过很快我们发现这是个棘手的麻烦。比如说只要我和伊曼纽尔当着它的面接触埃雷拉，或是埃雷拉摸摸我们，他就会咬我们。伊曼纽尔受了惊吓又开始眨眼睛，眼皮乱跳了。想要了解接下来的事情的话你得明白，诺娅，猩猩是强壮、敏捷的动物，它发怒或被激怒时可以是非常危险的。有一两次它把她堵住无处躲避，我动了粗才把她救出来。那次多亏我在家，要是不在的话会怎样？兽医时不时给它打一针雌性激素，但那没能平静下它的情欲。我们不知所措：不可能摆脱它也不想伤害它，它已经是家庭的一员了。你明白吗：我们从它刚出生起一手把它带大。有一次它吞下几块碎玻璃，我们带它飞到拉各斯看病。我们轮流照顾了它四天四夜，确保它不会撕破绷带。有了埃雷拉这次事故以后，兽医建议做阉割手术，我痛苦不堪，无法下这个决心，好像我是要受罪的受害者。我最终决定最无害的办法是将它放归山林。于是圣诞节前的一周，我把它带上吉普，它特别喜欢和我一起长途旅行，那次为了保险我深入森林一直开了六十多英里。我没告诉埃雷拉和伊曼纽尔，让他们觉得它是听从了森林的召唤自行消失、返回寻根的会比较好一点。我不是专家，不敢确定，但那也是常有的现象。路上我们停下来加油，它一如既往地把加油嘴插进油箱，开动油泵。我们停下吃了饭，饭后它跑回吉普给我拿来纸巾，它一定是觉察到了我的忧伤，或预见到了背叛，我无法形容那最后的旅程中它的专注周到。我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它想，它像一只被引向屠宰场的羊。它体察了我的思路，在大约三小时的整个旅程中，它在我旁边的座位上蜷作一团，手臂绕在我的肩上，我们像是一对假日出游的小伙伴。开始的时候它孩子气地呢喃着，好像自己在猜测商店里的东西，试着暂缓痛苦。但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到森林里去时，它沉默了。它整个缩进椅子里，身子猛抖不止，张大了眼睛盯着我瞧，那神情和我们第一天在森林里发现它时一样，一个弃儿从丢在路边的废弃轮胎中间信任地看着我们。我一只手把住方向盘，另一只手伸过去摸了摸它的脑袋，觉得自己像个谋杀犯，马上要把尖刀插向一个我也十分喜爱的纯真灵魂。但我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不到一年以后，埃雷拉在奥林匹克劫机事件中丧生，在那次抛弃它的旅途中，我不可能意识到接连要发生的惨剧。总

之，最后到了一小块空地。我熄了引擎。梦一般的宁静。它爬到我大腿上来把脸颊贴在我肩上。我叫它下车给我捡几根树枝回来，它听得懂“树枝”这个词，但它还是犹豫了。它发着抖，待在我边上的椅子上不动。它大概不太相信我。它以一种我至今无法形容的神情默默地盯着我。我不得不粗暴地冲它大吼，直到它听从我的指令下了车。我冲它叫喊的时候，心里希望它不要相信我，希望它一味倔强地拒绝下去。它走开二十码左右的时候我发动了引擎，迅速掉头，猛踩油门开始往回逃。我最后对它说的话不是温和的话语而是严厉的训斥。那个时候它明白我不是在玩捉迷藏，明白它被骗了。就是这么回事。它跨着猩猩的那种大步跳跃，刺人心肺地尖叫着拼命追了我几百码：我在战时也背过伤员，可从来没听过这种撕心裂肺的号叫，直到后视镜里它绝望狂追的身影消失不见了以后我还能听到尖叫声在身后渐渐远去。那之后的几周我总是听到那种声音，当时待在家里的伊曼纽尔坚持说他也听到了，尽管相隔六十英里是完全不可能听到的。但他那让埃雷拉诊所的医生同事无从下手治疗的眨眼睛的毛病不久后消失了，即使他母亲去世时也没有再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时地会蹑手蹑脚地潜到花园门口，期盼着但也害怕它自己找到道儿回来。如果它真的突然出现，我们该如何与它修好，它会原谅我们吗？好几年我们都不打开封着的铁皮糖盒。后来埃雷拉出事了，我跟伊曼纽尔提议再养一只猩猩，他没同意，只是说，算了吧。但问题是，我为什么对你说猩猩的事？有什么联系吗？你还记得咱们怎么谈到这个话题上的？之前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不记得了。说我们谈的是别的事。然后，我又毫无意识地把手指搭在了他的手上，随即马上挪开，说道：对不起，阿弗拉翰。

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说想请我帮个小忙。他很抱歉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如果可以的话，诺娅，请你当成我什么也没说过吧。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冰咖啡，如果不要了他请求能陪我到我要去的地方，也就是说，除非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他仓促地笑了笑，好像已经知道了我的回答，又猝然地抹去了那个微笑。我们沿着一条栽有大斑木、人迹罕至的大道尴尬地走着，几乎沉默不语，有点浑身不自在。凋谢了的黄花如阵阵密雨落在走道

上。天开始暗下来，从这盏街灯到下一盏，我们可能无意间放缓了脚步，一言不发，二十分钟后在学校台阶前分了手，因为我突然想起那天晚上学校有个什么会。我到的时候会已经开完了，我迅速冲出去找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我惊奇地发现，我有时也会不住地眨眼睛——但他早就不在学校的台阶那儿了。他肯定回到科达饭店他的房间去了，或者去了别处。

再有一周就要放假了。早些年，她从四月中就开始被东游西窜的欲念缠绕，报名参加各种夏季活动，耶路撒冷的会议、加利利的节庆、自然爱好者的迦密山脉漫游、贝尔谢巴的教师疗养。这一年她又陷入这种狂热，准备让自己献身于任何夏季突围。周六时我无意间问她打算如何度过长假，她说，再说吧，于是我放弃了这个话题。

大多数人总在忙于各种安排、准备工作和休闲活动。我则是有家有沙漠就很开心。我的工作都渐渐开始变得有些多余，很快我就要抛开它。有我的养老金、我们的存款，再加上在赫兹利亚的房产出租得来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到最后一刻。那么我每天做点什么呢？我要观察沙漠，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前走着观察。最热的时段我就睡觉。晚上我会坐在阳台上，或到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去和杜比·维兹曼下一盘棋。夜里我要听伦敦的广播。那边的那些山丘、干旱河床的入口、天上的浮云、花园尽头的柏树、夹竹桃和九重葛凉亭边上的空凳子。夜里能看得到星星；因为一年里季节的不同，有些星星会在午夜以后移动位置。其实不是因为季节，而是随着季节。花园围墙外平原里有一片地戳着半截的麦秆。一个贝督因老人总在秋天播种大麦，春天收获，现在羊群在那里啃着收割后的残秆。再远处是贫瘠的荒地，一直延展到山丘顶和更远的看起来像浓雾的山峦群里。倾斜的坡面上，在沙化地带中间，布满了棕黑色燧石和贝督因人称为“哈瓦尔”的浅色白垩。一切都是黑白双色的。一贯如此。存在于眼前、寂静无声。保持平静就是尽可能的像山峦那样：寂静无声而存在眼前。空荡荡。

今天早晨的新闻里播报了一段外交部长讲话的摘要，他谈到了人们期望

的和平。

“人们期望的”这个短语不正确。要么是期望，要么是和平：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

今天她说放学以后又要去贝尔谢巴。她答应会加满油，答应尽量不回来太晚。但我没问她打算几点回来，也没要她早点回来。好像她错误地飞进了这间屋，现在如此狂乱竟找不到飞出去的窗子。窗子开着，一如往常。于是她从这面墙扑扇到那面墙，撞向灯罩，冲上天花板，弄得自己浑身是伤。你就是不能试图给她指出门的位置：你不能帮她。你的任何举动只会让她更加狂乱。你要是不够小心，没能把她引向外面的自由天地，就会让她害怕起里面更深的一间屋子，她会更加疯狂地用翅膀扇击玻璃窗。对她惟一的帮助就是不要试图帮忙。缩在那儿，纹丝不动。化进墙里去。别移动。窗子是一直开着的吗？我真的希望她飞走吗？还是一动不动地潜伏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暗，等着她精疲力竭掉下来？

那时我就能朝她俯下身来，照顾她，像开始时那样。一直以来的那样。

到了贝尔谢巴才发现我预定的和贝尼兹利的约会有点误会。一个招人讨厌的秘书戴着像血滴一样的小耳环，非常高兴没能在预约本里找到我的名字：那个替我预约的女人，照她的说法，是个呆头呆脑的打字员，一周来两次而且什么事也不做，根本无权与公众接触。贝尼兹利先生正在开会。全天的会议。嗯，我头一次听说你，你特地从特尔科达远道赶来。真遗憾。很抱歉。

我坚持了一下，她让步了，暧昧地做了个安慰的手势，用对讲系统询问他到底能不能腾出一刻钟来。她涂满鲜红指甲油的手指放下了话筒，说，今天不行，小姐，过上两三周再来吧，等贝尼兹利先生开会回来以后。记住，先给我打个电话，我是多丽丝，接电话的人要是叫蒂吉，你可别跟她耽误工夫。这个小可怜，她怀了个篮球运动员的孩子可人家不认，现在孩子生下来就患有蒙古症[①]。她可也是虔诚的教徒呢。我要是那么虔诚的话，诱惑多半是只在星期六开车[②]溜达溜达。你是谁啊？你为什么要见贝尼兹利先生，也许我能给你帮上点忙？

这时候我妥协了。我让她再打扰贝尼兹利先生一次，告诉他西奥的诺娅来了。

也就是一两分钟以后他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兴奋激动，处处透着讨好，动着嘴唇，晃着大肚子。进来，什么事，没问题，咱们的老朋友，怎么样？身体还棒吧？工作顺利吗？他让你来的？嗯，他可是条了不起的汉子。

①蒙古症，即唐氏综合征，一种常见的常染色体三体综合征——译注。

②犹太教规定安息日（Sabbath），即星期六，每一个犹太人不得工作，只能祈祷和敬神，必须遵守安息日的禁忌，包括田耕、开车、写作、缝纫、烹调食物、买卖以及所有金钱交易等三十九项——译注。

等等诸如此类。

但是你的事儿啊，你瞧，诺娅女士，坦白地讲，我该怎么说呢？你找了个大方的捐款人，最佳方案是你把他打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引他上正道儿。从来没听说过特尔科达有毒品。毫无意义。我们昏了头吗？想把了不起的特拉维夫那些臭名昭著的毛病都招到这里来？他最好把钱投进，比如说，养老院。他们说的“金龄阶层”。这是我们实际能做的而且也值得一谈。但是要引进一车车的吸毒者……要知道，当今时代毒品可不是光杆一条，都伴随着犯罪、艾滋病和暴力，还有一切与色情业有关的，恕我直言。你这么一个体面端正的姑娘怎么会卷在这里面了？你可能会把西奥拖得身败名裂、天理不容。你得知道现今的世道，什么都会直接捅到媒体上去，地方流浪汉，深入报道，丑陋现象，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过，我们不能浪费一个捐款人。你只要把他带到我这儿来。现在大方的捐献人可不会从树上长出来。都是国家形象太差的缘故，这都要怪境内阿拉伯人拉后腿把我们搞成这样，天杀的。西奥对现在的局势怎么看？他肯定深受打击。国家可是他的命脉之血。你和西奥在一起几年了？八年？不值一提。毫无意义。你真该听听那些早年认识西奥的人说的，那时候国家还只有沙丘和梦想呢。我们还尊敬他当年炸飞英国警察局和雷达设备的英勇年代。他可真是让人铭记在心。不只如此，是榜样楷模。要是发展部还在他手里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烂摊子喽。我这么滔滔不绝真是不好意思。你只要记住在你身边的是个国宝级人物，记得要像对待眼睛里的光华一样好好照顾他。无论如何，记得替贝尼兹利好好拥抱他一下。至于你那些吸毒者嘛，干脆在这个不干不净的生意开始之前就把它忘了。你那位捐款人，让他到我这儿来，我会引他上正道儿的。再见。

我像一名恐怖分子一样开着宽大的旧雪弗莱从贝尔谢巴回特尔科达，超车时狂按喇叭，急转弯，我里面绷得太紧，沸腾着，外在表现出这种凯旋般脉动着的冷酷愤怒。好像我已经报了仇。我没回家直接开到穆奇・佩莱格家，盘腿坐在他的矮床上。一张唱片，昏暗的灯光，鞋子，一杯葡萄酒，外套，胸罩，毫无欲望，没有感觉，只有破坏性的悸动。嘴唇、肩膀、胸，继续往下，例行公事。二十分钟左右，他也毫无激情，只是在永无止境的功劳

簿上再积上几分而已。事后我得给他打分——甜心，我怎么样，你真棒，非常出色——也满足自己占了“眼睛里的光华”的上风。我会在他那里冲个澡，穿衣系扣时他照例会忍不住要再来一次，怎么样，我会用贝尼兹利先生的惯用语回答道，毫无意义，谢谢了。我将发动车子开车回家，恐怖分子的情绪不复存在。我会告诉西奥今天我做晚饭。不为什么。只是想做而已。铺上白色桌布拿出红酒。为什么干杯？为诺娅，那个要重新考虑、准备要下台阶的诺娅。为了她迟到了的回归，到那片属于她的领域。今夜不再会有走廊上的蹑手蹑脚，也没有伦敦的BBC。今夜我会服侍他安睡在我的床上，我自己则安置在阳台上他的哨岗上。轮到我坐着面对黑暗了。早晨，在赶着到学校去教比亚利克的诗歌之前，我要给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写信让他另请高明。以斯拉·扎斯曼死后出版的诗集题为《没在沙中的足印》，最后他们终于在贝尔谢巴的大学图书馆里帮我找到了这本书，我喜欢第六十三页那首诗的前半段。我不会去建诊疗所，还不如主动为移民搜集一些温暖的冬衣。或是找些礼物送给战士们。我喜欢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不会异想天开超越自己的能力范围。也许我能代表校方负责做一期纪念伊曼纽尔·奥维埃托的专号，试着收集一些资料，尽管也许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他——包括他的班主任老师和任课老师。

我觉得善良的人们因为情感脆弱而自愿行善实在令人难过。人们应该是为了善而行善，像我偶尔在阿什凯隆[1]的十字路口看到的那位圆脸、小肚子的中年警察，四肢着地趴在地上，在救护车赶到之前救助因为交通事故困在翻倒的卡车里面的伤员。已经几年了，但细节至今历历在目：他躺在地上，将生命之吻一下一下印给一位卡在挤碎的车门里、失去知觉的妇女。但救援队一到现场，医生或是护理人员上前接上了班，警察马上站起来，转过身——现在伤员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了，所以他又回来指挥交通：就这样，照直往前，小姐，请别停下，演出结束了。

冷冰冰的。甚至有些粗暴。他的声音像被烟熏过一样粗糙。他忘了自己头发上沾的泥巴，压扁了的帽子和鼻子里流下来的一条血迹。腋窝下汗渍斑

[1]阿什凯隆（Ashqelon），以色列西南部海滨古城，位于巴勒斯坦地区——译注。

斑，脸上的汗水和着泥土往下淌。几年过去了，但我没忘记这粗暴生硬与优雅的奇妙结合。从那位警察那里学来的为善服务至今仍是我的梦想：不以喷涌的情感，而是以高度的精确做事。带着那种几乎算得上冷漠的“只为工作”的态度。充满自信。像做一个外科手术一般。也正如以斯拉·扎斯曼在他的诗集开篇中写的“我们该在何处闪光，何人渴望我们的光亮”一样。

开到特尔科达城中心的红绿灯那里时，那首诗和那个警察帮助我克服了羞辱感、抛弃了报复的情绪。穆奇·佩莱格一定觉察到他充当了别人的角色。他会到琳达身上找回平衡。一个满身羞辱感的女人再次献身又能怎样，在七点二十分，沙漠小城里一个闷热潮湿的夜晚，伴着拉威尔的《波莱罗》[1]，在那张罩着布满灰尘的床罩的床上，对着一个满脸涂上了须后水的夸夸其谈的好色之徒。就为了惩罚一个无意伤害她、也永远不会知道她这些作为的男人？这有什么好处呢？她能从中得到什么？

什么也没有。毫无意义。

穆奇·佩莱格有一次在他滔滔不绝地赞扬和亲密表示之后对我说，他实际上倒挺喜欢我们俩这一对儿：西奥和我。不是喜欢，是崇拜。也不完全是。他从来不能清楚地表达他想说的话。

那是他的问题。这些年来，他说，西奥和我开始在一些说不出的方面变得相似起来。不是在性格上，也不是外表、姿势，是在其他方面，要是我能明白他想说的话有多好。你总能注意到一对没有孩子的男女之间会渐渐产生的某种相似。算了。忘了吧。他还会再提起的。我脸红了，都是因为他，唠唠叨叨的没逻辑、少敏感。对不住。他最后老是走到他要表达的意思的反面。还是摇摆不定，也许吧。不。真见鬼。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缓缓地驶过穆奇的办公室，房地产经销投资顾问，在红绿灯那儿掉了个头又回到本－兹维[2]总统大道。在那里稍作停顿，想记起忘记了的事情，最后下定决心诺娅就是不下这个台阶、还要把伊曼纽尔·奥维埃托康复中心的事儿坚持做下去。至少坚持到有更好的人选乐意接替她的工作为止。就这

①《波莱罗》（*bolero*），法国作曲家拉威尔（Maurice Ravel，1875－1937）的芭蕾舞曲，是世界性的通俗乐曲——译注。
②本－兹维（Yizhaq Ben-Zvi，1884－1963），以色列第二任总统。曾在1952、1957、1962年三次当选为以色列总统——译注。

样，照直往前，小姐，请别停下，演出结束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电力充足的巨型雪弗莱停到了超市门口。我买了各式冷肉和色拉、红酒、一只鳄梨、一个茄子、一些辣橄榄和四种奶酪：尽管不再想罪恶了，但赎罪的仪式已经开演。西奥坐在起居室里，光着的脚搁在白色小地毯上，他穿着汗衫和运动裤。既没看书也没看电视。也许和昨天、前天一样，他正在睁着眼睛打瞌睡。我冲了个澡，穿上一条花裙子、一件蓝色的夏季罩衫，再戴了一条围巾。拔掉电话，尽管还得做一件我还没想起来的事儿。我禁止西奥帮我准备晚餐。当他问我今天的事办得怎样时我笑了，答道：眼睛里的光华。

他在厨房的桌子那儿坐下，在我又切、又热、倒东倒西的工夫，他仔细地把绿色餐巾精心折好，再套进餐巾夹里。我发现在所有的身体活动中，甚至简单到开信封、把唱针放到唱片上这样的动作里，他的手都带有一种精确的灵巧，像是从上几代的钟表匠、屠户、小提琴家或是犹太法学家那里继承下来的。但他有一次说过他的外祖父实际上是最后一个从事他家延续了多少代的掘墓人事业的，在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小村。他自己从事了三十二年规划者的事业，大部分是当高级规划者，在发展部门。大家都说他创立了一些新概念，引领了一些运动，有些人说他功垂史册。我在委内瑞拉遇上他时他已经被解了职，冷冰冰的。他从来不想谈那次冲突、失败，以及和部长发生的碰撞，我从一些传闻中得到了关于这些事情的些许模糊轮廓。免职，也许是个阴谋，然后就把他调到一个毫无出头希望的部门。每当我试图询问的时候，他都含糊其辞，只说我在那儿的生涯已经结束了，或者是，我已经付出了我所能付出的一切。就这些。他既不谈现在的工作，也不想让我见他以前的熟人朋友。当初我提出到特尔科达定居的时候，他犹豫了几天就答应了。我在高中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他也开了一家叫规划有限公司的小门脸。没过几个月他就彻底切断了和老熟人的联系，像是打算彻底撤退。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说，没几年他就该领退休金了。有的晚上，他到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去上一两个钟头，坐在俯瞰广场的一个窗边的角落里看《晚报》或是跟杜比·维兹曼杀一盘棋。但大多数时候，他在五点十分从办公室回来，一直

在家待到第二天早晨。好像对某些事情背过身去不予对待。他渐渐地陷入永久性的冬眠，无冬历夏，如果可以用“冬眠”这个词来形容一个饱受失眠症折磨的人的话。

我用锡纸把土豆包起来准备烘烤，一边告诉他贝尼兹利那儿发生的事，差点说出回家路上几乎作了的事。尽管明知西奥不会嘲笑我，我还是不想提起那位好警察的形象。他慢慢地折好了最后一块餐巾并把它放进餐巾夹，像是在做一项智力工作。似乎这一块比别的更特殊或是更加复杂难弄。他平静地说：他可是个小天才，那个贝尼兹利。他还说：你不容易啊，诺娅。这些话让我克制住了几乎冲出来的眼泪。

吃完冰激凌喝了咖啡，我问他晚上想做些什么。我们还赶得上巴黎电影院那个情色喜剧电影的第二场。除非他另有妙招。不论什么。他转过头来斜着眼睛看着我，那个农民模样的大脑袋一时间露出一抹好玩儿的情绪，充满怀疑和狡猾，好像发现了我吸引他至今的细微之处，然后决心全凭我的兴趣而定似的。他看了看表说：现在我可以带你出去给你买条新裙子，怎么样。可惜商店全关了。

所以我们还是把脏盘子脏碗丢在桌上，尽快去赶第二场电影。广场上红绿灯边上的街灯昏暗，只有纪念覆没勇士的纪念碑被草丛里射出来的浅黄色灯光照得明亮。一个孤单、皮包骨的士兵坐在铁栏杆上，喝着一听啤酒。他眼睛紧盯着那位背朝着他的穿红色超短裙的姑娘的腿。我们走过时，他转过来看着我。那一看就是被懦弱牢牢控制住了的绝望的欲望。我把手臂环在西奥的腰上，说：我在这儿呢，你呢？他把手放在我头发上。你给咱们做的晚餐，他说，不是一顿饭，那是一件艺术品。我说：你怎么想，西奥？穆奇·佩莱格跟我说咱们俩在某方面很相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哪方面相像呢？

西奥说：穆奇·佩莱格。什么人？你说的是那个代理人。那个左手上边一点长了六根指头的小丑。是他吗？商业市场的花花公子？老穿着件“恶魔之泪”的T恤衫东游西逛？还是我把他和别人弄混了？别总结了，我说：你总是这样。

是部英国片，反讽、过于诙谐，讲的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出版人和一个加纳移民的故事。一次她出于好奇献身给那个加纳移民以后就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对他热烈的情感，以至最后身体上和经济上都成了他的奴隶，之后又被他两个暴力的兄弟所奴役。喜剧成分大多体现在女方家族成员的关系上，他们都是狂热的第三世界拥护者，还支持被蹂躏的种族，支持她的男朋友和他兄弟：在薄薄的宽容大度的表层之下，常常会冒出骨子里常见的歧视。有一些叙事性的视觉剪辑，从优雅的现代波西米亚风格画室到破败的贫民窟厨房，再回到摆满书籍、展示着非洲艺术品的房间。看到一半时我低声对西奥说：爱会战胜一切，你瞧着吧。大概过了一刻钟他才俯过身来小声回答道：这里面根本没有爱。全是弗朗兹·法农[①]的调调和被蹂躏者的反抗以及性方面的复仇。

我们回家以后他进了厨房，十分钟后拿来了一扎香甜的热酒和玻璃杯。我们无言地喝了酒。他眼睛里的某些东西让我并紧了膝盖。西奥，我说，你该明白一点。你不该往热酒里放蜂蜜，蜂蜜该加在茶里。热酒里应该加点柠檬。你为什么拿这种杯子来？这是喝冷饮用的。我们有好几个喝热酒的杯子，小的那种。你已经不在乎了。全都毫无意义。

上床后我们无言以对。我穿上那件端庄的白色睡衣，他有一次说，像个宗教寄宿学校的小女生。他全裸着来到我的房间，只有一个膝盖上套着弹力护膝，那儿有老伤。我设想自己的指尖能感受到他手臂和胸部上那些由黑变灰至烟色再成银白的毛发散发出的攻击性的光亮；他的身体很硬朗结实，但今晚他似乎与欲望分离了，好像他真正想要的是彻底拥抱并环绕我，好像他渴望理解我或是把我纳入他的世界，让我成为他的负债，他努力地要触及我每一寸皮肤，不顾他自己身体的感受，只要我像胎儿般蜷缩着包在他的身体里，像翅膀下的小鸡。我想要又不想向他投降，听他的话，给他付出、付出、再付出的权利。我滑出他的怀抱，从他令人陶醉的纵容中，我让他仰面

①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作家、社会哲学家、二十世纪最出色的殖民主义批判者。二战时为躲避纳粹远走北非，参加了“自由法国”反抗军。相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结束对第三世界的殖民压迫。他的文字引发了196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激进运动。被誉为“黑权”运动家。分析过黑人男子占有白人女子这一生活过程的内在意向——译注。

躺下，不让他干涉我给他的回报，直到我们对等扯平，然后一直到结束我们都互为对方，像四手联弹的二重奏，有时我们可能也像两个充满爱心的家长俯望一张小床，全神贯注，头碰着头，和那个会以爱回应爱的婴儿玩儿。之后，我给他盖上被单，用我的手指划过他农民般宽大的额头和渐渐变灰的短发。直到他入睡，我站起来光着脚走进厨房，收拾晚餐的残局，洗净擦干碗碟和我们用来喝热酒的冷饮杯。他从哪儿学来的往热酒里加蜂蜜，奇怪，眼睛里的老光华，他说那里没有爱、只有被蹂躏者的反抗是什么意思？我收拾好一切，换了块桌布。西奥没醒。好像今晚我的睡意全转移给了他。然后我走出去占领了阳台上他面对沙漠的那块地盘。我记起贝尼兹利说最早这儿除了沙子和梦想以外一无所有，又想起那个虔诚的打字员，蒂吉还是丽吉，就是那个怀了篮球运动员的孩子而男的又不承认，现在生下个有蒙古病、或者照那个红指甲的说法是蒙古症的孩子的女人。还想到了那个害了相思病的猩猩，和那个铁皮糖盒，再就是那个一度老是眨眼睛、即使在夏天也是一身寒气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当全班都穿短衣短裤时他还穿着一件绿色套头衫和棕色灯心绒裤子，尽管我现在拿不准裤子是不是灯心绒的。不论诗人想说或不想说什么，都挡了诗的道儿？我真该主动和他聊聊。我该请他来这儿，到家里来。应该让他讲出来。可我只是一刻不停地掠过了他的孤独。还有一次他说他觉得词句是个圈套。我现在想不通当时为什么没意识到他的这些话原本是一种求助的呐喊，就像以斯拉·扎斯曼在一首描写秋夜的诗中写的："那里挂着一副微笑，渐弱、无力而哀伤。"

山顶上冒出一弯撒拉逊①的新月，苍白的光线洒在废弃工程和公寓街区上。没有一扇窗户里还亮着灯。街灯还在毫无必要地照明，其中一盏亮亮灭灭地闪个不停：毫无意义。一只猫从阳台下走过，消失在灌木丛中。山那边有射击的余音，然后是轰轰的回声，接着又是冰冷的沉寂，触着我的皮肤。我又记起了曾在银行工作、在发现那个男孩尸体两天后死去的姑妈。一位姿色平平的干瘪女人，铜色的头发用塑料蝴蝶结固定住。她有个可笑的习惯，在银行，每当你面对她坐定和她讲话，她都会用缀满雀斑的手掩住口鼻，仿

①撒拉逊（Saracen），撒拉逊人，阿拉伯人的古称——译注。

佛总在担心自己会有口臭，或者不如说担心你有。她总喜欢以“百分之百没问题”来结束谈话，说的时候语音单调。一阵瑟瑟声袭过黑黢黢的花园，仿佛我关于死亡的思考脱逸出去降到了那几丛夹竹桃中。又仿佛那条狗拖着残疾的躯体在下面爬行。有一阵我觉得好像九重葛凉亭下的那条旧长椅朽了：月光改变了弧度，长椅支柱的阴影和那些支柱混在一起，让椅子看起来像涟涟水波中倒映出来的破碎影像。那天在教员休息室里，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表示我是男孩惟一喜欢的老师，好像在说一件只有我不明了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我应该让他给我看他儿子写给他的那些信，特别是提到从未存在过的铅笔的那一封。

七点差一刻的时候西奥把我摇醒，他充满朝气，刚刮完胡子，健壮结实，穿着一件烫出整齐线条的带肩章的蓝衬衫，宽肩、灰发让他看起来像个退休的殖民地士兵。他腋下夹着晨报，给我拿来一杯他平时用以提神醒脑的热腾腾、味道很冲的黑咖啡，是他亲手研磨过滤的，好像在试图把这一幕掺合进那部残忍的英国电影。很显然，昨天半夜我没上床，而是在起居室的躺椅上睡着了。我从他手上接过咖啡说：听着，别生气，我昨天答应过要在从贝尔谢巴回来的路上加满汽油的，但最后我忘得一干二净。没关系，西奥说，我会加的，一会儿在我开车送你到学校以后去办公室的路上。我缺的不是时间，诺娅。

西奥的办公室，规划有限公司，在红绿灯边上的那幢大楼的顶层。有里外两间，一张绘图桌，一张办公桌，各种挂在墙上的地图，一张大卫·本－古里安①在沙漠里坚定凝视纳哈尔金②的彩色照片，两个金属柜子，几层架子放着不同颜色的文件袋。办公室外间的一个角落里有几张简单的椅子和一张茶几。

周五。十点一刻。平常周五的时候不办公，但这个早晨西奥来了，等着清洁女工纳塔利娅，其实她也有一把钥匙。他打算在她来之前拆阅一两封信件。他打开空调和绘图桌上的强效灯。然后，他又变了主意，关上灯走到窗边去等。他注意到有一小群人聚集在书籍文具店吉勃阿的柜台前：他们在等本该在九点就到的报纸。今天早上报纸晚了。据说是警察在贝尔谢巴通往外部的所有路上都设了关卡，因为那儿发生了一起银行劫案。纪念碑附近，两个带着大沿儿草帽的园丁在挖地，以便在死去的迷迭香那里种上新的迷迭香。西奥自问为什么自己不能在这个早晨干点工作。至少在纳塔利娅来之前。他可以写下两行关于弥兹佩·拉蒙计划的前期设想：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概述，或者再加上一两张无关细节的草图，都不需要附加比例尺。他们还没做出预算呢，还没最后敲定一切，也没要求他拿出具体的规划方案。他想了一会儿，但没找到灵光涌现时通常伴随的智慧的火花。纳塔利娅今天怎么了？也许应该给她打个电话，看看有什么问题，尽管他印象里她们家好像住在预制板房里，不知道有没有电话。有一次她用夹杂着些许希伯

①大卫·本－古里安（David-Ben Gurion，1886－1973），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之一，以色列第一任总理——译注。

②纳哈尔金（Nahal Zin），以色列南部地区。面积大约1400平方公里，位于死海和内盖夫沙漠之间地带，现在是旅游热门地带——译注。

来文的磕磕巴巴的英语解释说她丈夫是个嫉妒狂，哪怕一点关于男性的话都会引发猜疑，甚至对他自己的老爸。他想想她，还不过是个孩子，才十七岁就结了婚开始被蹂躏的生活，一个柔顺羞怯的姑娘，不笑的时候嘴唇就会抿成要哭泣的样子，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让她浑身颤抖、面色发白，她的胸部和腰部属于发育成熟的女人，但长着一张女学生的脸。他一下子欲火中烧，强烈得像一个握紧了的拳头。

周五。诺娅要在学校待到十二点半。他们约好稍后见面去逛商店给她选一条裙子。他早上没冲澡，为了留住现在还闻得到的她留下的爱的气息，不是用鼻孔而是毛孔。她的笑声、她的热情、她的身体、她瞳孔中快速闪耀的光华——甚至她布满皱纹有星点棕色色斑的手，比她其他部分老好几岁，仿佛毁灭的力量在此聚集，就等一声令下才散遍全身——在他看来都直接联到了生命的本质。她自己就像电流般将生命导入了他的体内。尽管是纳塔利娅勾起了他的欲念，光亮却来自诺娅，也将回到她那里。他无法将这解释给她听。所以取而代之他要给她买条裙子或者再加上一件衣服。现在纳塔利娅还没来清洁办公室，今天也许就不来了，他有足够的时间站在窗边看着红绿灯边的广场。男性世界到底怎么误读了阿尔玛·马勒？阿尔玛·马勒到底是什么样的？两个问题都很空洞。有一次，在墨西哥城，他在一次现代音乐节中连续两个晚上听了《悼念亡儿之歌》[①]的演出，一次是钢琴伴奏的男中音演唱，另一次是一位有深沉嗓音的女歌手的演绎，可能是个女低音，充满渴望却又纯静平和得像是在告别。西奥记得女歌手的演唱有那么强烈的哀伤，以至于他不得不起身离开礼堂。组曲中第二首歌叫《现在我看清火焰为什么这样暗淡》，第四首是《我总以为他们出远门去了》。这些曲名像大提琴上发出的单一音符一般引发他的钝痛。无论怎么回忆，他都无法记起其他的曲名了。今晚得问问诺娅。

窗下一个戴头巾的妇女走过，两手各拎一只为安息日准备的刚宰了的鸡。女人很矮，广场又很脏，鸡冠子在人行过道上拖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

①《悼念亡儿之歌》（*Kindertotenlieder*，英 *Songs on the Death of Children*），奥地利犹太裔作曲家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根据德国诗人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的诗歌创作于1901年至1904年间的一套组曲。主要表达对人们失去纯真观念的伤感——译注。

西奥在胡子下面展开笑容，几乎忍不住精明地眨了眨眼，像个贪婪的农民有点怀疑砍价的对方正在耍花招要诱他中圈套。那个女人已经消失了。

拉美裔犹太人教堂前临时支起一张桌子，就是一张门板搭在两只桶上。上面摆满了书，好像全是为防潮防虫从柜子里拿出来通风曝晒的圣书。十点半了，纳塔利娅还没有来：她今天不会来了。是不是她丈夫又把她关起来了？他会用皮带抽她吗？他得赶紧找到她的住址，这个上午之内。跑去看看他能帮什么忙，必要的话就破门而入，以防不测。还有时间：诺娅两个钟头内还不会来。但是装报纸的出租车从贝尔谢巴赶到了。莉莫·吉勃阿，吉勃阿漂亮的女儿，熟练地把报纸安顿好，把昨天出租车送来的增刊加进刚到的报纸里。吉勃阿，那个圆滚滚的大熊般的、精力充沛的男人，让人联想起老实巴交的商会职员，一头灰色卷发，一个啤酒肚，看起来像是随时准备着要大声宣讲什么，他已经开始向挤向他、伸出手的人群卖起《新消息报》[1]和《晚报》来。西奥草草写下几样办公室需要的文具的清单决定等人少点的时候下去到吉勃阿的店里买，没准儿趁周末的《晚报》没卖光时再买张报纸。至于弥兹佩·拉蒙要他画的草图，还不着急，下个礼拜他脑子里也许能涌出很多好主意。让他们等着吧。他们当然不急于在一个周末建成他们的休闲中心，实际上他们永远都建不成。真希望那里迄今为止建成的一切都能被抹去重新开始，不再用丑陋的住宅方案，而是采用低调的建筑风格，充分体现对安静的火山和起伏连绵的山峦的尊重。他锁上办公室的门下了楼。

皮尼·波佐在他鞋店的墙上挂了一排肖像画当做装饰：迈蒙尼德[2]、犹太教仪式派列比[3]、神圣的拉比巴巴·巴鲁。或许这些毫无用处，但也无伤大雅。尽管他自己并非严守戒律的犹太教徒，但心里还是敬畏上帝的，也对两千年来一直保护我们不受邪恶伤害的宗教怀有敬意。除了这些拉比们的画

---

①《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希伯来文晚报，创刊于1939年。支持利库德集团，日发行量30万份——译注。

②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西班牙犹太裔神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他的学说对基督教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的神学思想有很深刻的影响——译注。

③犹太教仪式派列比（The Lubavitcher Rebbe，列比是哈西德派特有的领导人称号），这一说法专指活跃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犹太教教士施内逊（Menachem Mendel Schneerson），有众多追随者，精于解说律法（《圣经·旧约》之首五卷）——译注。

像，波佐还挂了一张以色列前总统的照片，纳冯[①]，一个深入民心备受欢迎的总统。这张照片的两侧，一边贴着沙米尔[②]，一边贴着佩雷斯[③]，他觉得为了公众利益这两个人应该和平共处并再次联手对付内部的冲突斗争局面：抵抗意图摧毁我们的外敌已经带来无数的必做之事，全国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共同前进。波佐的老婆和年纪尚幼的儿子几年前在这里的一次悲惨的事故中被杀，一个年轻的失恋的士兵堵住鞋店，用一挺轻机枪向内扫射，击中九人。波佐本人得以逃脱是因为那个上午他正好上社会安全部去听证部门对他的财产估价。为了纪念太太和孩子，他给教堂捐献了一只用斯堪的纳维亚木头做的约柜[④]，还想以纪念她们的名义给足球场的更衣室捐一台空调，这样运动员中场休息时就能凉快一会儿了。

人行过道的尽头，在波佐鞋店旁边，有一些市政设施的长凳，还有一个下面带沙坑的塑料滑梯。在印第安山毛榉树中间时髦的混凝土花坛里，几株矮牵牛花奋力生存着。瞎子路波就坐在一张长凳上，面朝炎炎烈日。他的身边全是鸽子，有几只甚至停在他的肩头。他的拐杖像锚一样安全地戳在两块石头的夹缝里。人们说，在保加利亚老家时他在安全部门有高级职位。在特尔科达这里，他晚上在电话交换局工作，用指尖照看按键和开关。每天早晨他都坐在小公园中，让他的灰狗牵着，直瞪着太阳，撒玉米粒喂那些在他来到之前就扑扇在长凳附近的鸽子。有时，某只鸽子会信赖他而毫不设防地落在他膝盖上梳理羽毛。他站起来时偶尔会绊到狗身上，这时他会礼貌地小声说道，对不起。

---

①纳冯（Yitzhak Navon，1921－　），以色列第五任总统（1978－1983），倡导协调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的问题。生于耶路撒冷，是拉美犹太人后裔。任期内致力于改善拉美裔犹太人与俄苏东欧犹太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左派与右派的关系，很有效地调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不稳定局势——译注。

②沙米尔（Yitzhak Shamir，1915－　），以色列总理（1983－1984，1986－1988）。1983年起担任利库德集团党魁。1984年大选时利库德与劳动党合作，佩雷斯任总理，沙米尔任外交部长，1986年时互换职位继续执政。对巴勒斯坦武装行动采取强硬态度——译注。

③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1923－　），以色列总理（1984－1986，1995－1996），外交部长（1986－1988，1992－1995，2001－2002）。1977年起接替拉宾担任劳动党领袖。被称为“人民公仆”，为以色列国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努力实现中东和平进程——译注。

④《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有如下记述：“摩西登上西奈山领受耶和华的律法和诫命。耶和华用手指写十诫（Ten Commandments）在两块石板上，与人类定约。法版装进按上帝旨意精制的用皂荚木打造、内外包精金的华丽容器中，由摩西拿下山告诉以色列人上帝的吩咐。”这一容器称“约柜”——装载盟约的木柜（The Ark of the Covenant）——译注。

一对定了婚的男女，阿娜特和奥哈德，站在毕阿尔金先生的家具店门口，他们在找适合他们那套三间套房、并与窗帘相配的室内装潢用的布艺织物，但他们的品味不同：他喜欢的她都觉得难以接受，而她喜欢的都让他联想到波兰军官光顾的妓院。她不怀好意恶狠狠地问他这种经验之谈从何而来，他则草草收兵。你瞧咱们，没有目的的争吵。阿娜特答道这不是争吵而是意见分歧，而这是十分寻常的。奥哈德提出妥协之策：周末过后咱们上贝尔谢巴，那儿有更好的选择。那正是我一早提议的啊，她耀武扬威地呱呱道，可你就是不听。毕阿尔金先生温和地插话道：也许女士想看看目录，要是里面有什么她中意的，我可以周二到特拉维夫去弄回来，上帝保证。奥哈德从他的角度纠正她：我不否认你是建议了，但也是你说的先上毕阿尔金看看，要是那儿没有好的……他的未婚妻打断了他：我不否认我说了，但你不能否认你同意了。男青年勉强承认了这一点，但请她回忆他对此是很有保留的。保留，她说，你一下子就变成律师了？接下来要起诉了吧。

他们离开家具店后毕阿尔金说：这就是当今的世道。忧患重重一直到死。我能为您做点什么，西奥先生？一张摇椅？木制的？不，我这儿没有您想要的。我这儿有一张能摇的电视椅。现在可没人再生产老式的摇椅了。西奥谢过他离开。他想起《悼念亡儿之歌》组曲里开头一首叫《太阳再次升起在东方》，但不太确定。最好让诺娅在学校的图书馆查一下，她经常花时间在图书馆查证这些东西。

恩德培三明治店前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贝督因人，正在买肉馅饼。肉馅饼是个冒险之举，阿弗拉姆欢快地向那个贝督因人解释现在还是试卖期。要是卖得好的话，几周以后我们会尝试卖烤串儿。正当此时，一只尾巴高翘、傲慢的白猫昂首从卡什纳几天前刚下了小崽的母狗身上一跃而过。母狗选择装睡，但一只眼张开条细缝以观察这傲慢的程度。猫和母狗都表现得好像一切状况都在它们的尊严之下。老卡什纳对西奥说：怎么了，好几天没见你了。西奥的左眼眯起来，像是在看显微镜，回答说一切如常。你要是想要只小狗的话，卡什纳说，但西奥从权威的胡子下面坚决地打断了他：不要，谢谢。完全没有必要。

十一点一刻，一个小小的送葬队伍通过红绿灯，只有几个送葬的人，大部分是上了岁数的欧洲犹太人。皮尼·波佐坐在他鞋店门廊前那永恒不变的椅子上，问死者是谁、死因是什么，装订商卡什纳告诉他那是老伊利亚，药剂师沙兹伯格上了年纪的叔叔，那个瞌睡的老傻子，每天总是在逃离邮局和坐回邮局板凳上之间反复不止；每隔五分钟，他都会排到队里面来，一轮到他就会问，伊利亚什么时候来，不论人们怎么赶他走他总会回来。

送葬的队伍行色匆匆。护柩者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眼看就要到安息日了，日落前他们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年长的哀悼者努力喘着气，棺材和送葬的人中间拉开了间距，走在头里的人和最后的人之间也间隔开来。经历了这些骚动，盖在一张泛黄的晨祷披巾下面的尸体看起来像在痛苦地翻腾。一位浅色头发、胡子稀疏的虔诚青年教徒领着队伍匆忙前行，咔哒咔哒地摇着一个锡铁罐子，承诺着施舍救济能救人于死亡。西奥就这一点想了一会儿，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观点。

从香榭丽舍发廊传来喧闹的争吵，是发型师薇欧莱特和玛德琳姑嫂。从广场另一端都能听到她们的喊叫声。一个嚎啕道，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还是污秽的谎言。另一个扯着嗓子还嘴道，臭三八婆，就是你，你敢说我污秽。她们都上过穆奇·佩莱格的床，现在没准还是这样。穆奇·佩莱格正在和一群出租车司机坐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喝啤酒，他就争吵的喊叫声发表了一通具体详尽的比较，引出一片沙哑的大笑。穆奇用他左手的六个指头紧攥着冰凉漫溢的啤酒杯。然后他们喜气洋洋地聊起保值股票来。与此同时，送葬的队伍消失在特尔科达地方议会大楼后面，吉勃阿店前的人群也散了，还有很多报纸等待出售。漂亮的莉莫·吉勃阿站在收款机后边盯着阿娜特和奥哈德看，他们已经离开家具店，进了电器专卖店。卡什纳用下巴朝她点了点，对波佐说，瞧瞧那位是怎么待自己的吧：活脱一个戴安娜王妃。波佐伤感地说，在俄罗斯移民涌入以前，她可是国家级的大提琴演奏家。现在从俄罗斯来了上千她这样的人，她就不算什么了。这就是名声：就像水。昨天还渺无踪迹，今天已经流转起来，明天又无影无踪了。你还记得有个叫尤拉姆·梅里德的总理吗？曾经家喻户晓的那个？电视里总有他？听

说他现在在内坦亚河口开了一家商场。这就是名声。

西奥买了份《晚报》和一份当地报纸，到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坐下，点了一杯西柚汁。穆奇·佩莱格请他到他的桌子那儿去，他管那张桌子叫“律法圣人委员会”。西奥犹豫了一下说，谢谢了，下次吧。穆奇加了一句，就像正在打绳结的行刑人递给死刑犯香烟时死刑犯所说的一样。

西奥浏览了一下大标题。新生敌意的风险。北部城镇阿克一名聋哑离异妇女活烧前夫情人。交通部长走出庆典以示抗议。油价将从周六午夜起上涨。安全部门阻止……他脑海里，还追随着欧洲犹太人安息日前夜那匆忙的送葬队伍，他们现在一定已经走过丢旧车的废弃场到达公墓了。先把担架拿下放在墓地通路上：无论乐意与否，他们都得等落下的人赶上来。前面的匆忙全都白费：最后的送葬者到来之前他们无法开始。匈牙利灵歌领唱者饱含着做作的悲伤，让肺里吸满了空气，脸涨得通红，开始刺激祈祷者“我主饱含激情”。他亮出一句习语，“愿他在天堂永生”，说到“他将在最后的审判日面对命运”时鞠了一躬，送葬者都道“阿门”。然后他们把药剂师沙兹伯格推上前来，要他用带着欧洲犹太人口音的亚拉姆语一字一句地迅速重复灵歌领唱者咕哝出来的句子，夸张地赞美、认可的神圣。每天他都会消失，但人们从不担心，因为他一到八点准会出现在邮局那里，孩子气的蓝眼睛里闪着羞涩的笑容，那种笑容是忘记了快乐来源的羞涩的男人的笑。灵歌领唱者请求得到死者的宽恕，原谅葬礼准备或葬礼本身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可能导致的对他的不敬，最终将他从生前曾经隶属的一切团体组织中解放出来。他曾经在街角迎上你，礼貌地鞠上一躬，蓝眼睛闪耀着温暖和情感，用柔和的声音问：请原谅，先生，您能好心地告诉我伊利亚什么时候来吗？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全城人称为伊利亚，或者药剂师沙兹伯格的伊利亚。

掘墓人把帆布斜拉起来，这是一项需要精确配合和机灵的操作。那个胡子稀疏的虔诚青年轻轻抓住死者的脚，像个娴熟的寡妇一般让缠好的尸体顺利地从担架上滑进墓坑。他们飞速拉开晨祷披巾，像是剪断脐带的束缚一样。然后放落五块预先做好的混凝土板，用铁锹开始铲一堆圈在矩形灰色水泥框里的泥土。坟头上，位置大概是在逝者眉毛的上方，一张金属牌上刻着

的不是伊利亚，而是古斯塔夫·马尔莫莱克·利普。哀悼者尴尬地沉默了几分钟，好像不知接下来应该如何是好，又或者在等什么必要的暗示，接着一个人弯腰放下一块小石头，其他的人如法炮制，有人走向大门，烟瘾上来了，其他人都跟着他去了，又匆忙起来。这是周五中午，一天快过去了。主掘墓人关上了上面竖着生锈铁丝网的低矮铁门。几辆车发动，蜿蜒前行消失在山后边。鞋匠波佐的太太和孩子就葬在这里，在上区，四排之隔就是士兵阿尔伯特·约述亚，他因为单相思而将这母子和店里其他顾客用轻机枪杀害，十分钟后被警方的神枪手一枪击中毙命，在前额正中，眼睛之间。今天的尸体被安排安眠在十二班的年轻学生伊曼纽尔·奥维埃托和两天后因脑溢血而亡的姑姑旁边。那个男孩的妈妈已葬在阿姆斯特丹九年了。周五中午沙漠中的山丘下万物安详。黄蜂不停地嗡嗡环绕着一只生了锈、漏水的龙头。两三只鸟隐藏在针叶被东来之风轻轻吹拂的松树里，还要在那儿叫上一会儿。紧邻着尽头的坟头边，是一个被军队用铁网拦着的陡岩，禁止入内，人们说那边是一个宽阔的峡谷，里面安满了秘密装置。西奥付了饮料钱，回办公室。他得再看一下他的俄罗斯清洁工，她丈夫是不是拿着斧头找来了。诺娅再有几分钟就到了。“沙漠时尚”，他打电话问过了，周五开到一点钟。小公园里，盲人和狗还坐在那儿，周围全是鸽子。现在他正从军用水壶往塑料碗里倒水给它们喝。西奥忘了买写在纸上的那些办公室要用的文具。下周会买回来的。不着急。还发现他把只浏览了大标题的《晚报》丢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的桌上了。本地报纸也留在那儿了。此时，简单的回答是，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伊利亚什么时候来或者他到底会不会来。我认为他不会来。但是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她最后选定了一条裙子，有点土气，像是巴尔干风格的，胸口下面有个蝴蝶结。一开始，她对着这条新裙子露出了少女般的快乐。在镜子前扭着肩膀和屁股好像跳着舞。但初始的快乐过去后迎来的是犹豫。是不是太土气了？太招摇？而且，她能在什么样的场合穿这样一条裙子？实话说，葆拉，是不是有点像民族舞蹈团的制服？她在镜子和女导购中间苦恼了十多分钟，女导购宣称她们俩，裙子和诺娅，就像美酒和音乐一样是为对方而生的。她用同样的口气承诺要帮她拿掉垫肩、把后面改短、再把蝴蝶结往下挪一两英寸。

我站在挨着收银台的角落里，没吱声。我觉得在她夸张的亲和背后，这个女导购满肚子都是嘲笑。但我没有卷进去。我继续站在一边，手插在兜里，隔着手绢判断哪个钥匙是车钥匙，哪个是公寓的、办公室的或是信箱的。然后我开始数钱包里的硬币：八谢克尔八十五阿高洛[1]，除非那个阿高洛是一个谢克尔硬币，那样的话就一共是九个谢克尔零八十阿高洛。

大约过了一刻钟，她做出了有违自己意愿的决定，她问了我的意见。

转个身，我说，站直了。走一下。就这样。

你喜欢吗，西奥？

还可以，我想了想说，只要你觉得合适。没把握的话就别买。

诺娅说：但这不是你给我买的礼物吗？

葆拉·奥莱芙慌忙插嘴道：可以和这条皮带配，或是这一条。试试这么系怎么样，系在边上，或是正中间，怎么弄都绝美。

---

①阿高洛，以色列货币单位。1谢克尔=100阿高洛。1美元=100谢克尔——译注。

诺娅突然看了我一眼，流露出请别离开的神情，像是从生命的内核送过来一股热烈的冲击波。我颤抖了。

西奥？

我说要是她还拿不定主意的话，现在是星期五下午，星期天上午这条裙子还会在这儿的。着什么急呢？

出来时她说：真遗憾。我挺想周末就穿的。我被你的逻辑分析绕住了。

我说要是星期天上午她还是不喜欢那条裙子，她可以等再去贝尔谢巴或者特拉维夫时找找更合适的。诺娅让我别老暗示她的这些出行。她还将一如既往地在需要的时候出去，用不着我批准。而且，谁说她需要新裙子了？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蹦出裙子的事来了？是你说今天要给我买条裙子，西奥，但和往常一样你那平衡的算计破坏了一切，你那些有什么问题、着什么急，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那样，还有你一贯的把我变成反复无常的小丫头的伎俩，还暗示我的出行。你可真不好相处，西奥。

我说我没暗示。

诺娅说：但你就是这么想的。别否认。你脑子里坚信我扛起的这个项目，不是一个项目，不如说是爱好，是毫无必要的，是愚蠢而且超出我的承受能力的。

我说：没这回事。

诺娅几乎眼泪汪汪地说：可我现在就想买。我周末就想穿。我们回去好吗？

我们在科达饭店门口掉了头又开回“沙漠时尚”，正好在葆拉·奥莱芙关门前赶到。她为我们开了门，诺娅又穿上了那条巴尔干风格的裙子。葆拉说她就知道我们会回来的，她一眼就看出这条裙子喜欢诺娅的程度超过诺娅喜欢这条裙子，穿在她身上显得那么朝气，那么相称，那么酷，就像她女儿老说的，你一定认识她的，诺娅，塔尔·奥莱芙，八年级时你教过她。

我拿出信用卡时诺娅突然羞涩地说，她还没百分之百下定决心。他要我这次真心地说我的想法。我说：你好好想想。问题是你穿着这条土气的裙子感觉好不好。

葆拉·奥莱芙问我是不是赶时间。诺娅抱怨我不帮她拿主意，让我别再给她施加压力了。你太难对付了，西奥，越来越不开心。土气这样的词不是真从你心底的善意里冒出来的。她转向葆拉问她还有没有同一类型但花边不这么明显的裙子。

两点一刻我们再次离开了商店。没有裙子，也不再有我们一起进商店时浅浅的情感默契，那是夜晚的余温，从昨天晚上留下的，现在我们失去了它。即使我指出最先说出“土气”是她而非我，也无济于事。回家路上我们在帕勒莫草草吃了一顿比萨，这样就不用回家做午餐了。三点之前我们在超市完成了周末采购，拿了干洗的衣服。一起把塑料袋里的东西放进冰箱、厨房的柜子，把衣服放进衣橱。诺娅说一眼就看得出葆拉是那种从你的快乐中得到快乐的好人。这样的人可是稀有品种。她就像是在给她自己挑裙子，不是要卖给我。我很高兴咱们回去了，她说那条裙子喜欢我。你没在听吧，西奥。你不喜欢待在那儿。你表现得不太好，一点都不在意我，葆拉不该承受你带来的北极寒流。

这么热的天气里来个北极寒流，我说道，倒也不错啊。我继续说道，我可不觉得奥莱芙太太像你说的那样儿。她看起来工于算计。不过当然我可能错了，这个看法可能不公平。这引来诺娅对我的“性格”的几句严厉的评价——我总是觉得别人在蒙我，总是用消极的眼光看待事物，事先或是任何场合我都是疑虑重重、防卫过当，好像别人都是敌人。整个世界都和我们作对，反正这就是西奥眼中的世界。我父亲是个暴脾气，甚至有点攻击性，他能朝你扔把手甚至发狂，对我暴怒，朝我扔收音机，或是把收音机扔到墙上砸烂，但他并不阴郁。他也不冷嘲热讽。有时候你比他还像个惯坏了的孩子。比穴居人还过分。

你这闪电判断是否太非黑即白了，诺娅?

对你来说什么事都是黑的。

她离开房间，脸涨得通红，火星儿乱蹦，愤怒地推开门，但在最后一刻把住没有摔门，而是柔和地将它无声地掩上。

她冲澡冲了很长时间，显然是凉水澡，然后把自己关进卧室。因为晚

上，她说，她没能睡着，直到大概早上三点时才倒在起居室的沙发里：你的紧张，西奥，像气味一样充满了公寓。

我知道该怎么还击。但我忍住了。我集中精力想了一下没发现我有什么内在的紧张，只有挥之不去的倦怠。她关上门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周末的《晚报》和本地报纸留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了。BBC全球播报，从伦敦，经过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的中转站，带来南美热带雨林遭受毁坏的具体、残忍的描述，系列报道的题目是“自然之死”。热带雨林又勾起了几个回忆，我对“自然之死”这样为了震撼听众而撰出的表述无动于衷。恰好相反：“自然之死”对我而言颇具抚慰效果，我甚至睡了二十分钟，直到这个节目接近尾声、下一个关于航道改线的节目开始时才醒来。帮助她的惟一方法就是不要试图帮忙。我得管住自己不发一言。多少次我想帮忙却惹得她泪水涟涟？有一次，她不在家时，我把整个公寓里她乱丢的纸条收集起来：厨房桌子上，起居室的茶几上，电话旁，她卧室里的书架上，走廊和起居室的架子上，冰箱门上磁铁下面，她的床头柜里，还有她床脚地板上。我把这些搜获品放在我卧室的桌上，花了将近三个小时替她分类整理：信件放在一堆，草稿和记录在另一堆，有公众意见调查，她从图书馆员专门为她摆放的关于麻醉品及其制法和配量、影响、上瘾和康复的希伯来文和英文书里用她那一手漂亮的字做的摘抄，还有一堆是内容说明，来自各个组织机构和部门不协作或否定的回答，有些很礼貌有些则不，还有成百上千张写着电话号码和开会日期的纸条。

初步整理之后，我把带日期的放在桌子左侧的那堆里。我把它们按日期、主题和地址排好。我替她把电话号码全抄在一个小本子里。我清出自己的文件夹，把她所有的文件分成八类，用不同颜色的分隔纸板隔开，在纸板上明确地写出每项的内容。

真棒，她进来的时候说，妙极了。井井有条。谢谢。

下一秒钟，满眼泪水：谁给你这个权利的，西奥？这不是你的东西，是我的。

我承诺。再也不碰它们了。甚至当整理好的内容又散开、再次像羽毛般

落在公寓每个可能的角落时，我也一言不发。

还有一次，我上午离开办公室到红绿灯对面的印刷店去，以她那个委员会的名义定了些印有抬头的纸张以及一本收据，店里要求留电话地址时我甚至把家里的给了他们以便联络。这次她既没谢谢我也没眼泪汪汪，只是用平静、冷硬的声调说，像是在训一个搞破坏的学生：西奥，没有好结果的。

我说：试着理解，诺娅。聚精会神想一下。我注意到，除了你那个非洲捐助人，那个吸毒孩子的爸爸。你至少还有两项恩惠来源。都是小小不言的。实际上不值一提。但是，你要明白这里的法律规定，任何捐款，不论数额多么微小，都必须有正式的收据。否则就是违法。你当然不希望我们卷入麻烦。

她站起来，转转她浅色的裙子，把左颊的头发猛地甩到脑后，好像对我摊牌似的说：我们不会卷进麻烦的，西奥。至少，也就是我，不会是你。你还是眼睛里的光华。你不是此中一员。

要是我再倔一点，我会十分简单地说明，尽管我承诺不插手而且我一直恪守着承诺，严格说来任何与她有关的事都牵扯到我们，因为我们在银行有一个联名账户。更不要提那个父亲每月寄来支持委员会运转的三百美金了，没人知道这档子事，除了她本人没人知道她到底怎么支配的这笔钱。然而我没有再费劲。只是说：你瞧。这是收据，不管怎么说已经印好了。给你，放在桌上了，留在这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贝尼兹利，她突然冷哼了一下，谄媚、油头粉面的地中海人，说你是人中天使。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西奥？一块墓碑。无所谓。我的头疼起来了。

我回到走廊继续熨衣服。内心里我同意她的观点：毫无希望。特尔科达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戒毒疗养所。要是有的话，一个月内也必定关张。不过，这是她给自己找的一件事儿，不要我的帮助。我必须归于无形。不过也许，另一方面，我也许该找那个奥维埃托，让诺娅和其他人都远离这个闹剧，确保她永远发现不了我搞定那个骗子的手段，以及我对他说的话和我如何解救她于麻烦。但是，算了。我还是等待。

星期六。下午三点。西奥穿着汗衫躺在他自己房间的地板上，旁边的电扇吹着风。我坐在厨房桌边，面前摆着葡萄和咖啡，读一本美国的专论《成瘾的化学因素》。多年来，两个学派一直在争论毒品成瘾究竟是一种病理，还是人们天生倾向于依赖所谓对精神有影响的物质，比如那些能在烟草、酒精、咖啡、春药里找到的物质；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导致依赖的物质无所不在。尽管有一定保留，人们还是在毒品成瘾依赖和某些已知疾病之间找到了联系，比如糖尿病这类遗传因素还有那些外在环境能够影响或阻止病情发展的疾病。戒除了毒品的人仍有长期潜在的问题伴随，也就是他比其他人更容易故态复萌，可以用那句希伯来谚语做括号里的注释“极易重归罪恶之路”。我一边在纸上写下阅读过程中想到的问题和异议，一边觉得这句话很不公平。突然，穆奇·佩莱格出现了：激动，上气不接下气，头上是白兰地酒广告里年轻哲学家那样的飞扬卷发，乱蓬蓬的，穿着流行的肥腿裤，红衬衫开口处系着一条风雅的丝巾，一个五十岁的孩子①，穿一双天蓝色耀眼的鞋子，鞋面上大写字母 B 下面有几个小透气孔。他上万次地请求我的谅解，但他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说。他总有十万火急的事要说。不是这件就是那件，总之都不容耽搁。我有时挺喜欢他这种彻底的难以抑制的热情。

我抬手想把身上那件浅色裙子的衣扣系上，发觉已经系好了。让穆奇在厨房的桌子对面好好坐下，我合上书，把作记录的那张纸头当了书签。我无视他的抗议，给他倒了一杯冰可乐再递给他些葡萄。西奥哪儿去了？休息

①原文为“a fifty-year-old teenager”——译注。

呢？万分抱歉在这样一个不会客的钟点闯来，我平时还是会很神圣地对待周六下午的。但是突然出了点事儿，非得今天决定才行。顺便提一句，你穿这条绿裙子简直像花茎上的鲜花。不过在你身旁任何鲜花看起来都会像野草。长话短说，要不是眼下有这件棘手的事儿他会马上跪下来，要是我能爱抚他一下，就像没腿的男人对缺臂的女人说的那样。他开玩笑般抬起那只六指的手，把作成手枪状的手对准太阳穴，以此表达那份无望的单相思。他可能想幽默一把，不过当他发现没达到效果时他笑了，说，没关系。接着又说，我现在正和琳达处着呢。不过那不是我来这儿的原因。要点是，我们得告诉西奥出现了一个大好机会，失去它简直就是犯罪。简言之，我给咱们找到一幢楼。实际上是一座宫殿。只要八万五千美元，因为我是中间人所以不需要中间费，惟一要做的就是明天起草一份协议书再落实合同条款，交钱，交接所有权，一方不落的签署合同，一切最晚要在周二早上之前完成。

我要他从头说来。

好的，小姐。抱歉，老师。好吧，是这样的。你肯定知道那栋建筑，瓦屋顶，就在工业区附近。人人都知道那儿。本·卢露车库对面的那幢阿尔哈里奇的房子。空了将近一年了。长话短说，是这样的。在这个城镇开始兴建时，这个叫阿尔哈里奇的内坦亚来的电视进口商想到个好主意要开始一项独家买卖，建一所房子，或者租给那些想和沙漠密切交流的艺术家什么的；或是给那些想和边上的玫瑰花骨朵乐一乐的，如果你听说过有这样的选择。很快就发现这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提议，有埃拉特、阿拉德、拉蒙镇，并不缺少沙漠天堂。这个阿尔哈里奇把房子租给了沙漠资源会，他们让开发油井的工程技术人员住了进去。长话短说，你知道的，他们挖啊挖，可什么也没有，于是房子空了，没人可租，现在代理人哭着喊着要赶快把它卖掉。重要的是要及时行动，就像白雪公主对七个小矮人说的。长话短说，他要价十万美元，但我砍到了八万五，承诺本周他就能拿到钱：这家伙现在出了点事儿，镇长就追在屁股后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诺娅。我有自己的办法。问题是这个老屎球，对不起，在与佩莱格公司（也就是我）接触的同时还接洽了巴格罗尼兄弟公司，那种新代理人，畜牲，这话可没想侮辱真正的畜牲。他们

也有个买主，一个自己开业的牙医，一个阿根廷人，新来的，会成为尼尔和德莱兹纳的竞争对手。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有自己的办法。你再给我倒一杯可乐好吗？看你站站坐坐的就让我口渴，这条裙子像花茎上包的玻璃纸。长话短说，是这样的：比起他们我们有几天的优势，因为很幸运那个牙医现在正履行职责在军队给人补牙。我们今天得下决心，找到仑·阿贝尔让他今天晚上就给尼日利亚打电话。要是钱能到手，我们明天就得赶去签一份临时协议，最晚在周一或周二付清全款。你怎么想：我是不是最棒的？说点好听的。要不亲一下？我查了这个产业。干净极了：没有抵押、没有利息、没有第三方插手。你不用管这是什么意思，别想了，诺娅。你只管想生活里光明的一面，让我处理丑恶的那面。你赶快把西奥叫醒，咱们一起去看看这处白金汉宫啊。尽管我应该阻止你这么做，这样咱们就能留在厨房乐一乐，至少是理论上乐乐，就像奶油融化在面包上时面包说的那样。好吧，我道歉。顺口就说出来了。长话短说，小姐，我把诊疗所放在银托盘上献给你。实际上钱不是小数目，不过你难道不担心我们得花上六个月得到许可，可能还得自己建造，就算我们能得到所有的许可，也得花上两倍的钱用四五年的时间。你难道不想说我很棒？那就别说了。你就是小气。你猜这周谁真的跟我说我是完美的？你不会相信的：一个埃塞俄比亚女人。离了婚的。招人爱的小尤物。你知道他们也离婚了吗？这是我第二次和黑女人，相信我，真有档次。实在是经典的档次。凌晨三点她终于发出那样一声尖叫，邻居们都以为是空袭警报呢。不过得确保不能让琳达知道。她肯定会误解的。长话短说，我们抓住了真理的瞬间。我们得让西奥评价一下那幢楼的现状，然后才好决定我们是要这个地方还是让牙医得到它。要是问我的意见，我说要它。我现在可是以委员会一员的身份讲话，不代表房地产中间人，我已经说了我不收一分钱的中间费。我个人想要快快抓住它，就像哥萨克人对吉普赛女郎讲的那样。尽管我们还没得到纸头批文。不过我们会失去什么？想想最差的结局，就算诊疗所永远开不了业，我们还是可以平静地对阿贝尔律师和神秘男子奥维埃托说那八万五千元和存在保险箱里一样安全：要是我们的事业搁浅，我能在六个月之内把它卖掉，卖九万或九万五。我甚至敢把这写下来。你觉得

我怎么样？说点甜言蜜语？

我说：你很棒。我一下子对这个竭尽全力让自己变成恶狼的穿着天蓝鞋子的中年的羔羊充满了同情。一头令人同情的、易受攻击的狼。更像是没有了外壳的乌龟：只要一个小小的轻蔑暗示，任何女人都能抹去他从三十年来引诱女性的马拉松中得来的战利品。那一刻我看到了十二岁的他：矮胖、无人疼爱、聒噪、卷在对自己的六指的超残忍笑话里，一个沉闷的、逢迎的孩子，想要紧随着每一个人，全力以赴而又无能为力地想娱乐整个世界，当世界拒绝微笑，他便陷入滑稽之中。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填充每个对话里的每段空白，阻止任何可能否认他存在的沉默。无止境地用一段段孩子气的蠢话给公共营火添柴，柴火用尽时他会起来把自己的心扔进嘲笑的营火。一个平庸的、长不大的人。

将近二十年，他一直是个离了婚的、追着裙子转的人（尽管他本人否认追着裙子转，妙语言道他追求的是裙子里面的）。他将女性整体视为苛刻严厉的法庭，一致通过决议勒令他不停地作出礼仪的表示以取悦她们，而她们从不满意。潜意识里，他明白它永远得不到渴望的宽恕，尽管他在那张永无止境的成果积分表上不厌其烦地加算着床上的得分。不论多么徒劳，他仍旧坚持，丝毫不怯懦地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喘息不止，似乎下一处便终于会给他带来那令人垂涎的与众不同、正式的豁免，和一张能让他中止无尽努力的证书。每一次，当他试图对我展现一个微笑、半严肃地表示着他闷着的热望，我收到的信息不是渴望，而是对会让他不知所措的、女性温和的接受的期盼。于是他蹒跚前行直至精疲力竭，一次又一次的引诱，无休无止嘲笑讽刺的言语，一幕又一幕的卧室镜头，喘息，自吹自擂，无尽的担心，恐怕女人们会在他背后戏弄他，这个奥德赛般的俗套英雄让孤独的离婚女子、报复丈夫出轨的老婆、变得尖刻的中年家庭妇女填充自己的地盘。

穆奇，我说，你很棒，我对你的那些埃塞俄比亚女人嫉妒得发狂。我怎么就遇不上一个埃塞俄比亚男人呢？但是你能告诉我房子里都有什么吗？你说里面是空的？

于是必须投资改进状况的情况浮上水面。比如说，要铺新地板。比如

说，洗手间的浴缸碎了，还有洗手池，就连房顶也是马马虎虎。里面还得作些改造，但那真的不是他的专长。最好让西奥跟我们上那儿转上半个小时，来个专业的“一锤定音”。要他给结构、移动墙壁以及加一层楼等等提些建议。除此之外，对那些瘾君子们，你要知道，窗户上的护栏、门上的锁、围栏，我也提过它还不够高。长话短说，上面怎么也得花上好几千，就像摄影师对裸体模特说的。实际上，这取决于我们想花多少钱。长话短说，面对变化咱们得决断，拉上西奥，路上捎上琳达和路德米尔，就是整个委员会了，真正好好看看，就像那个长角的意大利人一次对克里奥佩特拉说的。我们今天必须下决心，因为有那个牙医。对，我有钥匙。不幸的是巴格罗尼兄弟公司也有一把钥匙。不过那儿破破败败的其实根本用不着钥匙。你干吗那样看着我？破破败败是脏话吗？还是你突然明白了？意识到你终生寻觅的男人就站在眼前？好了，别发火。一不留神溜出来的话。我从来都没法说出真正感受到的和真正想说的。那是我全部的问题所在。西奥来了。嗨，西奥。看到我们在厨房里窃窃私语妒火中烧了？要是真的倒好了。睡了会儿吗？现在清醒了？咱们把你也拉进来吧。

不需要这样，我说。西奥完全没参与这件事。

西奥说：我只是要给自己来杯咖啡，然后就完了。

穆奇接道：你说完了是什么意思？有谁死了吗？正好相反，听听这件事，西奥，再跟我们一起去，好好看看，然后决定要不要那处地方。

我用平和的声音说：不是西奥决定，是委员会决定。

这时候水开了，西奥给客人、给我和他自己冲了速溶咖啡。给大家拿来糖和牛奶，从冰箱里又拿出些葡萄，洗净后搁进两个盘子放在大家中间，然后说道：怎么着，去还是留？多数意见是什么？

没等人回答他已转过身去，身上还是那件晒褪了色的汗衫，他的肩膀厚实坚硬，他放弃了，拿起杯子走了。留下来的只有他的忧伤，一如既往地裹住了我的肩膀。在他吱呀拉上的卧室门后，我都能猜到他双拳放在桌子上支撑着前倾的身体，从后面看像一只上了年纪、疲劳的狐狸，静静地站着仿佛等待体内发出些声音让他从这等待中解脱出来。我回忆起我们在委内瑞拉时

开头几次旅行中有一次，我们乘一辆吉普车行驶在一个雾气蒙蒙的山谷中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上，他突然说即便我们之间的情感是爱情，也还希望我们能继续做朋友。

我到他的屋里叫他回来同我和穆奇在一起。我叫他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他坐进厨房里他惯常坐的椅子里，背靠在冰箱侧面，静静地听阿尔哈里奇那幢房子的始末，问了几个简短的问题，听回答的时候过分耐心和精密地用牙签清洁撒盐的小孔，然后又开始清洁胡椒磨。穆奇总结道：不论怎么做都不会有什么损失。然后西奥宣布：这么做不行。

为什么?

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行。

我们现在上那儿看看又会有什么损失呢? 就几分钟? 全面看看那个地方?

没道理去那儿啊。从开头就不对。

是因为你反对和诊疗所有关的一切呢，还是因为你觉得这特定的一步错了?

两项都有。

失去这个机会难道不可惜?

没有什么机会。

什么意思?

我已经说了：这么做不行。

到那一刻为止，我一直觉得找楼太早了些。我觉得穆奇·佩莱格太急躁了，不应该因为有或者没有物超所值的楼就贸然地买下，而且在时间的压力下当天就要下决心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是西奥的嘲笑、他的不屑、他令人窒息的无礼、他农民般的坐姿：穿着汗衫，叉着腿，从他面前盘子里的葡萄串上故意挑中间的葡萄，这些都激怒了我。我爸爸的暴脾气突然之间像热油一般在我体内沸腾。在那一刻我决定决不放过这栋楼，只要它还看得过去。就像课堂上那些困倦的好炫耀的家伙用哄孩子的声调说，噢，那个阿格农后来

这样了啊，我会气得发抖，然后让她和全班同学写一篇很难下笔的分析抒情旁白功用的作文当家庭作业。

西奥，我说，我和穆奇当然不认为自己是实施项目的国际专家，或是失去显赫声明的企业家等等。所以你只需用简单的希伯来语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走这表面看来没问题的一步。

表面看来，西奥说：好句子。也包含了你的问题的答案。

不是我的问题：我们的问题。现在我和穆奇第三次询问你，你为什么反对购买阿尔哈里奇的房子，又不赞成我们现在去看看那房子是否合适？得到语言上的回答将比您那副鬼脸更让我们欣慰。

有十一条理由，西奥说，灰胡子下闪过一丝狡猾的笑意，可以解释为什么拿破仑的枪炮没有攻击斯摩棱斯克①。首先是因为没有弹药，余下的十条理由他恰当地拒绝再聆听。

你们提到的金额，即便不算上装修的那部分，已早早超出捐款人承诺捐献的数目了。还想听什么？

我们还有两个别的捐款人，我知道西奥晓得他们的存在。但我决定一言不发。西奥补充道：另外，我好像在本地报纸上读到说你们要志愿组成一个小组来调研可能性，没说要购买产业。再说，连公共程序里的初始阶段的初始阶段还没进行呢。而且，有人按照现在这所问题房屋的容量计算过你们计划在这儿收容的瘾君子的定员了吗？嗯？

等一下，西奥，我说。

还有，资金，要是有的话，那也不是你的，诺娅。大姑娘不会拿着不属于她的钱上商店买玩具。并且，你要改变那栋楼的功用至少要得到四到五个委员会的许可。我严肃地告诉你，你将会从全部这五个委员会得到负面的回应。你们还必须得到当地的规划许可，然后再……

好了。我们明白。但是为什么不去——反正就看看嘛？

还有就是要摆平镇政府，行政机构，本地政务委员会，地区政务委员会，规划的保证金以及进程，反对意见听证会，上诉，公众反对意见，政治

①斯摩棱斯克（Smolensk），俄罗斯西部城市——译注。

反对意见。至少三年。再有就是卫生部门、福利部门、教育部门。又两年。另外，谁持有土地拥有权？而且还有邻居们一致的反对，包括法庭诉讼。最少还要五年的法律听证。还有，到底谁是买主？以谁的名义登记产业？如何定义目的？另外——还要我继续吗？嗯？为什么不呢？

穆奇·佩莱格轻声咕哝道：可那儿没有什么邻居。

啊，欢迎你，佩莱格公司先生。原来你也在这儿。你代表新娘一方还是新郎一方？很好，您给邻居下个定义。请下一个法律上的定义，要是不太困难的话。请继续：到底什么是邻居？我说的可不是邻居的老婆。

谢谢你，西奥。我觉得这就够了。

随你便，他偷偷地笑了一下，一只眼睛眯着，像是在从显微镜里观察昆虫或是从照相机的取景框中看我们。还有，我刚才说了吗？——我好像许诺过不打扰你们的聚会？我忘了。从记录中把这一点删掉吧。再见。请继续。

说完这些，他还是坐在那里，轻轻松松的，背靠着冰箱侧面，紧盯着他的咖啡杯，从葡萄串上机械地摘葡萄。他那只略小的左眼让他突然显得像一个甩掉了债主的吝啬的农民。

来吧，天使，我说，西奥对此没办法。咱们俩上那儿看看去，然后召开委员会做出决定。

穆奇问道：你不来吗，西奥？就十分钟？

西奥说：为了什么？

我们用穆奇办公室的电话终于联络上律师阿贝尔是在大约晚上九点。他第二天中午从特拉维夫赶到，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视察员和一名估价员。那个星期日我们到那栋楼去了四次，带着建筑工、屋顶工、修院墙的工人、管子工，以便证实估价。我觉得一切像在梦里似的恍惚。

九点新闻过后，西奥说：好了。我去过了。我看了。不赖。你那个非洲人喜欢的话可以买下。他的决定。但是你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名，诺娅。不要署名，记住。

星期天晚上，住在科达饭店的阿贝尔和住在拉格斯的拉玛达饭店的奥维埃托通了电话。他准备要授权购买产业，他对现场的人士有信心，但由于时

间紧迫无法汇来承诺的资金。周一时这个学年结束了，发证书前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小庆典。上文学课的学生们给我买了一棵装在大木盆里的橘子树盆栽。周二，邻近工业区、位于本·卢露车库对面的那栋破败的阿尔哈里奇的房子以相当于八万五千美元的以色列谢克尔出售，登记在伊曼纽尔·奥维埃托纪念基金会名下，基金会正式地址从此为——特拉维夫罗斯柴尔德大道九十号彻尼亚克、利菲迪姆和阿贝尔律师事务所，转交基金会。西奥在代表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的仑·阿贝尔律师的许诺下垫付了大部分资金，条件是他和我的名字不出现在任何有关房产买卖、所有权的文件上。那个周二，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出席合同签署，因此我们能一起前往并在空闲时间尽情地比较，最终在本耶胡达街找到一条我俩都喜欢的漂亮的浅色夏季裙装：颜色介于蓝和绿之间，简洁的样式让人联想到宽宽的热带叶片，肩部几乎全裸露出来。天黑以前我们就到家了，一同在阳台上看着下弦月缺。

有一次她告诉过我她妈妈的事，诺娅四岁的时候她和一个从新西兰来的士兵跑了。他俩双双被一只愤怒的母虎——母虎的幼崽为英国猎人所杀——撕碎了，她的姑妈经常在冬日的夜晚熄灯后、她睡着以前给她讲这件事。这个姑妈，楚玛·巴塔姆，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严格素食主义者，是任何形式的暴力坚决的敌人，一个脚穿厚底方头鞋、意志坚定的女人，每周三都斋戒、以便提醒自己身体只是仆人，一个懒惰、可厌、毫无价值的仆人，但她却不能忍受任何时刻的忽视。诺娅的爸爸，水利公司退休员工内海弥亚·杜布诺，是个木桩身材、毛发很重的人，意志消沉，永远胡子拉碴，从她妈妈跟那个当兵的跑了以后就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每天晚上下班回家以后，他就关上大门，从里面锁上前门，然后把自己关在晚上睡觉的房间里，身边全是收集的一册册风景明信片。他一贯沉浸在这顽固的静寂中，偶尔有无名的怒火充当标点。无论冬夏，他每天晚上吃完蛋包饭和色拉以后都会坐下，在印有耶路撒冷或是伯利恒[1]的大卫塔照片的明信片后面写下些词句，寄给其他国家的收集者。作为交换，他们会从海地、苏里南[2]、新喀里多尼亚[3]以及其他的地方——那些天不是蓝的而是青绿色的、破晓时的海水有金箔般色彩的地方——给他寄来明信片。他会一直坐到午夜时分，按照一两个月一变的收藏原则对明信片整理、归类。时光流逝，他的体重越来越重，像个上了年纪的相扑选手。满身横肉，眼睛陷进厚厚的脂肪，偶尔发作的暴怒总是伴随着越来越长的、闷闷不乐的漠然。诺娅有一套明信片的副本：她的任务是按

①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中部城市——译注。
②苏里南（Suriname），南美国家——译注。
③新喀里多尼亚（Nouvelle Calédonie），位于西南太平洋的法属岛群——译注。

照时常更迭的收藏原则在电话手册上做一套和原本相同的副本。除了她的姑妈和她古怪的儿子约什库，再没有一个灵魂光顾这个小屋。百叶窗冬天关着，为了防风；夏天也关着，为防沙尘。那间小屋坐落在海弗谷东头的一个边远小村庄的尽头，对面是一座首批移民来到时就有的犹太教堂的废墟。越过房子，荒芜一片，只有一个荒废的鸡舍、一些古老文明的遗迹、生锈的铁轨和一条标明停战界限的隔离墙，隔离墙那边约旦境内遍野都是岩石和橄榄树。两年前我们去那里看看，发现那所小屋已经消失，在小屋和犹太教堂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座花哨的水上游乐园，还有纪念品商店和书报亭。隔离墙也没了。1959年诺娅十五岁时内海弥亚·杜布诺掉入一眼废弃的水井跌断了脊柱，把自己永久地交托给了一把轮椅。自那时起她照顾他，她从未想过结婚，因为无法想像他没有她将怎样生活，也因为自妻子离开后他没有再婚。她服兵役时，这名残疾人由他自己的姐姐照顾，就是楚玛姑妈，一个原则上反对任何冬季取暖设备，并禁止了厨房中煎炸以及几乎其他所有烹饪手法的人。在她的统治下，这个家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运行，绝对服从家务活儿的顺序，三张时间表分别贴在屋子里不同的地方。屋里总有挥之不去的薄荷味儿、夏天的味道和大蒜味儿，即使当姑妈穿着厚底方头鞋出门一两天到卡尔迈勒山挖掘神秘的根茎时，这种香辛料的味道仍旧弥漫。种在花盆和脸盆里的助消化的、药用的还有回春的草药在房顶上和窗槛上摆得满满当当的。诺娅复员以后，花了足足三年时间才夺回照顾那个——身体像吸水的海绵般膨胀起来的——残疾人的权利。最后，姑妈终于在热浪席卷的一个黑沉沉的日子里，因为挖掘一棵柠檬树的冲突殴打了当地政务委员会的秘书。第二天她等着他出现后朝他泼了热油。她几乎要朝诺娅泼热油，就因为邻居“偷窥狂格罗沃依”，那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罗兹[①]得过举重冠军的人，从他的花园里跑过来，几回合后占了她的上风。经历了很多治疗以后，楚玛姑妈进了一家由一个从荷兰来的主张和平的家庭创办的、专门为有精神困扰的素食者开设的私人疗养所。诺娅夺回了父亲，除了做饭打扫卫生以外她还负责收集明信片，以及给世界各国的收集者写回信。她把盆里的药用、回春的草药拔

①罗兹（Lódz），波兰第二大城市——译注。

掉，种上花儿。每周三她都上圣雄甘地疗养院看望姑妈，给她带去从未受过农药污染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楚玛·巴塔姆快死的时候突然对薯片、芥末和香肠产生了特殊的憎恶，并且用具体而富含色彩的语言痛斥一切烤肉。她死于上午十点，在疗养院花园里，被同院病人用毛衣针插进右眼球直穿大脑，那时其他同院病人正享受早茶、三块脆饼干和一个橘子。内海弥亚·杜布诺年纪越大就越发肥胖起来，像个被打倒的摔跤手，而且在诺娅的印象里，他也越发快乐起来，仿佛他的愤怒已经耗光或者他已完成了自己的那部分苦行任务。他用粗哑的声音唱歌、说笑话、模仿政客，用第三次移民热潮时领导们和水利公司创始人的流言蜚语取悦诺娅。他对那些风景明信片失去了兴趣，越来越把生命、理念、词句、泛泛的人类行为视为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只能反映出愚蠢和虚伪的事。诺娅每天早晨把他的轮椅推到屋顶上。他有一架高倍望远镜，老人很喜欢在那儿几小时地观察下面的路。有时一辆拖拉机经过，或是一个骑驴的女孩儿，或是一群从果园放工回家的阿拉伯人。内海弥亚·杜布诺，效仿“偷窥狂格罗沃依”，也开始用望远镜透过整个夏天都开敞的窗户探索起邻居们的生活来：一个孤独的、自娱自乐的滑稽的观察者，专注于自己以外所有的人。第一次事故之后十七年，他遭遇了另一个事故。一天晚上诺娅出去上杂货店买点儿油和洋葱，当她趁着最后一道天光回家时，发现她爸爸坐在轮椅里从房顶露台上摔了下来。他用强壮的手臂转动车轮，像往常一样想把自己大山似的身躯从屋顶这一端推向另一端，但连人带车冲破了围栏从边缘摔了下来。当她发现爸爸把小屋留给了表兄约什库时，她觉得这是她追求自由、开始生活的最后一个机会，对她来说这意味着能进大学读书。这个约什库，诺娅惟一的亲属，是楚玛·巴塔姆和一个莱比锡小提琴匠人的儿子，这个小提琴匠人后来成了哈代拉[①]的一个消防官员，终此一生。照诺娅爸爸的说法，他们的激情持续了三周半。约什库出生的时候，这位前小提琴匠、未来的消防员在布鲁塞尔娶了一位佛莱芒乐派[②]乐团的音乐家。这位姑妈和孩子在海法的一间租来的屋子里住了好几年，屋里有

①哈代拉（Hadera），以色列沿海城市。在巴勒斯坦地区——译注。
②佛莱芒乐派（Flemish school，又译作佛兰德乐派），十五六世纪活跃在佛莱芒的音乐家群体。佛兰芒是历史地区，也称作尼德兰地区，即今天比利时及法国西北部——译注。

两张铁床、一只装衣服的箱子，屋角还有一个洗手池藏在塑料帘后面。淡蓝色的塑料帘上蔓延着一块块霉斑。姑妈每周在和平联盟工作两天，当秘书，还在素食者协会打一份零工。她每晚出门，全副武装，像一艘派去解救被围港口的驱逐舰，去参加事务委员会组织的“推进种族与宗教派别相互理解”的集会。约什库有几年是在托尔斯泰青年农场成长的，后来他逃回母亲身边，然后又间或溜去找脾气暴躁的残疾叔叔和表妹，只要表妹出现，他就要么说个不停要么终日不语。最后他从海法消失了，在加利利的一个阿拉伯村庄生活了三个月，从那儿寄给诺娅一封二十八页纸的激情洋溢的情书。他参加罢工和示威活动，在杂志上发表过两首诗，十七岁时上了报纸，报纸报道了这个成长于和平主义家庭的青年为避免服兵役与穆斯林和谈的详情，有一则头条新闻还呼吁左翼阵营停下来扪心自问。最后这个年轻人找上了小小的哈西德派，也没准是哈西德派的密使找上了他。一次，军队因为他的神经问题给他放假，于是哈西德派的人便把他带到了布鲁塞尔。那是在 1962 年，诺娅刚入伍，开始在军队教育部门的总部服役。孤身一人的楚玛姑妈离开了她在海法那间租来的房间，到海弗谷东头边远小村庄的这间小屋来照顾她残疾的兄弟，直到后来在私人诊所被毛衣针刺死。父亲去世后，诺娅发现他之所以把房子留给约什库而没给她是因为“希望他能离开邪恶的边缘，在沙仑[①]的土地上重新扎根”。约什库既没从边缘回归，也没在沙仑的土地里重新扎根，只是从布鲁塞尔委派了一名令人阴郁而过分正统的律师，活像礼数周全的棺材推销商。他用轻快的房东的口气对诺娅遗憾地解释道，她能针对遗嘱起诉的惟一途径就是到法庭去当众宣称她去世的父亲在写遗嘱时神志不清，或是把遗嘱当做玩笑，再或者证明他当时是受人——也就是他姐姐楚玛·扎莫斯克·巴塔姆——胁迫，因此遗嘱不能成立。然而，律师宣布道，你几乎不可能提出能令法庭满意的证据证明那些假设，基本上可以肯定会以困惑和蒙羞告终，一无所获，此外还在公众面前让自己成为无理侮辱了亡父记忆的女儿，不但扰了他的安息、姑妈的安息，还会因为攻击在世的惟一亲人而罪加一等，而这个人只想解救或至少是帮助你。总之，事后整个家族将

①沙仑（Sharon），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33：9。此处代指以色列——译注。

会完全陷入泥潭，你也将一无所获，一分钱也得不到。而如果你明智地选择不予起诉，我现在就能签署——我有权签署，以委托人约什亚胡·萨拉沙洛·扎莫斯克的名义——一份声明表示他出于自愿而非应法律要求授予你资产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份礼物而非义务，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是对不抛弃血亲这一戒律的服从。

于是，她在三十二岁时离开曾经是她自己家的房子，把所有的财物装进三只箱子，将收集的风景明信片捐赠给圣雄甘地疗养院，然后上特拉维夫大学同一群都比她小上十岁的同学一起专攻文学。之后成为巴特亚姆[1]的中学老师，和年长的男性同居过一两次，做过人工流产并得了并发症，最后和一个来自布拉格的著名教授同居了六个月，教授退休后全身心地扑进六大卷本《犹太精华》改编版的准备工作中。这个教授为人乖戾，好挖苦人，从年轻时起就爱好给钢琴调音。不论何时，风雨无阻，他总是准备着把他那一小包工具往腋下一夹前往任何地方。他不年轻，也不富裕，他无偿地给人调琴。但琴必须是货真价实战前的钢琴。一天教授接受了到斯特拉斯堡天主教大学的迎宾楼度过余生的邀请，他希望能在那里心平气和地重新找到犹太精华。诺娅觉得她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一两年，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活法儿。朋友在委内瑞拉给她找了一份零工。就在那儿，在加拉加斯，多亏几张音乐会入场券，我们相遇了。自那以后连在了一起。

①巴特亚姆，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译注。

九点的新闻和天气预报之后，西奥说，关上电视出去待一会儿吧。我脱下在家穿的裙子，穿上一条牛仔裤，再套一件红上衣，穿一双柔软的白球鞋。西奥也穿了球鞋、牛仔裤，系了条宽皮带。在下行的电梯里我们拥抱在一起，我把头埋进他怀里。他的身体比我暖和，皮带泛出旧皮子和汗的味道。我说：你总是这么温暖。

西奥说：昨天起你就放假了。打算做点什么，诺娅？

我说：诊疗所。伊曼纽尔的房子。要是没用你的钱就好了，那真不好。我是说，我觉得不合适。阿弗拉翰下周会还给你的。

西奥说：阿弗拉翰，是谁？

稍加停顿后：哦，对，你的非洲人。不着急。

街上没人。只有一排停放着的车和一排街灯，有几盏坏了。几棵可怜巴巴的树——印度山毛榉、桉树、金蝶木——看上去像是患有呼吸困难的疾病。在我眼里，树木以至于整条街突然变成业余舞台的布景。公寓的窗子敞着，从每一扇敞开着的窗子里都传出住宅部门长官沙龙扯着嗓子答记者问的声音。从东边山丘吹来一阵干干的风。一只受到惊扰的猫仓皇逃出垃圾桶，几乎撞上我们。我伸臂环住他的腰，手搁在摸起来粗糙的宽皮带上。金属皮带扣让我的手指打了个哆嗦。信箱似乎也染上了昏暗灯光下建筑物入口处楼梯的简陋。

西奥说：市长，巴特希瓦，那只恐龙。你应该试着找她谈谈，别去办公室，私下谈，说说你的梦想。你不会允许我跟她谈吧？会吗？

这事儿你不参与会好些。

再刨掉你就更好了，诺娅。

别从我身边夺走一切。

一切。哪儿来的一切？那儿什么也没有。

街道拐角一个街灯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纹丝不动的一对儿紧紧拥抱在一起，雕像一般。他们吻在一起，在那个吻里定住身形，黑暗中看去像是嘴对嘴的人工呼吸。我们走过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轮廓似乎被抹去了。我设想那个女孩是我教的十二班上的哪个塔丽，我希望自己猜错了，也说不出为什么。我无法不让自己紧盯住他们看，像是证人在警局从一队人中辨认嫌犯。黑暗中，我毫无理由地脸红了。

从一楼的一扇窗户里传来一声常见的平稳的哭声，出自一个心满意足的婴儿嘴里，他将会成长为一个平静的孩子。西奥揽住了我的肩，我一时觉得他那只斜视的左眼在黑暗中策划着什么阴谋。再走过两条街，整个城镇突然到了尽头，像是船上的桨触到了岸边沙地。眼前是沙漠。西奥领头，我们走上通往干涸河道的小路。他的影子覆盖了我和我的影子，因为我走得离他太近了。黑色的燧石在身后投下刀切般的圆锥形阴影，像是源于月光银色的锐利。石块中这儿那儿地有一片片散落的白骨。从下面干涸的河道飘来一阵风干荆棘的味道。浅色的岩石、斜坡、东边的山丘，甚至锐利的星光似乎都在等候变化，那马上就会来临的变化能让万物清晰澄明。而我并不晓得这即将来临的变化为何，也不晓得什么将要变得澄明。

西奥说：这里也是夜。

我似乎在他深沉、平静的声音中听到了一丝犹豫，仿佛他并无自信能让我相信这里也是夜，又像是他在疑心我是否能懂。

这个夏天过去以后，我说，看看往后会怎么样吧。

西奥说：往后会怎么样？

不知道。等等看吧。

干涸河道的一个拐弯处，一片阴影嵌在路上：一块坠落的岩石。不，不是岩石。一个破破烂烂的东西。一辆被弃的轿车。

它并未被遗弃。那是一辆吉普，悄无声息的，灯光熄灭。走近前去能看

到一个人的影子，头垂在方向盘上。一个男人，身体斜着蜷缩在一起，领子竖起来，不规律地发出声声窒息的笑声。西奥伸出手拦在我身前，止住我的脚步。他迈了三步走到吉普车旁，冲那个蜷着身的男人俯下身去。他大概询问那人是否需要帮助。男人抬起头来瞪着眼，没看西奥而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又慢慢地沉回到方向盘那儿。西奥又待了一会儿，他问的话和做的事被他黑黑的背影挡住，无从知晓，然后他拉住我的手，拖着我俩往前走向孤独开放的黄蝴蝶属植物。出什么事了，我问道，但西奥没有回答。直到我们走过黄蝴蝶花，他仿佛对答案投入了大量思考似的，说：

没什么，他在哭。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在那儿待一会儿？要么——

哭泣又不犯法。

我们爬上海耶纳山的山顶。城里黄色稀疏的灯光散落在黑暗中，无力地闪耀着，像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回应星光。南边的地平线上，一道耀眼的光亮突然闪现，然后随着沉闷的爆开而消亡。看，我说，烟花。马上就该有音乐了。西奥说：

照明弹。不是烟花，诺娅，那是照明弹。飞机上打出来的，他们的夜间演习。在朝虚拟目标开火。

没准是因为“虚拟目标”这个词，我突然痛楚地想到了诗人以斯拉·扎斯曼，还有失去儿子的父亲阿弗拉翰，他们瞬间出现又消失的腼腆笑容，难以察觉的、忧郁的笑容，像散去的秋天的云彩。男孩长长的睫毛后面向下注视的眼睛，还有父亲脸上压抑的情感刻出的沟壑，让他像个精疲力竭的退休金属工匠。他还有什么？在拉各斯？等候那头被抛弃在森林空场里的猩猩？是什么让他还待在那儿，他想让我为他做什么，真实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到底凭借什么魔力，这个谦卑的男人将他微弱的希望——穿过笼罩在特尔科达和拉各斯之间沙漠和平原上的银色夏夜，越过从这里到那里成千上万月光下的山峦、尖峰、谷地和绵延的沙——成功地传送给我。

我们在海耶纳山的山顶站了一刻钟或者更久，我都没怎么感觉到他拉着我的手，并用另一只手掌抚摸着。我们目睹一片片牛奶色的雾气慢慢爬进并

笼罩了干涸的河道，朝熄着灯的吉普方向推进。黑暗的悲伤和眼前的荒芜，雾中吉普车里那个蜷缩在方向盘边上的男人，阿什凯隆[①]十字路口那个鼻子流血、满头满脸灰尘汗水的交通警，这些都压在我身上。但是为什么压住我？我跟那些偶尔遇见、没遇见过的甚至永远不会相遇的陌生人的苦难有何相干？而且，即便非得是我，我又如何让自己超越激情和漠然这一对基本的组合？怎样才能像那个警察一样控制灾难——不靠受伤刺痛的心而使用外科大夫灵巧的手？“我们该在何处闪光，何人渴望我们的光亮？”

诺娅。

什么？

过来。

上哪儿？我在这儿呢。

过来点儿。

嗯。干吗？

听着。上周五我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等你的时候，看到一队奔丧的人抬着担架穿过广场，担架上盖了一条晨祷披巾，有一个犹太高等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个往里投钱就能解救人于死亡的锡铁罐子。药店的沙茨伯格弱智的叔叔死了。伊利亚。不过他不叫伊利亚，我把他的名字忘了。不要紧。他们把他葬在波佐的老婆孩子对面，松树环绕，过了你的学生和他姑妈的墓就是。要我接着说吗？你冷不冷？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咱们去旅行吧。结婚吧。装修一下公寓。要么买一台 CD 机。就一次，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

为什么结婚？

为什么？为了你。你不快乐。

他紧接着又道：事实上，我并不知道。

我说：咱们回家吧。我有点冷。那个死了的孩子、诊疗所、阿尔哈里奇的房子，还有那个伤心的父亲，我不晓得他们怎么都找上了我。要发生点什

①阿什凯隆（Ashqelon），巴勒斯坦两岸港市——译注。

么事儿了，西奥。前奏结束了，你没感觉到吗？

我们踏上归途，没走那条通往吉普车和干涸河床的路，决定绕远从隔开禁入山谷的那座山崖下面的公墓回家。蟋蟀、黑暗还有风中远处营火的气息。一时间，我隐约地渴望背朝着山顶上看到的灯火，离开大道，一直朝南走向真正的荒野，跨过一个门槛一走了之。诗人到底想说什么？词句是个圈套？果真如此的话，他为何不干脆沉默？突然之间，仿佛拨云见日，我灵光一闪突然记起在一个停电的冬日伊曼纽尔确实从我这儿得到过一支铅笔。那天我去医务室想开点儿止痛药，护士不在，只有他像个阴影般坐在床旁边，用他女性化的长睫毛后面向下看的眼睛注视着我。而且他像是在同情我。不知什么原因我对他说了严厉的话，好像我有义务在那里教育他似的。我粗声问他到底要找什么、谁允许他在医务室没人的情况下进来。那一刻我冷淡、顽固，暴躁得像坐在轮椅中、在房顶上日复一日从望远镜中看时光飞逝的父亲一样。男孩几乎是悲伤地点点头，像是能看穿我的思想并试图减弱他给我带来的尴尬。他问我是否有过想写点什么的时候，他眨眼睛了吗？还是仅仅出于我的想像？我背朝着他，动作粗暴地把白色药柜的抽屉一只只拉开，然后看到一支断了铅的铅笔。我离开——不如说是逃走——之前，讥讽地冲他吼道：你恐怕得自己找个卷笔刀。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说他有文学天才，他可能还梦想当一名作家，只有你能判断他是不是能写作，只有你让他感觉到了学习的意义，他在信中还提到你给他的铅笔，并且说写信用的就是这支铅笔。我不敢相信听到的话，好比一个错承了原本是献给别人的爱意的女人。如果回去时我们没决定绕远，如果我们选择了那条通往干涸河床和熄了灯的吉普的路，如果那个男人已经不在那儿，我就能够爬上驾驶员的座位，头趴在绕着方向盘的胳膊上，哀悼那个——再也不会有下一个了——沉到自己海底的孩子。回到家后我们锁上阳台门，泡了草药茶，打开电视看看有没有可看的节目，结果是阿图尔·鲁宾斯坦[①]谢世前最后一次演奏会的节选。我去冲澡，西奥把自己关进屋里开始听伦敦的全球广播。

①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1887－1982），美籍波兰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译注。

到底还是有上帝的，穆奇·佩莱格穿着酒红色的肥腿裤、天蓝色衬衫，脖子上系了一条紫色丝巾咯咯笑着说，一边为诺娅打开新菲亚特车的车门。自己来看看上天赐给咱们的东西吧，就像木匠对他的处女老婆说的。诺娅把草编包放在脚边，又改了主意拿上来放在膝上。他们去约瑟夫塔尔区伊曼纽尔·奥维埃托姑妈的公寓。彻尼亚克、利菲迪姆和阿贝尔律师事务所的仑·阿贝尔接到来自拉各斯的电报，指示他清空逝者的房屋。那天早晨在电话里，他宣布他的客户授权穆奇·佩莱格公司出售那位姑妈的房产以及房屋内部的资产，所得资金偿还部分西奥为买楼而替伊曼纽尔·奥维埃托纪念基金会预支的款项。

路上，他告诉诺娅他百分之百确定有个红头发的美容师迷上他了，不仅是迷上，简直是为他疯狂。他问诺娅应该采用四种可能的接近策略的哪一种才能把她弄上床。诺娅建议他采用三号方针。为什么不呢？那条接近策略有没有可能也对别人起作用，比如她？诺娅说那当然。他向诺娅解说他称之为三号作战原则的细节，接着又说到他刚投在合伙从台湾引进领带生意上的一万一千美元，很棒的荧光领带，在黑暗中会像猫眼一样发光。这时诺娅走神了，开始想像人死了以后的状态：黑暗的“无”，在那里眼睛将不再能看到东西，连完全的黑暗也看不到，因为它们已不存在了，不再存在的皮肤也无法感知寒冷和潮湿，因为它也消失了。但她能想像出来的感受仅仅是寒冷和黑暗中的静默，都是感官体会，而无论怎么说，感官体会都是生命的特征。这些也全部消失，沉入它们的海底。

埃拉扎拉·奥维埃托的公寓自她死后一直关着门上着锁。他们进门后迎

面先是一阵书本上的尘土和没通风的毛线发出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味道。百叶窗关着，他们只好打开灯。起居室里有一张沙发、一个茶几和两把柳条椅，风格都很朴素，还有一张鲁宾①画的加利利风景画的复制品。蓝色玻璃花瓶里的一束夹竹桃已经枯萎，开始变脆。旁边一本打开朝下的书，写的是比亚韦斯托克②的犹太人最后的十天。书上搁着一副棕色眼镜，旁边有一只空杯子，也是棕色的。架上有一本带解说的《圣经》，几本小说、诗集和画册，中间摆着一个瓷质小雕像：年轻的小提琴家手持小小的弦乐器，诺娅不敢肯定那是不是七弦琴。她在银行里坐在左边，最后的窗口后面，隶属存款部门，一个能干、干瘪、满脸雀斑的五十几岁的女人，穿着平跟鞋，短发用塑料的弯月形卡子紧紧贴着头皮别住。诺娅几乎听到了那个单调的声音在说那句每次对话结束时她一定会说的惯用句："百分之百没问题。"

天花板很低的卧室里有张铁床，上面铺着条简单的毯子；还有一个黑色的小柜，诺娅记得小时候管那东西叫"小床柜"；屋角地板上的贝督因陶盆里种的蓟③干死了，已经开始变灰；床边凳子上又是一只棕色的空杯子和一小罐药片；再有就是一本关于大同教④的书，附的照片是有海滩景致的海法的寺院。

他们从卧室走到阳台，阳台被包起来做成一间小屋，比亭子间稍大一点。这里只有一张铁床，一个架子，墙上的一张以色列南部地图和一只木箱子。箱子里放着伊曼纽尔精心折叠的衣服：四件衬衫，两条裤子，一条是卡其布的，另外一条是灯心绒的，内衣，手帕和袜子。还有一件崭新的、满是拉链和搭扣的飞行员皮夹克，诺娅不记得那孩子穿过这件衣服。箱子表面显然是当做桌子用的，上面放了各式课本和练习簿，一支圆珠笔和一盏蓝罩的小灯。几本平装翻译小说，一本字典，杯子里一根松枝已经干了，杯里的水蒸发殆尽，还有几本诗集。记忆中他去年冬天穿过的那件绿色套头衫摊在床上。床角有一张碎布拼的旧毯子，诺娅看了半天才明白那条奇怪的狗曾经睡

①鲁宾（Reuven Rubin），画家，以色列早期现代主义美术大师——译注。
②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波兰东北部最大城市——译注。
③蓟，一种植物——译注。
④大同教，即巴哈教。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译注。

在那里。冬天他们回到屋里就坐在这儿。摇开百叶窗，推开窗户，她看到的是一面灰色的水泥墙，近得令人绝望，几乎伸手就能触到。那是隔壁街区的围墙。她几乎流泪，穆奇·佩莱格犹犹豫豫地把手放在她后脖颈，没有安抚她，淡淡的金银花香让他鼻孔一张一翕，他轻柔地说：诺娅？

她抬起手来想推开他的手，半道上改了主意攥住了那只手，甚至闭着眼睛在他身上斜靠了一会儿。

穆奇·佩莱格——仿佛是要释放平日总奋力控制的压抑了的温情——冲她耳语道：好吧，咱们不着急，我在另一间屋等你。

他摸了摸她的头发离开了。

她俯下身去，拿起那件绿色套头衫，贴在胸上想把它叠成个样子。她没能叠好，于是把它放在铁床上像叠尿布一样叠了叠，接着慢慢把它拿到箱子那里和其他衣物放在一起。然后合上百叶窗和窗户准备离开，然而却坐到床上呆了一会儿，精疲力竭。她闭上眼等着泪水落下。泪水拒绝出现，她只是觉得一切都太晚了。她站起身来，用手背把箱子表面擦干净，拉平床单，整了整枕头，拉上窗帘，然后离开。她在隔壁房间里找到穆奇，他戴着眼镜坐在柳条椅里等她，一边静静地读那本关于比亚韦斯托克犹太人末日的书。他站起来到厨房给她倒了半杯水。后来在菲亚特车里，他宣称他很想卖掉这套公寓：他同样不会想从这笔交易中拿中介费，但事实是卖掉公寓的所得不够还西奥的钱，而且至关紧要的是我们还得装修阿尔哈里奇的房子，尽管那取决于我们想要的样式，关于这点实际上我们还没商量过要怎么做，就像凯瑟琳皇后对她的哥萨克宠儿说的。

诺娅说：好的，听着，是这样的。如果这份遗产还不够的话，请记住我也有个姑妈，我可能也有些遗产，她的加上我的都被布鲁塞尔的一个超正统的表兄占了，我曾经宣布放弃，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做错了。现在也许还来得及打一仗争取一下。现在带我去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给我买一杯冰咖啡。冰咖啡，穆奇，那是我现在想要的。

1971 年底或是 1972 年初，芬克尔被任命为局领导。总部委派西奥作为规划部的代表到墨西哥担任当地规划的特别顾问，全当是一个安慰奖或是为了减缓突然的打击。不管怎么说，你是单身，比有家有室的人更机动灵活。换换空气对你有好处，你能就此看世界，恐怕能待上好几年，大概三年吧。早就听说过拉丁女人吧，那儿还有黑女人、克里奥尔[①]女人、黑白混血的和印第安女人。而且从专业角度上讲，你也无疑能找到充分的施展余地。你能让很多东西改头换面。也能设计新的建筑。待够了就回来，那时候也许已经做了些新的调整。原则上说，一切都是敞开的，而且一切都有回复原状的可能。

不到两周半以后，他已将位于亚尔公河附近许尔堪大街上的单身宿舍清空。他觉得“充分的施展余地”有点让人心动，还有“机动灵活”。也许正因如此，他决定只带一个箱子、一只手提包上路。年复一年，合同在延长，他的业务从韦拉克鲁斯州扩展到索诺拉州和塔瓦斯科州[②]，最后甚至发展到别的国家。不到几个月，他和特拉维夫圈子里熟人之间肤浅的纽带就断掉了。办公室转来一两个女人的来信，但他没费心回复，甚至连明信片也没寄上一张。每隔六个月他都会觉得离开家是莫名其妙的。他不看以色列报纸。过了一阵以后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内政部长是谁，也记不得犹太节日的日期了。身在远方，所有的战争还有造成这种隔膜的花言巧语似乎形成了我方即正义、歇斯底里的恶性循环：踢掉挡路的一切，与此同时祈求仁慈

①克里奥尔（Criollo），克里奥尔人。常指生于拉美的欧洲人后裔；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早期法国或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以及上述两种人与黑人、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译注。

②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索诺拉州（Sonora）、塔瓦斯科州（Tabasco），墨西哥的三个州——译注。

还寻求被爱。一杯黏糊糊的命运鸡尾酒、傲慢而自怜，这就是待在太平洋沿岸一个偏远的小渔村的吊床上高瞻远瞩的他眼中的以色列。不过他也没忘了自问他这样是不是仅仅因为尼莫罗德·芬克尔那个人执掌了局里的大权。时常冒出来的答案对他说，那仅仅是最终导致忍无可忍的最后的一击。

他极不愿意回家。他以一种平静的热情处理工作。成功地规划了几种既适合热带气候又和当地现存的生活方式不发生冲突的乡村模式。尼加拉瓜地震之后，有两个区按照他的思路重建。新的工作开始光顾。1974 年他写信给规划部申请离职。尼莫罗德·芬克尔立刻批准了。

年复一年，他从酒店到乡村旅馆，从有冷气的办公室到热浪烘烤的城镇和印第安村庄，把一切所需之物装在一只朴素的挎包里，并且学会了六种西班牙语的方言。政权更迭，但他完好无损，因为他不交朋友。面对残酷、腐败、贿赂或者磨人的贫困，他不置一词，只是专心于自己的工作：他来这里并非为了对抗不公正的行为，而是为了尽可能在业务上达到完美并藉此减少——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灾祸。在这里，荣誉、难题和死亡时刻存在，生命本身有时也像节日烟花表演和空气中回荡的一阵枪声一样一闪而过：无情、刺激、喧闹而廉价。

女人很好找，就像食品和睡觉的吊床一样，无论到哪儿她们都出于好奇或好客而对他热情有加。他的东家会期待他加入到谈话中来聊到深夜。天穹下，在村庄的旅店里，发展公司的营帐中，偏远的农场上，在陌生人或碰巧认识的友人的身旁。于是，他沿袭了面对青年运动以及军队的营火时的习惯，紧挨着火坐下，倾听。这里，他们也谈时间带来的创伤、家庭、荣誉、命运的兴衰、社会的虚伪、人们由于过盛的欲望，或是正相反，由于过度的漠然对自己和他人犯下的暴行，一直谈到半夜。西奥喝很少的酒，而且几乎不参与谈话。只是偶尔才贡献出一个他觉得得体的——发生在以色列战时的或书上读来的——奇闻轶事。天快亮时男人们方才散开，他走向黑暗，总有个女人要和他同去。

有时他和众人一起、隐在人群中看挑动情欲的狂欢节、瓜达卢佩小姐庆典、萨拉戈萨将军盛宴日、尖叫节、舞蹈、狂欢作乐、恐怖的和诱人的假面，以及射向腐臭空气中的一阵阵烟花和枪响，还有阵阵鼓声抽噎、伴随着

绝望的音乐，这可怕的、激烈的欲望会一直持续到黎明。

因为开支微乎其微，他把大部分收入存进多伦多的一家银行。那些年他像飘荡的艺术家一样从一处荒芜之地去往另一处更荒凉的所在。他在死火山脚下的破烂村庄里停留，有一次目睹了一座火山的喷发。他有时在蕨类植物厚厚的华盖下前行，还会匍匐穿过美丽的丛林。时不时能和——森林用它树根做成的凶猛的爪子侵占了的——没有人烟的河流以及陡峭的山峦亲近一会儿。他不时地会停下来完全无所事事地待几周，躺在吊床上看捕食的鸟儿在空中翱翔。晚上，一个姑娘或妇人会来和他分享吊床，从什么地方给两人带来盛在巨大陶土杯里的咖啡。在这样的夜晚，过去和将来像是两种常见疾病，慢性、破坏性的瘟疫感染了大部分人并继而会导致受害者产生奇怪的狂怒。而他很庆幸自己并未染上，并认为自己对此免疫。

即便是“现在时”，也就是分配给你的此时此刻，旅行、打盹儿、做爱，或是在一架没什么乘客的夜班飞机上，坐在窗边的座位、穿着件旧皮夹克、清醒安静地蜷成一团坐着的时候，即便是这样的“现在时”也似乎对你别无所求，除了需要你在场，并对展现在眼前以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全盘接受。就像是水在因疲倦不堪而合上的眼皮里缓缓向下流淌。

偶尔他会感到恐惧，或者说是一种隐隐的忧惧，担心在这种感受不到苦楚的状态下会错过些什么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东西。即便真的错过了什么，也完全不知道那究竟为何。有时他觉得错过了应该记住的，但当他搜肠刮肚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那觉得错过了的东西。在秘鲁的特鲁希略，一天晚上他在一张酒店便签上用希伯来文草草写下四五个问题：这就是生命力的缩减？贫乏？衰退？放逐？一两个钟头以后他在这些疑问下写下答案：就算我们认为真的是衰退等等，又怎样呢？又有什么害处呢？

于是他再次依偎进热带的迟钝中。

但工作的时候，他就像宝库里的小偷一样机警。比如，碰巧连续几天在某些乡村旅店的扫帚间似的天顶很低的小房间里的时候，或是偶尔在某个城市里的——公司让他使用的——豪华办公室里制图、写东西、修改、计算的时候，他精力充沛、生机勃勃，既不需要睡眠也不需要陪伴，即便一个小美

人拿着咖啡和一托盘食物溜进屋他也不会从图纸上抬起头来，她等着、紧绷绷的，似乎乳头的皮肤正在接受他的能量：那一跳一跳的电流，最后她放弃、离开。又或是有时的会议，当他向决策层阐述计划书的时候，透出一种燃烧在体内的冰冷、尖锐的光芒，让别人屈服于他的意志。这样的时刻，他感觉到来自工作的强有力、愉悦的快乐巅峰：创造和完美的能量像灯泡里的灯丝一般在他体内白炽般燃烧。就像是密林之中一个与世隔绝的隐秘之所里，一眼泉水周期性的脉动完全与你无关独立存在，它时而冒出、时而消失，然后又再次冒出，按照它自己早已订好的程序，那是你无法理解的规律，但它却牢牢地控制着你。

于是又一次，在去往山里荒芜区域的路上或在加勒比海沿岸，研究地形位置、监督建设进程、阐述难以理解的临时变更时，在瞬间的灵机下，他有时会突然被疲劳重重击到，然后整日整夜地躺在茅屋后面的吊床里。他有时也会半夜起来，赤着脚走去加入到火堆旁的闲谈中，谈爱情、背叛、生命的枯荣兴衰。就这样，在破败谷仓的院子里，喝着一杯杯当地酿的酒，身边是工人、技术员、小贩和应召女郎，头顶上是——可能会被流星瞬间的辉煌照亮的——奇怪的夜空，他知道了越来越多的故事，里面充满了欲望和绝望。这两项像一对流浪艺人，夜复一夜出现在边远客栈里那些聚集在谷仓或院子里的观众面前，从未对无休止的重复同样的激情演出感到厌倦。西奥一次又一次地欣赏着，从不觉得无聊，也没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在吊床里和一个看上了他的、差不多都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女人做爱时，他都会慢慢地、精确地来，巧妙地延长快感，带领她信心十足地穿越森林中的偏僻小路，有时在迷乱中他会突然一下子充满想当父亲的强烈渴望。他会给姑娘展示出在随意性交的、陌生人之间不会出现的那种不寻常的温情的一面，家长的一面。姑娘在激动中瞥见这家长般的关怀，先是困惑和预警，接着就是彻底被征服，仿佛那关怀刺进了她脊梁中的秘密内核。于是他们的身体进入了光凭欲望无法到达的领域，直到觉得河流并非仅仅在茅屋边流淌而像是从他们体内奔流而出。但是天一大亮，他又恢复到那个充满距离感、端正的人。礼貌、周到、超然。被迫前行。

1981年2月，我上加拉加斯的大使馆去拿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我让以色列的办公室寄给我的材料。新来的接待员满腔同情地以一种特别的体贴，好像要试图缓解患者接受化验结果打击似的对我解释道，那个包裹锁在治安防卫官的保险柜里了，而他一个小时左右以后才能回来。与此同时，她让我坐在一张柳条椅里，我没有要，她却端来一杯咖啡——很冲、很刺激的咖啡，几乎有点酒精的味道——让我一时间觉得我让她着迷了。在我来到办公室十分钟左右之后，她毫无禁忌、用年轻女孩儿的声音对我说道：待一会儿吧。你挺有趣的。

她是个个子适中的女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身体的每个动作都让她开心；她金色的头发搭在额前，穿着一条色彩鲜艳的裙子。她站起身倒咖啡时裙子在腿周围旋转起来，尽管她是不急不躁的，我还是感觉到她身上的些许运动员的气息。她试图暗示，无心的暗示着，是我激发了她正在散发的女性信号，你很迷人，我被迷住了，我干吗要遮掩呢，于是我发现，出乎自己的意料，我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也向她发了回应信号。多年以来我一直避免身边有以色列人的陪伴，特别是那些积极、合作、对世上一切喜欢和厌恶都有头头是道的理由的特拉维夫女孩儿。在这个地区四处飘荡的年代里，我着迷于有催眠般力量的热带女人味儿，那种有时像西班牙式傲慢自大的牢笼中锁住的黑色火焰一般的味道。可这儿有个金发碧眼、充满活力、有银铃般嗓音的女人，她的脸因为我带来的愉悦彻底绽放开笑容，爆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她的肩膀和臀部动一动，仿佛在说，看啊，这是胴体。她搅起了我体内的什么，那种类似童年伙伴交往中偶尔能感到的轻松的坦率。我产生了要给

她留下深刻印象的突发冲动。多年来我对此从不刻意，让女人留下印象从来就不费我吹灰之力。

不到十分钟我就了解到，她是个文学教师，出生在，并且直至几年前一直生活在海弗谷东头的一个村庄里。她开始真正生活的时间，按她的话说，是惊人地晚，因为要承担那个暴力的、孩子似的残疾父亲，她没有什么别的亲戚，她的名字叫诺娅。你是西奥，我听说过你，你在这一带可是个传奇人物。我在特拉维夫有那么几次不愉快。不说那个，一些朋友帮我安排到这儿，一边当大使馆的临时接待员，一边在本地以色列学校教文学。对了，你怎么猜到的，我给咱们冲的咖啡确实有穿透性。我往里放了点儿印第安人的东西，一种根茎的粉末，不，不完全像也门人用的小豆蔻，这东西让人头晕乎乎的，我还往里加了半杯法国白兰地。瞧，我几乎交待了全部的秘诀。当然往你的咖啡里加东西我没问你的意见，为什么要问？来，再喝一杯。在我看来你可不像那种会喝醉酒或者会失控的人。不如说是正相反，总是一切皆在掌控中。

治安防卫官回来后把信封交给我，我谢了他还有她，就要走。但她完全不容我有去意：等等，西奥。人们说你在印第安人中间住了十年。你能带我去看看吗？这么做你不会吃亏的。你要是答应，我就教你怎么用疏导呼吸的方法止痛。

我猜想她肯定从属于那些在特拉维夫很流行的神秘组织之一。我心意已决，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逃离这个懂得控制你呼吸的小法门的、伶牙俐齿的老师。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当晚和她去听柏林来的交响乐团、合唱团的一场音乐会：她有张双人票，没有我的话她也去不成，在这儿女性晚上独自出门几乎不太可能，而且她保证说节目里有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弥撒曲》。我都有好几年没听到舒伯特了，平时只能从我那个随身携带的小单放机的耳机里听听。

那天晚上，我发现她实际上对呼吸法一无所知：她只是因为一时迷恋而不想让我消失掉。如果我坚持要她兑现那个承诺，她就会去参加一个控制呼吸的课程，课业结束后就向我还债。“一时迷恋”这个词并不准确，她说。

实际上我给她的印象像是一个关在自己地牢里的人，我让她渴望能接触我以免我在黑暗的地牢中冻僵。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完全表达那个意思，关押，地牢，都是你的错，西奥，都是因为你我才说这些表达不清楚的隐喻。我可笑吗？要是那样你必须承认我的指控。瞧你对我做了什么。都是因为你我才这么可笑的。也是因为你我脸都红了。你瞧瞧。

音乐会后，她邀请我去一家被誉为西半球最棒的餐馆吃烤小牛肉。那个餐馆，除我俩之外空无一人，充满了俗气的装饰品和打扮成牧人的侍者，不过是一个宰游客的陷阱。肉和葡萄酒粗糙无味。我们桌上的蜡烛发出令人厌恶的油腻味。至于柏林来的演出者，他们昨天已经演奏完舒伯特了。我们听到的是兴德米特和巴尔托克①。更有甚者，我们离开音乐厅时她左脚高跟鞋的鞋跟断了，我们下出租车时，她的手表磕了我的脑门并留下一个可怕的伤口。我胡吹来着，她说，在她公寓门前的路灯下展现了迷人的一笑：我已经找不着印第安人村庄了。

那个晚上之后的第一个周日，一个骗人的补鞋匠给她钉了个怪里怪气的鞋跟，我带她坐着发展署的吉普车沿着土路去看卡拉沃索附近的一个印第安村庄。来回各花了五个钟头。我们看到一个半天主教、半异教式的婚礼狂欢：在这个伴有类似号叫的怪异歌声的蒙昧、狂喜的仪式上，一个漂亮的寡妇嫁给了一个昏昏沉沉、可能还有点吸毒上瘾的看起来不超过十五岁的年轻人。第二天我飞回墨西哥。我每次路过加拉加斯时我们就会见面，差不多隔几周一次，我会给她带一瓶拿破仑白兰地，以便她有东西可以配上当地的烈酒掺进她的魔幻咖啡。她搞定第一天、用以留住我的呼吸法的秘诀并没有迷住我，我却发现她有另一个秘密十分迷人：不论何时当她遇上陌生人时，即便是偶然相遇的人，她都能立即看出些微的恶意，或是伪善，或是大方。即使对那些在我看来是很复杂、高深莫测、成功地隐藏在光鲜表面之下的、或是用完美礼仪伪装好的人，她也能明显地识别出是好是坏：缺德、天真、慷慨、迟钝——她以此将每个人归类。还有温暖或是冷淡。实际上，她倒不是

①兴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德国音乐家。巴尔托克（Bartók Béla，1881－1945），匈牙利音乐家——译注。

要按照温度衡量人的类别、地点或观点，不像是给学生的作业打分似的，从四十到九十。这算什么，我抗议道，军事法庭？人民的判决？诺娅答道：这很简单，任何想知道好坏的人都明白。要是你不明白，就意味着你不想弄清楚。我觉得你吸引我，似乎你也觉得我迷人。不过当然你不必回答。

她的这些闪电判断是否一贯正确？或是对大于误？还是偶尔？我不再能辨别，因为没多久我就以她的眼睛看人了：冷冰冰、热情洋溢、温吞吞、慷慨大方、缺德、富有同情心。我是什么样的？是热还是冷，诺娅？还是不问为好？她立刻回答了我，毫不犹豫的：你很温暖热情，但在渐渐变冷。不要紧，我会让你再暖过来的。她又加上一句：不坏。有点作威作福的。吉普车开得棒极了——不像是开车，倒像是驾驶技术的花式表演。

有时她会又像第一次见到我时那样看着我，在大使馆，一个充满活力、好意、审判者似的以色列老师。她的美貌遍布全身、显而易见。她周身荡漾着一股淡淡的、却明明白白的金银花香气。这一切我都不讨厌。恰好相反，她的出现常会让我周身产生一种儿童般的激动，就像是被带进屋里、从此会受到很好照顾的动物。最终我还发现她的感情疆土十分丰富且轻而易举，一会儿母性十足，一会儿又仿佛小姑娘，再要么就充满诱惑力，然而大部分时间是姐妹般的。并且，她还为我展现出一种儿童式的幽默感，“拉丁人历史里最大的主角是马儿”，这种幽默感让我产生想要小心翼翼拢住她肩膀的奇妙冲动，即便并不寒冷。实际上我给她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条加勒比羊毛围巾。第一次替她围上肩膀时，她那洁白精致、颈背附近有一块小小的棕色胎记的肩膀，让我有一瞬间感到了神秘和快乐：仿佛不是我盖住了她的肩，倒是她突然间覆盖了整个我。

有一次我们去参观一个有人定居时就存在了的、阴沉沉的教堂废墟，我如往常一样又发表了历史简介，她打断我说，你瞧，西奥，现在的你多有光彩。

听了这些话，我像个——听到有经验的女人也许是当玩笑地告诉他具备将来能够吸引女人的特质的——男孩一样颤抖着。我倾身吻了她，处在那个阶段所以只吻在头发上。她没有回吻我，但脸红了而且笑出声来。看，西

奥，太可笑了，你神气活现的胡子在打抖呢。我们在加拉加斯相遇时，诺娅和我，我五十二岁，三十年来爱过各式各样的女人，自认为是个老手，熟悉无数诺娅即便在她最狂野的梦境中都没见过的快乐，如果她有过狂野的梦的话。我猜她没有过。尽管如此，她在废墟对我说的话，你瞧现在的你多有光彩，让我如此感动，我甚至要强制性地提醒自己我讲到了十八世纪，而且还没告诉她教堂和整个城镇是如何在 1812 年的大地震中毁于一旦，以及还没有讲到的将那些教堂、秘密警察、共产主义者、军队、自由派以及共和国卫队随时变化的权力结盟连在一起的循环的因素。我又开始讲起来，充满激情地继续着，细细地讲述每个细节，有时离开主题，充满狂热，开始讲博尔赫斯式的神话，直到她说，今天够了，西奥，我听不进去了。

四个月内我们也就见了七八次面，去参观艺术展或听音乐会，去餐馆用餐。在她第一次晚上的失败之后，我们内部达成一致，不再由她选餐馆，有时我们找个星期天开吉普车到科迪勒拉附近的山上待几个小时。她的西班牙语词汇量只有几百个，但是尽管如此，却能在我和加油站的服务生或是局里的工程师说完话后马上不带丝毫犹豫地宣布，这个人是个骗子，而另一个，那个胖子，喜欢别人但是害羞，所以才表现得那么粗鲁。你吃过什么，诺娅？一个地动仪？一台测谎器？她并不忙于回答这些问题。当她终于回答时，我却不明白答案和问题的联系。她说，我生活在一个瘫痪的父亲和一个因为自己的理念而头脑不正常的姑妈身边，我必须保持清醒。

晚上我会送她回大使馆替她租的公寓，那幢楼的房主是个有钱的犹太人，她住在一楼。我们在大门口吻别，通常吻在脖子或头发上，她得踮着脚尖，我却要向她弯下身来，闻着她身上的金银花香气。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的旅程越来越多的会经过加拉加斯。我给她买了一双毛袜子和一条驼毛围巾。她送了我一罐蜂蜜。然后有一个春天的晚上，起了大暴风雨，伴着长时间的停电，她说我可以留下来：她有一张沙发床。她让我坐在她床上，雨滴像石块般敲击着玻璃窗，她点燃了煤油取暖炉，给我倒了一杯我给她的白兰地，拿来些水果和纸巾；然后，一瞬之间她改变了主意，吹灭了蜡烛，在我身边坐下，说，求爱阶段结束，咱们做爱吧。随即她便开始解我衬衫的纽

扣。那一刻，我感受到的热流不仅是欲望，还有保护。她的肉欲是如此直接、开放，并且还——充满好奇，带着一股要立即对我进行深度研究的决心，跳过礼仪，要和我完全并且迅速地熟悉起来，在那个夜晚就要在我体内开辟一个立足点。

做爱之后，她像婴儿般地趴着睡着了，头埋在我的肩窝里。

早晨时，她说，你真会享受那个，像一匹种马。我也一样。

那个风雨之夜以及第二天晚上以后，我还是确信我们之间不会是永远的关系。我仍旧认为自己会一个人终老一生。但是我们之间没能达成多年来我和其他过客般的——那些出现在饭店里，村里，吊床上，发展部办公室附设的旅店里的——女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一共两款的那种协议：等量的欢愉然后分手。与此相反，我们之间的关系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之后变得坦诚而戏谑。我们双方都觉得相处更简单而且比以往更好了。这是很奇特的，因为到那时为止我不很相信友谊，更不要说男女之间的友谊了。是会有亲密、热情，还有公平的快感，也有一瞬而过的激情，对等的享受、付出和获得，都是过去这些年我体会到的，而它们总是笼罩在无法避免的欲望和尴尬交织的阴影之下。事先就标出了尽头。但这样张开双臂的友谊，一种不带尴尬的关系，没有尽头，我以前不相信会产生于我和一个女人之间。实际上我觉得不可能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产生。然后诺娅来了，穿着她色彩鲜艳的、会绕着腿旋转的夏裙，前排一排扣着的大扣子，身躯柔软，她逗弄我，时而以轻松的同志般的姿态拍拍我的肩，她在性方面深奥的单纯像是热呼呼的棕色面包，她在光天化日下将两人脱得赤条条，在小溪边或是森林中的空场里，毫无尴尬，脱离了一切肉欲、金钱、情感控制的做法，还有她似乎下定了的也要解放我、让我自由的决心。

有一次，我在她那里住了三天三夜。我要离开出发去机场时对她说，这儿，别跟我争，我在架子上放了四百块，反正住旅馆也要花这么多钱，况且你过得也不怎么宽裕。诺娅说：好。好得很。谢谢。过了一会儿她改了主意，她算了一下我和她在一起这三天的花费不超过一百块。那怎么了，我说，多出来的是我诚心诚意给你的，你可以买一台电视机，就算是我送的礼

物，要是晚上看一点电视你可能还能学点西班牙语。诺娅说，我想电视都想疯了，但这里最便宜的也要六百块，不够的钱我又凑不出。我喜欢她说话的方式。我也喜欢她能够背过身去，不理会任何不满和甜言蜜语的诱惑，一待就是几个小时，集中精力批改几份她答应第二天早上会发回去的考卷，即便是在我们惟一的晚上。有一次，她突然从考卷上抬起头来，一副精力特别集中的样子，一丝不苟地说，你是个喜欢总结的人。现在还别对我下结论。

四月里，我们都病了，先是我，反复地发烧。大概是哪个星期天出游时招了虱子或者跳蚤。她给我穿上一件法兰绒囚服似的衣服，往我脑袋上戴了一顶印第安宝宝戴的那种毛睡帽，罩住了我的脑门和耳朵，给我盖了四条毛毯，用她疯了的姑姑教给她的方法煮了滚热的仙人掌汁，差点把我灌得半死。她从以色列语学习班和大使馆请了几天假以便照顾我，自己套在一条祖母们穿的那种厚厚的棕色袍子里，在我身边坐下，用轻柔、催人入睡的声音给我讲她那个瘫痪了的拳击手爸爸和托尔斯泰式的姑妈，还有那个重生了的犹太人约什库，还有名叫格罗沃伊或是格若沃伊的小丑“偷窥狂汤姆”。故事越讲越复杂，也越来越神秘，然后我就睡着了，我睡了三天，醒来时全好了。取消了飞往韦拉克鲁斯的机票，因为诺娅自己病倒了。她是个缠人的病号，她把自己的手放在我的拳头里让我攥着，几小时不许我松开，只有这样她才能暖和过来，尽管她盖着四层毛毯，我还把皮夹克裹在她腿上并且拉上了拉链。我们恢复健康后，两人之间产生了极深的亲密感，她甚至托我上墨西哥城的药房给她买点涂在下面的德国产的催情霜。复活节的时候，我找了个周末带她去看正在兴建的一座新城，边上环绕着六个新型村庄，是我设计的，在塔瓦斯科州南部刚刚动工。诺娅说，真壮观，不，这很人性。要是祖国的人能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意识到也可以这样建造就好了。我说：在以色列他们可能不需要这样建，至少不需要建这里这样的棚屋。以色列并非一马平川的地方，至少以往不是。顺便问一句，你怎么会认为壮观的反义词是人性？

诺娅似乎有点不着边际地说：瞧瞧咱俩，一对没有孩子的教师，终日纠正对方。这可不容易，不过至少不会无聊。

6 月，学年结束的时候，她突然说：我在这儿待够了。我要回特拉维夫，你和我一起吗？

你瞧，我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合同要到 12 月的，在塔瓦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还有没完成的项目，再说以色列又没什么等着我回去。诺娅说：我也一样。你是去是留？

我们在 7 月的一个持续了一周的令人窒息的热浪时期回到特拉维夫。这座潮热的城市一见面就这样排斥了我。十年之隔让这座城市显得比以往更丑陋：杂乱肮脏的郊区，没有中心地带。战争、浮夸、贪婪，伴着喧闹的娱乐和发着同样汗臭的宿命、傲慢和绝望的混合物。我们在布拉格大街租了一间位于中央公交车站后面的带家具的两室公寓，准备搬进去。傍晚时我们出去沿着海边长时间散步。晚上我们四处尝试好饭馆。八月的时候，她参加了为教师组织的内盖夫沙漠一日游。那天晚上回来后，她说，咱们搬到特尔科达去吧，那是世界的尽头，沙漠像海洋一般，一切都那样坦荡。你来吗？

一周的黄金时光都荒废在犹豫不决上，我脑海里记得城镇存在前特尔科达的样貌。六十年代末我在那里工作过几周，住在铁丝网围起来的帐篷组成的营地里，军队的坦克一天来送一次水和贝尔谢巴来的报纸。那三周里，我每天从日出以前到日落之后在灼人的阳光下沿着悬崖下游荡，走遍了那片荒芜的平原。晚上借着油压灯的光亮，我坐在指挥帐篷里绘制草图。那是一个宏伟的规划，摈弃了以色列一贯的设计方式，试图建筑一个精密的、自给自足的沙漠城镇，灵感是受到北非撒哈拉沙漠城镇照片的启发而来的。尼莫罗德·芬克尔看了草图，耸耸肩说，还是那个老西奥，陷在他的梦想里拔不出来，想法很聪明、新颖、有创意，问题是，你和以往一样没有考虑一个问题：说一千道一万，以色列人归根到底要住以色列式的房子。管它沙漠不沙漠，你说，西奥，谁愿意一下子觉得被送回了北非？是波兰人？或者罗马尼亚人？或是摩洛哥人？摩洛哥人最不想这样了。你记住一点：这里不会成为艺术家的领地。

那多少就是我为沙漠城镇特尔科达的建设做的最后的贡献了。我从未有过哪怕一点点渴望回那里看看的念头。我想像得出他们建了一排排一模一样

的、一楼下面是水泥柱子支撑、阳台装了滑动百叶的楼房。他们会往光秃秃的水泥柱子上钉上各式的注意事项，会设置出信箱，以及替士兵支援委员会收集旧报纸的空间，还会在每栋楼前安置方方正正的垃圾箱。

这一周结束时，我对诺娅说，好吧，为什么不呢，咱们试试。我心里的不知什么东西回应了她，让我想跟着她上沙漠中去，或是天涯海角。我取出在多伦多银行存款的一半，一部分买了政府债券，一部分投进股票和养老金，买了现在住的公寓，并在赫兹利亚买了一处产业，每月能带来一千元的进项。诺娅立刻找到了一份在中学教文学的工作。我开了一家小的规划公司。七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一起，像一对夫妇，经历过了育儿纷争，又恢复到安静的规律中生活，在等待孙子辈来访的间歇中依靠照看室内植物过活。我们在起居室里摆放了一套三件的白色组合家具，又配了一条地毯。周五晚上诺娅经常请几个人过来，有的是一些老师和她们当职业军官的丈夫，还有本地圣歌队指挥赫兹利亚，还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一对来自荷兰的医生夫妇，一个水压工程师，一个食素的、排斥皮鞋的新立体派艺术家，还有一个戏剧导演。我们谈国家安全和被占领区，开政府部长的玩笑，抱怨小镇没能继续发展而且优秀的居民开始离开，被一些平庸的人取代。可能俄国来的移民还能给我们带来点生机。尽管实际上，他们在这儿能干什么呢？他们会和我们一样在太阳底下晒成干。诺娅让大家享用水果、饼干和让人天旋地转的、用魔法和白兰地混合制成的南美的咖啡。若是谈话时一个人停住了、犹豫起来、试图找贴切的词句，诺娅有个一下子跳进空档的习惯，总是自告奋勇替他结束那停在一半的句子，帮他发现那个一时丢掉了的词汇或是让那个被堵住了的想法重获自由。但并不是仿佛她主宰了谈话，而像是个站在特定地点的领座员，温和地搀着任何迟来者的臂膀确保他们不会在黑暗中在哪个看不见的台阶处绊倒。

夜晚渐逝，谈话也分成了几组：男人们讨论公共生活准则的堕落，女人们则就报纸上引发争端的新戏剧或是小说交换意见。有时他们会再聚到一起讨论特拉维夫艺术圈里的丑闻或是近来电视上播出的东西，有时甚至说到本地的些许情爱事件，这个大部分要归功于穆奇·佩莱格。艺术家会说，比

如：几天前我到里雄莱锡安看了青年抽象艺术家的展览，后来还有一个当代多样风格的展览。艺术在大步前进，文化蓬勃，我们却静坐此地慢慢在阳光下蒸发。里雄莱锡安现在有一条步行街，有画廊、艺术家俱乐部和餐馆，还有一条街亮堂堂的，充满活力，人们半夜里从特拉维夫夜生活回来，然后填满了咖啡馆并且大谈戏剧的新走向，我们在这儿也就是玩玩十五子游戏、看看电视然后跟鸟儿一起上床睡觉。那个体操老师说道：哪怕是能给我们接上有线电视呢，和别人一样。然后她丈夫，那个陆军中校，讽刺地补充道：你可以确信一件事，亲爱的，区内的那些定居者看上有线电视会比我们早得多，在他们眼里我们排在队尾，那是说如果我们在队里的话。诺娅说：我们可以把那个展览办到这里来。我们可以配上射灯把创立者大厦的走廊转变成画廊。而且我们为什么不能时常从贝尔谢巴请个艺术史专家来做讲座呢?

至于我，我穿梭于室内，用平等的姿态提供饮料、清理烟灰缸、时不时提供一些加勒比岛屿的轶事或者印地安式幽默的范例。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坐着听。试着猜想诺娅在客人离去后会做何种判断：好或坏、热或冷、绝望。而她曾对我说：你可真是个总结狂。别做总结，只是看着。

午夜时分或是十二点半时客人散去，约好下周五再聚。诺娅和我清扫洗涮，然后坐下再待半个小时，冬天喝点温热甜红酒，夏天来点冰咖啡。她的金发遮住半张脸，但她的印花裙子露出她的双肩，它们纤细而柔弱，像有秋季的地方秋天时渐黄的叶子。这样的时刻，当我们对刚离去的熟人交换意见时，我仍有冲动要用长围巾裹住她那柔软后颈附近的长了一块小小棕色胎记的肩膀。我开始用我惯常的方法求爱，那种享受等待的方法。被金银花的香气吸引。有时我们坐在厨房的桌边一直聊到两点半，聊我们周末曾经到过、看过的科迪勒拉附近山上的胜景。直到诺娅打断我的话头说，说够了，咱们做爱吧，然后她解开我的皮带脱掉我们的衣衫把她的头放在我的肩窝里把我的手指放在她唇上。我们的生活平稳而安定。起居室的地毯是白色的，扶手椅也是浅色调的。它们中间是一盏黑色的金属标准灯。屋角放着室内植物。我们各有卧室，因为发觉睡眠习惯不同。

天气好的礼拜六，我有时在六点半把她摇醒，我们穿好衣服喝杯咖啡，

套一件套头衫出发看沙漠中有什么新变化，用几个小时走下山谷，再花几个小时走上来。我们一回家就从冰箱里随便找点东西，省了坐下的麻烦，咕吱咕吱吃了然后就上床睡到下午。她想要在厨房的桌边坐下时，远远的、朝前倾着身、聚精会神，备课或是改作业时，我就坐着看那支红笔在她那老化了的、似乎要背叛她年轻身体的手指间颤抖。总有一天我要给她一个惊喜，买一张能放进她卧室角落的小书桌。这会儿，我将计划搁置，以便能看她坐在厨房的桌边。她一改完作业我就给我们弄点吃的，再打开电视，然后我们坐下看周六下午的法国电影。礼拜六晚上我们有时上咖啡馆或去巴黎电影院。在广场那儿夜晚的空气中散步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回家，在厨房的桌边听点安静的音乐。第二天，新的一周从这里开始。七年以来一直如此，小心避免重复流浪艺人们——仿佛他们不祥——的激情老调：流浪、受难、破灭。直到她一个怪异的学生死了，死于一起中毒事件，也没准是自杀，没人知道。她没有编一本纪念册，倒答应要帮忙建一所纪念他的康复诊疗所。那孩子的父亲许诺了一笔捐助，而且出于某种我无法揣测的原因决定让她负责一个类似理事会的组织。诺娅能懂什么委员会和理事的事儿，这是注定了要导向我不想让她经受的失望和尴尬的，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阻止。最初我试着温和地警告她，而她以一种我不知道她具备的、带嘲讽的怒火作为回应。然后我试着用各种简单的建议帮助她，碰上她断然的拒绝。她确实心不在焉地同意接受我借给她的一笔钱，毫不把它当做枷锁或圈套。

我能帮她的惟一方法就是避免任何想帮忙的企图。我只能撤后，就像是用控制呼吸的方法减轻疼痛——这对我来说并不难。那个奇怪的项目对她来说开始越来越珍贵，就像施罗姆·贝尼兹利说的“眼睛里的光华”。

就像是她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情人。

那我呢？我随她至此，来到她世界的尽头，只为了想和她在一起。沙漠的宁静全无，我现在拥有的全部感觉就是在接近危险。而我却无法阻止，因为不知道它会从什么方向到来。有一次，在所有这些之前，在军队里，因为我拒绝了工程大队的命令，我自告奋勇要到沙漠里的一个小侦查队去服务六个月，在绕着拉蒙山转的吉普车里颠簸。那是在路修好之前，在这儿连土路

都没有之前。有时能在月光下看到鬣狗的轮廓或在日出的第一束光芒里看到山丘线条上似乎凝固不动的一群野山羊。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岩缝中整日睡觉，到晚上才出来跟踪追击或在夜里趴下埋伏等待从西奈往约旦去的翻越内盖夫山的走私人马。那是 1951 年，或许是 1952 年。我们有个贝督因向导，一个粗鲁、寡言的人，不再年轻，穿着一身破烂的英国边境警察制服。他知道如何辨认足迹，即便是在岩石地上。他能在闻过太阳烤干了的驴粪或骆驼粪之后告诉我们是谁、何时经过了这条路，以及他们是否装载重物，甚至他们从属哪个部落。他能以干了的粪便为基础判断动物吃了什么、在哪里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知道他们的来路和可能的去向以及他们是否在走私。他是个个头不大、精壮的男人，他的脸并未晒黑，而是游牧民族营火冷却后灰烬的颜色。都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在部族仇杀中被杀害。而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阿什凯隆的瘸子。即使是在黑云遮星蔽峰的夜晚，他也会弯腰捡起一个磨钝了的子弹匣、一枚旧扣子、一块干了的痂皮、一个有人类排泄物的黑色卵石、一根丢弃在岩石窄缝里的啃过的骨头，然后用手指尖为这些东西解密。我们从未给他配过枪，可能是因为他在我们睡着时总是清醒的。只有当我们都清醒异常的起动充满追击惊险的吉普车、让机枪射击的沉闷声音在山谷中一声接一声回响成串时，他才能离开我们，在一辆肮脏的吉普车后边的车厢地上打个盹儿。他狐狸似的下巴夹在两膝之间，眼睛半开半合，等着宁静再来将万物罩上灰尘的面纱。之后他不声不响地醒来然后光脚走开，弯腰曲背，像是要下压亲吻土地，自己独个踢踢踏踏地走着嗅出一个我们路过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入口的洞穴或坑凹。他叫阿泰夫，但背着他我们管他叫“夜晚”，因为夜晚对他来说很亮，仿佛他有夜行动物的特征。但我们很当心，有他在场时从不这样称呼，因为，我们提醒自己，希伯来文的夜晚一词 *laila*① 在阿拉伯语中是女性的名字。

①小说的希伯来文原题目是 *Al tagidi laila*，其中 laila 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夜晚”，但在阿拉伯语中是女性的名字。因此本书题目《莫称之为夜晚》也包含“别称之为莱拉”的意思——译注。

我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的那张他们称之为“解说律法圣贤之桌”的桌边把穆奇·佩莱格从乱糟糟的出租车司机聚会中抓出来：他忘了我们今晚要在琳达家开委员会会议的事了。瞧瞧吧，伙计们，大饱眼福了吧，瞧瞧谁来接我，他对他的朋友们说，挂着一个跟总统合影的人的那种明朗的笑容。

朝西走向落日，我们在红绿灯处穿过广场。巴黎电影院正在上映惊悚片：看来英国喜剧在这里没有成功。一个左倾的喜剧，穆奇说，琳达拽我去看，但我说服她在中场休息时出来了。我们回到我那儿，听了些流行曲儿，能让你上道儿的那种，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我明白他的意思。

然后他告诉我他把三万三投资进一家三人分成的旅行社，主要经营送浮游青年上拉美旅行的生意。也许西奥也愿意加入，他对阔边帽有点了解，我在清算人来之前几秒钟对他们出其不意的下手，毫不夸张，实际上我这三分之一至少值四五万，要是西奥也弄上三分之一，我们一年就能赚上十万。

广场上是夜的静寂。一阵西风吹动，仿佛要把海洋带到这里。一辆偶然经过的车开过停成一列的汽车。一群燕子在街灯上飞来荡去，突然转向东边然后又改变主意再次在电线上栖成一片。我喜欢这座从不伪装成别样的广场。商店、办公室和用餐的地方，简单的橱窗装饰，一切都是谦逊的。它前面的覆没勇士纪念碑和饮水喷泉互相很般配并且都和特尔科达的中心很般配。广场自身也很好，就像工作日的服装适合工作日穿一样。西奥七年前建议应该建一个周围有棕榈树和黑岩石的黑玄武岩喷泉时，我觉得那是个冷酷的想法。但没道理这么说，况且无论如何这条建议未被采纳，而且永远也没

有被采纳的可能性。问题不在于他没有想法，他们这儿说，而是他不切实际，老阔边帽，对我们的小镇来说他要大上好几倍。那以后他们有时候甚至说那是因为西奥已经好久没有提什么方案了。

穆奇·佩莱格说：真是个美丽的夜晚。你也很美。

谢谢，我说。顺便说一句，我喜欢你说的“浮游青年”、在你那儿听流行曲儿和所有的那些话，试着别去伤害琳达。她没有那么坚强。

除了爱没有别的，穆奇叫道，用正直受到伤害的姿态将手放在胸膛。爱，除了爱没别的，那是她从我这里得到的。还剩下足够的可以四处转，所以你若是也需要一些的话你知道该来哪里。我也会让你浮游起来。

现在大部分商店已经关门了。橱窗里灯光晦暗。人们不慌不忙地在广场上走来走去，夫妇、父母和孩子，母亲推着婴儿车，还有四个穿戴随便、让沙漠太阳烤过的游客。漂亮的莉莫·吉勃阿，穿着红裤子、高跟鞋，走在两个追求者中间，两人同时在和她说话。阿娜特和奥哈德，一对年轻男女，她不久前还在我的一个班上，站在波佐鞋店门口窃窃私语。橱窗里，皮尼·波佐在镶了珊瑚的黑色镜框里挂了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一名十七岁半的士兵在单相思发作时，开枪打死了他们和商店里所有其他的人。

几个老人坐在矮牵牛花坛边的市政长椅上低声交谈。在他们中间，看得到瞎子路波，坐在长椅尽头，和往常一样被一群胆子大得敢于落在他的膝头和肩膀、从他伸出的手上吃玉米的鸽子围住。他的德国牧羊犬在他脚边打盹儿，无视鸽群。盲人的脚绊着了狗背，于是他赶紧道歉。与此同时，交通信号灯每分钟转换着颜色，尽管没有等候的车辆。在女士内衣店“迷醉时装店”，一个头戴吉伐提步兵旅贝雷帽、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军官半张着嘴呆呆地盯着橱窗。

我们穿过本－古里安大道的时候街灯亮了。其实还不需要它们，因为白昼仍在缓缓隐退。半边天被照得通红，条条狭长的云朵嵌在其中。在晚上通常的声响——一个女人叫她的孩子立刻进屋、帕勒莫店里感伤的音乐、西风吹拂下摇动的金属广告牌的低语——下面，有一种深深的、广阔的寂静。本－古里安大道尽头处、灰色广漠的开始处，两辆推土机停在那里，其中一

辆巨大。在它们边上，守夜人用小树枝点了一堆冒烟的篝火，他和三条狗纹丝不动地坐在地上盯着火看。头上一只静止的渡鸦在散落着云朵的日暮微光里形成一个黑点。来了另一只。又来了两只。

二十年前在灰色山丘环绕中还有个荒芜的高原。只有那条通往山崖后边山谷里军事基地的模糊土路经过它。现在有了九千常驻居民，形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城镇雏形，平平展开。它都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定位，却已经开始渐渐向高原扩展了。城里有大约十五条道路，相互垂直或平行，全都通往沙漠。来自三十个不同国家的人们住在对称的五个区内，上班或是去咖啡馆，往存折里存钱，给婴儿换尿片，更换他们的窗帘或是太阳能热水器，把后阳台包起来增加一个房间。仿佛这里的一切历来如此。还有一个健康诊所、一个图书馆、一家酒店、一个小工厂，之后就是那个两周前从基辅来的弦乐四重奏。一个奇迹，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在那次死亡后头一次来这里时说，有时候，打个比方，你可以把它看做是个奇迹，至少是个小奇迹。他又补充道：伊曼纽尔爱特尔科达。这里是他的家。

小花园里的土壤是居民从远方运来的，用卡车，他们用它盖住了燧石层，仿佛敷裹伤口。沙粒从宽阔的广漠返回，落下来再次征服本属于它的领地。但花园坚守着拒绝被击溃。有几个地方，树冠已长过了屋顶。燕子从远方寻路飞来，在树冠上歇脚。安详、素朴，几乎温和，这就是夏扎尔总统大街晚上七点在我眼中的样子，正是白昼将尽天空仍赤的时候。每个花坛里的软管都在同一时间开始浇水，全凭市政灌溉电脑的一个小小电子脉冲的操作。太阳落山时小公园里的洒水嘴开始转动。而创立者大厦的正面，被隐置在木槿丛中射灯的光线照得通亮。

我们看见一个阳台上贴有一张手写的广告：出卖或出阻。那是新的房地产商，巴格罗尼兄弟公司。穆奇说：真是弱智，没把“卖”写成“买”要算是奇迹了。我说其实我挺喜欢住在一个比我年轻二十五年的城市里，你能看着生活演变。穆奇笑着说：算数里的十分之零。诺娅，你说二十五年是什么意思，你看起来绝不超过三十三岁半，而且一天比一天年轻——这样下去你很快就是十岁了。脸又红了，是吧？还是只是我的想像？一两分钟之后，当

他理解了我说的话，他用不同的语气补充道：听着，也就这几天我要亲自动手并且用我自己这十一根指头搭出一些东西来，遮住或改变那些可怕的太阳能板和电视天线。让这儿看起来好一点。

我说：柏树会长得更高，这样我们就有比群山和悬崖更美的天空轮廓了。

穆奇说：然后他们会在这儿建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再给我们修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有船有钓鱼的人和所有东西，我将是建设承包人而全权负责，条件是你晚上得在桥上吻我。

我几乎就要在原地吻他，在夏扎尔总统大街上，这么一个狂热的、邋里邋遢的男孩儿；我克制住了自己，只说：现在就很美了。那是说，要是你还记得它开始时和以前的样子。荒芜里钢管建成的军营。这里从沙子和梦想起家，我从哪儿听来这些的？

穆奇说，还没开始呢，就什么也挡不住她了，就像有人问皇后的轻骑兵他怎么这么瘦的时候他说的一样。抱歉。顺嘴滑出来的话。别生气。

他们在电影放一半的时候出来回他的公寓后他给琳达放了什么样的流行曲儿？

灵魂的音乐。剑舞。西班牙舞曲。他有几年来各种女孩送的成堆的磁带。我去的时候，他就让我选，他还给我调了一杯劲头十足的鸡尾酒，人间没有的。几天前琳达拽他去参加在德莱兹纳医生家的一个私人家庭音乐会。那个从俄罗斯来的四重奏小组演奏了一些悲伤的曲子，然后放起唱片，更令人难受，给死去的孩子写的歌。肯定是马勒，我说，《悼念亡儿之歌》。其中一首叫《当你亲爱的母亲进门来时》，每听一次都会让我颤抖，即使想想也会这样。穆奇说，你瞧，我并不很懂这些东西，马勒、德意志、哲学，但诚实的事实是，我那天晚上在那儿听了那首死去孩子的曲子时觉得都要哭了。仿佛它穿透皮肤而不是耳朵直冲你的内心。甚至经过毛发。如果世上真有一件坏事，比坏还恶劣，可怕，就是孩子们的死亡。我反对孩子们的死亡。那是我参加委员会惟一的原因。你原来怎样认为？我就是因为这个要参加现在这个会。

琳达端来了盛在精美希腊杯子里的咖啡。一个成套的玻璃动物园填满了三层架子：精巧的老虎、透明的长颈鹿、亮晶晶的小蓝象、优雅的狮子，汇集并反射着灯光，一个很小的、带照明的只有一条金鱼的鱼缸以及一组微型花瓶，玻璃里的气泡像泪珠般永远锁在了里面。四年前她丈夫、保险推销员因为爱上了她的姐妹而离开了她。几年来她在这里的小洗衣机厂做兼职秘书。她在当地合唱团排练时弹钢琴。所有工会组织的旅游她都登上记，参加了移民吸收委员会、艺术和手工团体、画廊推广专门小组、老年日间中心支援团体的自发活动。她是一个害羞的、患气喘病的四十多岁的女人，脑袋上盘着一条老式辫子，耳语般的声音，和瘦骨嶙峋少女似的身体。我们开会时她给大家端送饮料和坚果，然后安静地蜷缩进沙发一角，仿佛脑门在被往膝盖上牵引。

会议开始时我们请路德米尔做会议记录。路德米尔是一个个子高挑、晒黑了的七十多岁的男人，又高又瘦有点驼背；让人想起用铁丝和酒椰纤维做的比例失调的装饰用骆驼。他总让人觉得他邋遢的卡其布短裤下和破旧凉鞋里的那双血管暴突的、晒黑了的长腿是紧连着胸部的。他有一头预言家式的长密灰发。他用苦涩和哀愁做武装，年复一年地在马上挑战一匹又一匹的龙。而且从不曾忘记他那句招牌话："没有火哪有烟"。早在先遣营那个阶段他们搬到特尔科达来的时候，他和妻子古丝塔就住在一间微尘不染的小屋里，有长疯了的西番莲，就在创立者大厦后面。古丝塔·路德米尔是一个高而严肃、戴眼镜的女人，灰辫子像绳子一样绑在头上，是数学家教。她穿着老式衣服，领子处还严严实实地别上一个色泽暗淡的银甲虫，有时她会让我想起以往英国上流社会的寡妇。四五年前有一次，路德米尔刚从电力公司退休后不久，他告诉我说他惟一的孙辈，一个他和他太太一手带大的十六岁的女孩，为了能到一家特别的舞蹈学校学习，突然决定要离家到特拉维夫一间她租的房间里独自过活。路德米尔坚持让我和她谈谈并且"阻止她将年轻的生命抛弃进那座大城市的旋涡中去，在那里等待她这样的年轻生命的只有掩藏在闪光职业的甜言蜜语后面的丑陋和堕落"。于是我请莱拉克·路德米尔，一个紧张多疑的女孩——眼睛像被捕猎的瞪羚，头部仿佛是被锤子永远地敲

进去似的陷进肩里——上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喝一杯热巧克力。我试着了解她的梦想。但当我将手放在她紧绷的肩膀上时她突然一动，脸变白然后跑掉了。那次让我懂得了触摸孩子们的时候要小心。路德米尔不再理我，认为我破坏了一切，而且他将孤单死去全是由于我的错。两年以后他原谅了我，想法有所改变，最终认为所有的人都必将是孤单的。“没有火哪有烟”是他用来打破隔阂的第一句话。但时不时地，他会从突然聚满痛楚的孩子般的蓝眼睛里向我射来一个长长的深受伤害的乌青眼。

琳达去她的厨房做新咖啡并再准备些水果和买来的饼干。她让我们开会不用等她，门开着，她在厨房能听见一切。我也过去帮帮她的忙，我们回来时路德米尔已经爆发了，而且正在狂暴地对穆奇大吼——我们怎么能自己做主买那个破烂的废墟，都不询问一下委员会，那个窑子、吸毒成瘾的家伙们的毒窝，都不问问自己那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无赖的差遣非我所愿执行”，他说这来自李·戈尔德堡的诗句。当我指出这是拉海尔·范哈根的句子时，熔岩从朝向穆奇改道喷向了我——多么屈尊，如此傲慢地卖弄学识，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这是解救年轻生命的行动还是学术研讨会？我们是生命挽救小组呢，还是在这样的外省戏剧里的傀儡：一个无聊的女人设下另一个圈套给自己捉一个套着武器走私贩影子的新爸爸，而等他来了她就要把他变成娱乐自己的小婴孩。

一边说着他把记录本扔在桌上走了出去，摔上了门。他要放弃。在反感中离去。抛弃了所多玛和蛾摩拉①。几分钟后他按铃回来了。他抵触地静静拿起记录本，整个晚上都在鱼缸附近的角落里背冲我们坐着。事后发现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整个进程做了忠实而精确的记录，严格克制自己，只在记录中某些地方画上中括号写上“原话如此”，然后打上惊叹号。

我把我面前桌上早已准备好了的摘要发下去，戴上眼镜然后一条接一条地继续。要平息市里正在酝酿的疑虑有很多可能的途径。比如说，我们可以为本地上瘾的孩子们提供免费治疗。我们可以同意给教育委员会、学校经营者和老师们永久的诊疗所管理理事会代表席位。或者，不如不叫诊疗所而叫

①所多玛和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为上帝所灭的两座罪恶的城市。出自《圣经·创世纪》19：23——译注。

康复共同体。要在年轻人和毒品区中强调为特殊的专家提供研究奖励金的意向，这样特尔科达就能渐渐变成闻名的研究中心，吸引全国正在成长的学者和科学家。我们理应不断重复前驱性的主旨和社区参与的问题，还应该强调为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团队——这些可以为城市生活做出贡献的人——创造的工作机会。治疗上瘾的科学研究观点分成生物疗法和心理疗法，而在我们这儿可以将其合而为一。还有我们为什么不让地方警务长官加入？他要是能颁发一个声明推介我们公开地与年轻人中的上瘾问题做斗争，我们就不用在毯子底下扫地了。如果是警方向公众解释建设一个封闭的机构能够减少而不是增加城里的犯罪率的话，是会对我们有利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主题：社会共同的责任、公民骄傲、一个将会让特尔科达变为其他城市榜样的创举。

路德米尔敌意的沉默化为一声嘘声：强调主题，听见了吗？

当他看我的时候，眼中再次涌出那种压抑着的痛楚。

这时，穆奇·佩莱格在沙发上打盹，他艺术家般的乱发埋进琳达尴尬的瘦骨嶙峋的大腿；他脱掉了鞋并且把脚放在我膝盖上，仿佛形成了一条从她身体到我的身体的桥梁。他在睡梦中咕哝着需要一种个人方法。路德米尔又爆发了，他尖锐的声音震得玻璃动物园和那组泪珠花瓶咯咯做响。

伪善不会盛行！

我意识到该结束会议了。我建议我们应于一周后再聚，等我见完警务长官之后。我们要起身走的时候，琳达羞涩地问我们可否再多待几分钟，她想给我们弹一首曲子，没什么特别的，我们不应抱太高期望，真的很短。她头垂着坐到钢琴前，好像要用前额触碰琴键。弹到一半时，她的哮喘发作了，咳得很厉害都没法呼吸了，只好停手不弹。穆奇·佩莱格从她卧室给她取来喘乐宁气雾剂；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把茶勺放进他粉色衬衫的口袋，然后过了一会儿笑嘻嘻地从路德米尔的头发里拿了出来。只有他笑了；一边道歉，一只手抚摸着大口喘气的琳达，另一只抚摸着我。

琳达几乎是耳语地说：我们今天没有多大进展。

路德米尔说：跳出煎锅直奔火坑。

明天晚上我要去警务长官家和他谈谈。如果我能设法让他站到我们这边的话，我就要试着让他参加一个家长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会员的特殊会议，我也得问问巴特希瓦。接着很快要找个周末弄一个让教授、公众人物、艺术家参加的见习日，要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请一批人。许诺能在科达饭店住一晚上能引诱他们前来，而这些知名人士则能让科达饭店免收住宿费。我得为这个见习日打出一份提纲挈领的事实要报。如果公众情绪有所转变，我们也许至少能——至少能干什么？你怎么了，诺娅？

我要不要请西奥私下里和巴特希瓦谈谈？

事实上，在特尔科达，没有人比西奥更有资格给这项创举挑头，去平息疑虑，影响公众言论。无论如何，在拉美的那些年里他成功地设计建造了大量的居民区、工业区、房屋结构和比特尔科达大好几倍的新城。两年半以前，一个冬天的周日来了很多教师、工程师和医生代表，要他同意作为首席自由竞选人——他的资历、他的记录、他给人信心的样子、他职业上的知识、他的形象——代表他们参加当地竞选，他婉拒了。西奥打断他们的话道：那不是我想要的。他更厉害地闭上了左眼，仿佛越过他们头顶向我使眼色，谢谢你们，他说，站起身来，感谢你们来邀请我。

苦涩而难缠。盲眼里的光华。或者他仅仅是被限制在一把看不见的轮椅里了？

那我又如何？一个无聊的老师翻开新的篇章？把自己扔进考场？还是我在诱发他，搅得乱糟糟的好让他醒来，如果这种说法适用于一个患失眠症的男人。

我们走的时候，穆奇·佩莱格表明琳达，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坚持要他留宿。可能他希望我会嫉妒。我步行送路德米尔回创建者大厦后面的有长疯了的西番莲的他那间微尘不染的小屋。在路上老人说：穆奇充其量就是个没教养的小丑，而他的琳达是个滥情的傻子。喀尔巴阡山脚下有一座偏远的村庄，有三十个小屋和两个钟。一个属于村长斯塔罗斯塔，另一个是执事的。一天一个钟停了而另一个丢了，又或者是正相反的情况。整个村子就没有了时间。于是他们派一个男孩——他很聪明，也有文化，翻过山到纳德沃尔纳

亚村去问回时间来，调准不走了的钟表。然后，孩子爬了一天半或更久，到达了纳德沃尔纳亚村，在火车站看了钟，把准确时间小心地记在一张纸上，折好这张珍贵的纸，藏进他的皮带然后又回到他们村。要是我得罪了你，请你原谅，诺娅。我很抱歉。我不可能在那儿保持沉默，不对我们这种没用的空谈发怒。

立刻他就开始抱歉自己使用了形容词“没用的”：他试过要把事情做好但总是把它们搞得更糟，他想要和解却往伤口里糅了盐。我们头上总是在落火焰和硫磺，诺娅，因为同情本身沾染了傲慢。没有火哪有烟。如果可能的话请原谅我。我无法原谅自己，但是你还年轻。祝你晚安。愿大家获得怜悯。

我十点钟到家。发现西奥躺在起居室的白色地毯上，和平常一样穿着背心和运动短裤，赤脚，没读书，没开电视，他也许在做白日梦。他吻了我的脸颊问我事情怎么样，我吻了他剪成军人样式的硬硬的灰发，说：很可怕。路德米尔疯了，穆奇是个婴孩而琳达是感伤的。也许我也如此。没人能一起干。毫无意义。不会有任何结果。

等我冲完了冷水澡，他已给我们做了些晚餐。一个几何图案的色拉配有雕成玫瑰花蕾形状的小萝卜，放在木餐板上的奶酪和刚切好的全麦面包，里边放了一块奶油的煎锅在煤气灶上待命，旁边有两个鸡蛋和一把刀，制作炒蛋的准备已经就绪。这是一个有一成不变规则的仪式。我给我们倒了些矿泉水。面对面坐下吃饭。他裸露的宽肩膀靠在冰箱侧面。我面对着他和他背后框满沙漠繁星的窗户。西奥告诉我说他今晚也出去了，他去找巴特希瓦了，他觉得我会要他和她谈谈。

我还没请你做任何事情。最不想要的就是你会去给我打开一扇门。

确实如此，但是，你还是应该听听我的：我的印象是，同意某种条件的话，我们可能有一线机会能把这件事办成。

我们？

好吧。你。对不起。即便如此，我觉得你还是该听听。

饭吃到一半我站起来把自己关进卧室。一会儿以后，他敲了门。诺娅，

我很抱歉，我只是想——

我原谅了他。我回到桌边。炒蛋凉了，于是西奥站起来，把一条擦手毛巾当围群系在腰上，开始给我重做新的。我让他停下，并不需要，我不饿，我们可以喝点草药茶然后看看今晚有没有可看的电视节目。我们打开按钮，然后几乎立刻又关了，因为正在播出能源部长的采访，他在我们关掉之前说，没错，这是不可想像的……西奥放上一张唱片然后我们默不做声地在扶手椅里坐了一会。也许在那一刻我们确实彼此相像，正像穆奇有一次说的多年没有孩子的夫妇那样。我突然站起来走到西奥那里，蜷伏在他大腿上，把我的头埋进他的肩膀耳语道，别说话。我想起了蒂吉，那个我从未谋面的贝尔谢巴的信教的打字员，那个爱上了篮球运动员还给他生了一个他不承认的“蒙古症”孩子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婴儿，我想，即便残疾又如何，那是活的，而正因为残疾他才需要而且应该得到更多的爱。那个灰暗的冬日的上午伊曼纽尔独自在昏暗的医务室做什么？他怎样又是为什么去的那里？他病了吗？或是溜进去从医药柜里给自己找些他缺不了的东西？我知道的多么少啊。即便是现在我也一无所知。如果我现在遇上一个上瘾的人，我如何能在四五英尺外判断出他是吸了毒还是困倦或是仅仅患上了流感？当伊曼纽尔突然开口，他害羞的声音越过屋里沉默的深谷，问我是否有过可写的什么东西时，他实际上想干什么？还是他仅仅是茫然的，试着要交流？而我将他推开。我把自己围了起来。我没能领会那实际上是寻求帮助的请愿。

西奥。听我说。书籍装订商卡什纳想给咱们一只两周大的小狗。别担心。我告诉他你对宠物不感兴趣了。还别作答呢。听我说点别的，听听这个滑稽事，琳达爱穆奇·佩莱格而他很显然也跟她睡了，但他还是很在意我，而我还爱你。你呢？

我，西奥说，嗯，这样想，他没继续说下去而是突然拉起背心把我的头拽进去，把我包在他胸口黑毛的穴窝里，像是他怀上了我。

播六点钟新闻的时候我做了份水果色拉。我闻了冰箱里的盒装牛奶，像往常一样既怀疑牛奶又怀疑我的嗅觉。然后我开始收拾厨房的架子，从右往左。我希望她能早点回来。快七点的时候我到阳台上看白昼引退。一条奇怪的灰狗慢慢穿过花园消失在九重葛凉亭后边，筋疲力尽似的摇摇晃晃。花园和沙漠之间是黑石围墙。在随夜晚一起变暗的墙和后边的两棵柏树的后面是荒芜的山丘——但山丘不如若隐若现的旋律明显。事实上，那若隐若现的旋律是隔壁公寓里什么人放的唱片，没有完整的旋律，只是单调的小节在明显毫无变化地重复着。电梯六次路过我们这层而没有停。我记起她今晚在穆奇的琳达家有个会。我决定出去。下去看看干涸河床里有什么，或者上广场那边看看图书装订商卡什纳想要给我们的德国牧羊犬的幼崽。

六月末。天很长。夜又干又凉。前门外边一些年轻人坐在矮墙上，我经过他们时他们互相耳语好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特尔科达的那辆、而且是惟一的一辆巡警车从我身边开过，没有打示意灯就减下速度。警察朝我挥挥手笑了：晚上好，阔边帽，我们怎么老是见不着你啊？街头一阵突然的微风吹出低哨的声响。我起动了雪弗莱径直向哨声飘来的方向开去。沿街只有九个住宅街区，在最后一个的后面，马路立刻变作车轮压成的土路，可以顺着开，如果你愿意的话，往南边去，然后往东南直到采石场入口处。我一到高原上立刻就意识到风比我在城里感觉到的要强得多：不是温和的微风而是一阵强风，呼啸声压过轮胎压地的声响。我很难透过车灯前挥舞着的、还有绕着我旋转的灰尘判断出路径，像是在暴风雪里开车。我想起要关车窗时已经太晚了。我以蜗牛的步幅继续摸索前行，试图从滚滚灰尘中识别去海耶纳山

的路并且辨明我右边干涸河床的边界。成千上万飞舞的细沙粒占据了我的整个视野，直到遮蔽了那划分沙漠和天空的清晰的地平线。这就仿佛在午夜时分穿越原始森林。我猜测左边的暗斑是山峦低部的缓坡，我缓缓地与其平行前进，右边吹来的西风搅着沙粒吹拍着玻璃。前车灯的灯光被沙尘切碎又晃眼地反射回我眼中，仿佛在浓雾中开车。车子左右摇晃颠簸不已，于是我意识到已经离开了土路到了石场，而从现在开始我至少得试着待在和山麓平砾石平行的路上。黑暗更深了。我打开大灯、雾灯、侧灯行驶，但沙尘仍继续切碎灯光。在雾状的沙中变得暗淡拖沓的光线又反射回我这里。

我决定还是不再走为妙。我熄了火，下车，站着等轮胎激起的云雾平息下来，但过了一会儿我仍被笼在厚重的、浓汤般的空气中。我迷路了。但我还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出左边悬崖的边沿。我起动发动机，决定走得离它近一点然后沿着它开，直到它将我引至军队沿着禁区的山谷修的电网，那样就足以让我找到石场的拐弯处。一朵低飘的灰云或是灰尘形成的柱子在我眼前遮住了天空。一种奇怪的感觉袭来，仿佛我不是在前行而是在上下移动，随着一个密封了的盒子在深深的海底摇晃。我享受这种感觉，直到眼睛都快闭上了，事实上也许已经闭上了，因为反正除了车灯前令人晕眩的激舞的沙墙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一时想是不是停在那儿，躺在地上等待会更好些。再想想又觉得看不出会等出什么变化来。我考虑到了前进包含的危险，因为有一些嵌进平原的很深的小峡谷，但我对自己回答，不要紧，我还是可以慢慢地一步一步前进。所以我挂在最低档徐徐开着，以五迈或者更低的速度。石片和沙砾在转动着的轮胎的重压下呻吟嘟囔。我有没有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路过了石场？又或我是否已经偏偏进了禁区峡谷？没有什么阻止我掉头往回开。但是没道理掉头，也没有可以去往的方向，因为车轮的痕迹立即就被风儿卷起的沙尘旋子抹去了。最好还是继续向南，如果那真是南方的话，直到我的轮胎淌进印度洋，或者直到我终于让自己入睡，然后沉入那早已久违了的但仍时常幻觉拜访我的深深的睡眠。

接着我辨认出在蒙蒙屏障那边有一点微闪的灯光，是采石场入口处的栅栏。我朝门卫闪了闪前灯，以免惊着他，但转瞬间我便意识到那不是采石场

的大门：我刚才绕着城镇南边兜了一圈而现在我从西边又进了城，这是高尚住宅区的本·兹维街。现在轱辘底下是碎石铺的路面，一排街灯，灰尘的厚墙消散了。我看到瓦屋顶和花园里黑乎乎的树木。被可怕的声音弱化了的木管乐曲调也消退了。暗银色的广袤和灰尘形成的毯子消失了。我一时间渴望掉头开回我刚才所在的雾中去。但为了什么？于是我驶过四幢一样的房子，它们的灵感像是来自老式儿童读物：简单、带烟囱的方形屋子，由红砖建成，门边有对称的窗户。我把雪弗莱停在第四幢房子的门外，停在巴特希瓦破旧的富士轿车后面；我下了车，没有费劲锁车，然后按了门铃。我间歇地按了三次，但没有回应，尽管左边窗户里有个友好的小亮灯，而且我觉得隐约听到了音乐之声从房里的什么地方传来。

我并不气馁，顺着一条铺着黑石的几乎被野夹竹桃罩住顶端的小路绕过房侧。最终在后面的花园里碰到了巴特希瓦。在无花果树树枝上挂着的灯泡的黄光下，她正和她的老母亲坐着享受夜晚的宁静。老太太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笔挺而严肃，头上包着一条绿头巾，胸前蜷紧的手臂硬梆梆地放在膝盖上。巴特希瓦她正在吹口风琴，我按门铃时听到的就是这忧郁的曲调。她全身伸展开来坐在一张椅子腿外翻的紫红色旧扶手椅里。它无疑曾摆在远东风格的画室里为其增色。现在这个室内饰件已经磨薄了而且内填充物从好几处向外露头，椅子被送到花园，像是一艘很棒的快乐巡洋舰停在沙滩边。她们俩头上都环绕着被照亮的飞蛾，我知道要是我在这里久留的话我头顶上也会绕上一圈同样的光环。

巴特希瓦·迪努尔，市长，一个和我同龄的女人，强悍，粉红脸膛，一头银灰短发，身子板很结实，身材不匀称，深深地坐在扶手椅中。她像一座朝各个方向延伸的山峦，仿佛她不只有四条手脚。她的牛角框的大眼镜滑下鼻梁。坚实的红色手臂看上去粗糙，像老书籍装订商的手臂。她总让我想起一个用坚实手臂统治周围的、胖乎乎的荷兰老奶奶或是旅店老板娘。

她一看见我就停止了吹奏。从眼镜上面怪怪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我开口说话之前就能一眼看穿我。她说：瞧瞧谁来看我们了。来这边，从廊子里拿把椅子到这儿来。不是那儿。这儿。

我拿了一把和她妈妈坐的一样的凳子，硬且纹丝不动。我记得要说，晚上好。

巴特希瓦说：安静，西奥。让我吹完。

她继续吹了一个我不知道的调子，但听起来隐约觉得熟悉甚至十分感人。

吹了十分钟以后她突然觉得够了，停下来，发出一声嘶叫，像头不耐烦的骡子。她把口风琴放进裙子在两个大膝盖之间形成的兜兜里。

不成样子，她说，我试着机械般吹奏，想挤干里面的情感，否则的话总像李子酱那样黏糊糊的，顺便一提，我讨厌那个。你的样子很可怕。

她盯了我一会儿，还是从眼镜上面，好奇的，彻底的，无丝毫尴尬，一个从未被对手打败过的厉害女人。然而同时她也是大方和精力旺盛的，眼中偶尔闪过邪恶的光芒，仿佛谁刚对着她耳朵悄声说了刺激的下流话，而这会儿她正在嘴里品滋味，迟迟不肯咽下去，故意延长快感似的。

我说：你瞧，巴特希瓦。我很抱歉下班时间闯来。事情是，我有个在上班时没法和你谈的问题。

她的老母亲说：塞里欧扎又来了。他陷入爱河了。他在找他的阿悠什卡。

巴特希瓦说：一个问题。好吧。我听说了。你太太。她的诊疗所。

我指出诺娅和我没有结婚。

为什么不呢？你应该结婚。诺娅是个小甜甜。

她冲我快活地眨眨眼，大脸盘被情感和洞悉一切的精明点亮。

给我两分钟解释。

我知道，我知道。你买了阿尔哈里奇破屋而现在被它困住了。你来想让我帮你，算了吧。

老太太悲伤地评论道：哎。他们不吃，他们不喝。哼——然后脑子就出来了。

巴特希瓦说：啊，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现在就烧水给咱们泡点茶。

她没离开扶手椅。

我说：不用。别起来。我就待几分钟。

巴特希瓦说：那好吧。请说吧。我们不让他插嘴还老说你说啊。现在你可以讲了。

巴特希瓦·迪努尔的丈夫在1967年的耶路撒冷战役中阵亡。她是专攻变压器的电子工程师，独自带大了四个孩子。九年前，我们来特尔科达之前不久，她成功地申请当上了洗衣机厂厂长。两年前当选市长，自此勇敢地战斗，用她自己的话说，要清除这块要命的废墟。她的孩子们都大了而且结了婚。她的孙辈遍布全国。每周六晚上她都和老母亲出去在信号灯边的广场上走来走去。要不然这一对就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坐上一个小时左右，而讨好的人会在她桌前排成队。她是个不知疲倦、直来直去的女人，总带着一股机敏有效的生硬作武装。她的敌人憎恶她而她的朋友则可以为她上刀山下火海。在城里他们管她叫“不屈的老卡车”。

你瞧，我确信要是有很好的公众舆论准备以及你提出的不论什么条件，一个小小的诊疗所，有点超前的东西，试验性的，具备一切适当的监管措施，可以是很好的福利。它能引来研究者。它可以成为地方自发活动的焦点。会有很有利的报道。而且实际上这就是你在找的那个鱼钩，能引来大学分校或者作为第一家医院的基础。考虑一下。

老太太补充道：冬天里温度计降到零下四十度，狼在小屋门口号叫，嗷——呜，像个弃婴。

巴特希瓦说：算了吧，西奥。永远不可能的。但是让我告诉你，冰箱里有点冰镇薄荷茶。你干吗不来点，也给我们拿点儿来。杯子在烘干机里。

巴特希瓦，等等。试着这么看，一个丧子的男人出现在这里说要给我们七万块，还许诺会有更多的。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他在行使他的权利。一个可笑的委员会，实际上。委员会买下了附近一处眼中钉一样的废弃的房产。注册为一个纪念基金会。有关的人充满热情，干劲十足。自然城里会有疑虑意见。有些很正确。这很能理解。但你要是在我们这头的话，那些怀疑会被扫清的。

谁需要它，西奥？看在老天的份上。一个鸦片烟馆。另外，他还没还你

一分钱呢。帮我个忙，把你的椅子挪到那边去。就这样。这样我就不用对着光看你了。你样子真的很可怕。

老太太插嘴道：炉子边长跳蚤的满身大汗的农民和衣而卧，门外狼在嗷——呜。同情算什么？已经灭绝了吗？消失了？

我没说是戒毒所。

啊，那是别的？那当然，你干吗不弄一份备忘录，比如说，沙漠石雕工房？岩石站在我这边，免费。

但必须是跟青年人的问题有关的，我说。是为了纪念一个死了的男学生。

塞里欧扎整夜颤抖。大家都睡了而他睡意全无。

年轻人。无论如何。电脑。你要做的就是说服你的捐赠人。比如说给青年电脑天才的中心。当然不能这么叫。那样好吧，妈妈？或者是给专攻高科技产业的年轻学者弄个温室。你至少得从你那个捐款人那里再弄来一万五对付设备费和管理费，即便那样也还考虑不了奖励研究金之类的呢。如果你能找到些学术方面的支持者，那我们就谈正事。干吗不呢？

那不是捐赠人要的。

我们会说服他，然后就是他想要的了。或者再找别的丧子的人。

我觉得诺娅不会同意的。捐赠人也不会。很难说。

那是你的事，西奥。巧妙点。然后再来找我。妈妈，你说够了。我们的冰茶怎么了？

我不要了，谢谢。我走了。我会试着和诺娅谈。不会很乐观。

塞里欧扎要病了。

不再待会儿了吗，西奥？没事？只是别打断我吹奏。静静地坐着，不，为什么不？你不妨碍我，是吧，妈妈？不妨碍的，是吧？恰恰相反，你很可爱。留下。

妥协一下如何，巴特希瓦？有电脑方面天赋而染上毒品的孩子？

她没有作答。只是鼓起了腮帮子，像个决意不惜代价取悦于人的大孩子，然后吹进口风琴里去。她吹了一首我记得是五十年代的曲子，“他不知

她的姓名，但不碍事，那条小辫总在她身边……”

我离开时，踮着脚尖以免打扰她，她停下来说：还有一样，西奥。得你负责。这得是你的孩子。安静，妈妈。小心开车。记住：我没给你任何承诺。

同时，夏季强烈起来。白昼压迫着我们，天昏昏且易疲劳，而且即使关紧了窗户，粉状的灰尘还是能钻进我的床单。柏油马路在赤日下熔化，到了晚上墙壁散放着残暑。从山那边吹来的南风带来大城市垃圾场烧垃圾的味道，一种像口臭那样带有微酸且烧焦的味道。从阳台上我有时能看见一个贝督因牧羊人伏在最近的山边，黑色山羊中一个黑色的形状，而断续传来的他那微弱的笛声引出宁静的超然。他一动不动地在一块斜石的阴影里躺几小时梦见了什么？总有一天我要过去问问他。我要尾随他到山中的洞穴一直到他们说的那条从西奈通往约旦的走私贩的夜路那里。

我的十二班的毕业生开始散了。有的早些时候应征入伍了，余下的在城里晃来晃去，用父母的车沿着无人的街道飙车。或者成群结伙地在信号灯边上的广场上溜达。有五个人到西奥的办公室咨询他的意见，不是有关他的专业领域而是有关他们到拉美的背包旅游计划。城里流传说西奥独自在丛林中和印第安人生活了十年。有些人背后管他叫阔边帽。尽管本地所有的人都对他保持尊敬的距离。

我们的蓝色老雪弗莱的蓄电池和油泵两天中总有一天是坏的。本·埃拉车库的雅克·本·卢露说，就这样了，该把她处理掉了。西奥眯起左眼，带着一个隐藏在他灰胡子里的饱含怀疑的农民样的笑容，回答道，着什么急？这老丫头身上还有点活力。

有一天早上，一个塔丽或者叫别的什么的来找我给我看她写的几首诗。她不知是该叫我小姐还是诺娅。我很吃惊，因为想像不到她或她的朋友还在写诗。我发现那诗很单薄、无力，我想试着用不伤害人的方式这样告诉她。

接着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让她泄气：让她写吧。没什么坏处。谁知道呢？伊曼纽尔也写过诗吗？她不知道。她不这么认为。不过也许他真的写过——在落入那个教他吸毒的埃拉特瘾君子手里之前，他爱你爱到这儿，所以他可能给你写过诗。跟我？爱情？什么？你从哪得来这样的想法，塔丽？听着，诺娅，首先我不叫塔丽，叫塔尔。第二，尽人皆知。知道？知道什么？他们怎么会知道？她嘴上浮现出一个尴尬的也没准是不相信的笑容：简单得很：他全身都表明这一点。全班都知道。你什么意思，你真的没注意到吗，诺娅？说实话？你没感觉到他的爱？

我说没有。看得出来她不相信我。他走后我想起了公寓的大块水泥隔墙，紧贴着埃拉扎拉姑妈公寓里那间权充他卧室的带有包上了的阳台的窗户。一扇灰色、尘封、压抑的墙。我还记起了那只棕色的杯子。还有他的衣服，那件套头衫，他床脚那张破了的毯子，那条哑狗夜里睡觉的地方，和打开朝下扣着的那本写比亚韦斯托克犹太人末日的书。

几天以后她又来了，害羞但是激动，带来一首新的诗，而且这次答应和我一起在阳台上喝一杯冰可乐吃点葡萄。她上次来找我时从我这儿得到灵感写了这首诗。她希望没有真的打搅我。她觉得很棘手，就是写诗这件事儿，因为她没有什么别人可以展示。但从另一方面说这很奇怪，不是吗，写啊写的却不给任何人看，因为这里没有很多人可以让她展示。就是说，除了我。她希望这不会太沉重。她是班上惟一试着写诗的吗？不知道。我想是的。我们不怎么聊。我是说，我们常聊，但不说这种事儿。不会的。那你们都聊什么？什么都聊。很难说清。说点军队、出国、衣服和钱、流言蜚语，没什么特别的，这啊那的就这些。好比周五晚上，蹦迪之后，我们有时候凑到一块儿聊我们活着为了什么，远东的这些事儿，不过只有我们几个人。大部分人都不这样。男孩子们都热衷于怎样能进入真正的战斗部门，以及什么比什么更酷，尽管他们挺害怕军队的。再就是哪儿的威慑更有效——是占领区还是南黎巴嫩，那类的事儿。然后就是艾滋病。我们现在也开始聊点这个。还有电脑以及摩托车。

我问她毒品的事儿。塔尔说他们很喜欢这个话题，还有我和穆奇·佩莱

格要往这里引进的诊疗所。那会是个真正的纪念碑，那样人们就会记住伊曼纽尔，不像是一根旧柱子上面镶嵌一块名牌。我们真的都喜欢。但家长大都很不安，他们很担心城镇的形象还有房产价值等等这些。我问她，就她知道的而言，学校里是否真有毒品的问题。这个嘛，是这样的。没几个真上瘾的，但礼拜五晚上抽几口的有一两个。是的，她说，她自己试过，一点点，但是目前为止她没能真爽过，因为她马上就会头痛。没有几个真正的瘾君子。至少，她活动的圈子里没几个。也许南边约瑟夫托尔区吸得厉害一些。很难说。伊曼纽尔呢？这个嘛，是这样的，多多少少。最初在再献圣殿节期间有一帮人带头在埃拉特那边转悠的时候出了这件事。那之后他自己又回去过几次，但没人真知道和那个女孩有关的事，玛莎。传言，倒是有的。我不清楚真正发生了什么而且觉得没人真的知道，因为伊曼纽尔太内向了。等他爱上你之后就更糟了。没准有人知道的比我多，但事实是，实际上我不敢肯定有人能真正了解其他人的任何事。全无可能。全世界都不。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岛上。是有好多流言。那倒是真的。也有关于你的传言。还有关于西奥和穆奇的。还有琳达。你肯定听到过。人们讲话。不，我可不想现在就卷进那些。真烦人。你是说你从来没有真的发觉，诺娅？你没看出他爱上你了？一点都没有？别在意。没人清楚别人的任何事。特别是爱。爱情真的是毁灭性的状态，她说。两个陌生人突然看见了对方，也没准没真的看见对方，他们嗅着对方，然后不假时日就比兄妹还更难分难舍。他们开始在一张床上睡，尽管不是一家人。而且通常他们连朋友都算不上，他们甚至相互毫不了解，只是互相上了钩，于是其余的世界就可以隐去。瞧瞧它是多么具有毁灭性，真的。因为爱情死去的人可能比因为毒品死的人还要多。他们该整整这个，也好有点办法治治它。每当她想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知之甚少时，就觉得既想哭又想笑。而怪就怪在这是无法改变的。无论你对一个人投入多少都毫无区别，你可以一百年不分黑白地投入，可以和他睡一张床，那都没用，最终你不会了解他一点点。要是她还有诗，可以再来吗？而且不管怎么说，过几天妮拉就要下她的第一窝小猫了，妮拉是她的猫，她是姜黄色的，自己还像只小猫呢，很有趣，有着伯爵夫人的风度做派，但她

是那样的冷淡，即便所有的人都恳求她，为她兴师动众，仰慕她，也不会有丝毫差异——有着像母虎般美丽的条纹，她是那样可爱、朦胧，有时她甚至是笑着的，高高在上地对着自己咧嘴。想到她父母会处理小猫，她很难过，于是她想也许可以给我们带一只来做礼物？反正你们没孩子，也许你丈夫会同意。

我告诉她西奥不是我丈夫，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结婚。塔尔说，我听到过别人说这件事，没关系，他们说各种的事儿，叽里呱啦，无论如何我想给你一只小猫。好吧，那再见。关于西奥，有些东西我真的想问问你，我不知道，实际上无关紧要。

关于西奥的什么？

没什么。无关紧要。

关于他你想说什么来着？

无关紧要。他是那种很特殊的人。

哪方面特殊，塔尔？

很难讲。有点吓人。

她放下诗走了。

西奥整晚坐在那里修理老打字机，一台四十年的赫尔墨斯，第二次事故之后我在父亲的一个抽屉里找到的。我从未见过他用它。我的姑妈有时用它敲出给报纸的严厉的信件，反对暴力、残酷和食肉。收拾完房子我把它带上了。他坐在那里拆卸并上油然后再把连接键盘敲键杆和按键的细簧装上重新组装了机器，直到午夜将至。他戴着我的眼镜以便看得更清楚些。有一会儿他看起来像早些年代的耐心的犹太钟表匠：他微微上扬的脑袋，透过我的眼镜看起来放大了的他那半闭着的眼睛，灰色胡子下他噘起的嘴唇，他剪成军人样式的灰发，支撑着强有力脖颈的厚厚的双肩，这一切都证实了他献给工作的无限专注。我静静地站在他身后，赤着脚，站了几分钟，被他手指的技巧迷住了。仿佛有小提琴家和文书的灵气蕴于其中。

他修理完打字机后，我给大家冲了草药茶。西奥说他记得我在加拉加斯冲的让男人头脑发昏的了不得的咖啡。了不得？头脑发昏？他指的是我往男

人们的咖啡里加的迷惑他们而让他们无法抗拒我的科涅克白兰地和印第安粉末。还有我用过的治好我俩反复发烧的仙人掌精华。听着，西奥，这个夏天要不然咱们去加利利。为什么是加利利？斯堪的纳维亚。咱们可以租一辆红色敞篷跑车绕着峡湾开。要不买辆新车？或者养只小猫？

他摘下眼镜，垂下头仿佛要撞什么，然后缓缓地搔了搔脖子。他歪着头斜眼看着我，仿佛他成功解读了一个危险的阴谋。经过一阵冥想的静默，他宣布脑子里有一个购物计划单。首先，放在我卧室房角的一张小书桌。第二，一台高亮度的阅读灯。第三，买一个文字处理机取代这台很快又会坏的超期服役的旧打字机残骸如何？尽管其实这老丫头身上还有些活力。顺便问一句，你昨天去见贝尼兹利的时候他说什么了？和上回一样？还是他要帮你的忙了？抱歉。问题撤回。

我从后面拥抱了他，享受着他肩膀在我胸口的热度和他后颈立起的汗毛。让你了解一下，我找茬儿般地说，贝尼兹利开始软化了。如果巴特希瓦·迪努尔给他开绿灯，他乐意建议组建一支事实调查小组。如果我是你，西奥说，他的手环抱着我的腰，我会找个妥协方案。我可能采用一个标准主张，一个柔和的启动阶段，第一年有，比如说，七八个病人，不要再多了，把这个地方经营成一个寄宿中心，有很好的围栏，而且，至少在第一阶段，不和社区发生什么联系。那样反对意见就会消失。还有一样：如果我是你，我要坚持让它有坚实的商业基础，一个病人一个月至少要一千块，从小康家庭的孩子开始，而且为了让城里人高兴，我们应该从当地家庭收一两个上瘾的孩子，价格打八折。而且所有这些都要在严格的公众监督下，有经营执照，接着再来一个基金会和市议会之间的法律联合协议。我会在协议里写上在公众利益的前提下，议会保留在年末不再续发执照的权力。还有，我会愿意从一开始就在书面上放弃法律行动的权力，即使执照不被更新。这个主张在我看来是惟一能打开局面的机会。比如说，赢得一个桥头堡。如果我是你，处在你的位置，我就会这样起草计划。而且即便这样也还是很危险。

但是西奥，你没处在我的位置，我说。

西奥说：对。不。

对还是不?

我是说对，诺娅，我不在你的位置。

今天一个女孩对我说她觉得没人能了解别人的什么。

了解。了解是什么意思?

水还在沸腾。再来点茶吧。了解意味着脱离自己。至少尝试着。时不时的。

你还记得有一次，在加拉加斯，你说一对没有孩子的教师会将所有时间用于纠正对方。然后你说不会容易但不会无聊。你是那么说的，诺娅。即便如此，确实有时候我是处在你的位置的，而我也希望你能处在我的位置。

说够了。做爱吧。

什么，在这儿?厨房里?

来吧。就现在。

我关上顶灯，解开他泛着皮革和汗水味道的宽皮带，靠进他毛茸茸的胸膛。我的手指在他身上试着做修打字机时他的手指那样的活动。事后我们摸黑站在外面阳台上，看月光往山丘直至远方地平线上投下的水银色在流淌。我们靠得很近但没有触摸或言语，我们就这样啜着草药茶，听不知名的夜鸟歌唱。

有一次她告诉过我一个她在去帝奉附近的文学教师会议的路上开车捎过的爱尔兰青年旅行者的事。那是一年半以前的一个十二月的阴雨的午后四点钟。因为有雾而且白天很短，她不得不早早打开前灯。她一打开就照到一个长发的人，远看像个女孩，站在路边快被巨大的背包压弯了，用在以色列不常见的姿势挥着手。男青年爬上车后她看见他的靴子里全是水。靴子很大，笨笨的，让她想起楚玛姑妈在家发号施令时以及出去到卡尔迈勒山的山坡采草药时穿的系带靴子。等他坐在她身边把背包放在腿上，她注意到上面缝的一个布条写着："你需要的一切是爱"。年轻人和背包全都湿透了。

他前一天晚上从老家戈尔韦出发整晚搭车穿越了爱尔兰，然后从都柏林飞到伯明翰，两小时前从那儿搭包机到这里。现在他要去找一个叫达夫妮的女孩，她显然是作为志愿者在加利利什么地方的农场工作。他不晓得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农场的名字。达夫妮。她从利物浦来。他们最近在一起待了一晚上。分手时她告诉他她马上要去加利利。从那之后他就没见过她。她热爱羊和开阔的地方。她的梦想是当个牧羊女。他以前从没来过以色列，但他有地图而你可以看到在地图上加利利不是个很大的地域。他可以从一家农场到另一家直到找到她。他不缺时间。事实上，他认为，缺时间就是自我挫败而且与生命的秘密背道而驰。如果他的钱花光了，就试着在哪儿找一份临时工作，有什么干什么，他不在乎，在老家他当木匠的助手，在葡萄牙他架过电话线，在哥本哈根他有一次在一家小夜总会唱爱尔兰西部的民谣。所有好心人到处都能遇到好心。他是这么说的。诺娅突然注意到他病了。看起来他在发烧。不说话时他牙齿直打颤，尽管她打开了暖风。两年前雪弗莱的暖风还

是好的。对不起，她严厉地说，像是在斥责懒学生，但你知道加利利有多少家农场吗？你到底打算从哪里开始这次对你的达夫妮的搜索？他没有回答。他可能都没有听到她的话。刷雨器的摆动也许已将他催眠让他入睡。他离家已经二十四小时了，他也许整夜都没睡，他昨天在爱尔兰淋了个精湿，还没来得及干透又在这里湿透了。在她看来他烧得很高。他的头向前耷拉在背包上面，湿了的金发在脸前拍扑。她再次觉得他看起来像个女孩。

当他们进入克亚特帝奉后她停下车。她摇醒他并且——不知道为什么——告诉他在加利利北部尖端有一座农场叫达夫娜，她在他的地图上指出那个地点。然后让他下车，还有那个看起来像一块潮湿岩石的背包。之后不久她停下车朝后视镜里看，但被开过来的卡车灯光晃着眼，车后面能看到的只是雨中一个没有照明的电话亭。

到会注册之后，她把东西放回房间，已经有两个比她年轻二十岁的老师住进来了，其中一个很漂亮。然后她去参加开幕讲座，题目是是否有女性文学或女性气质的文学，要是有的话，它的特点又是什么。一刻钟以后她突然站起来然后走到外面雨中停着的车那里，发动车子，然后回到丢下那个搭车客的地方去找他，就在克亚特帝奉前面，因为她觉得必须带他去看医生。也许她还想问他缺多少时间就要算是自我挫败以及他说好心人到处都能遇到好心是什么意思。但她到那儿以后没找到那个男孩，只有路边泥地里没有灯的电话亭。

她没有回会议去反而在丁字路口转向北，在渐浓的雾中沿着她不认识的路开去，直到意识到油快没了，然后她拐进迈德埃库鲁姆村附近的一家加油站。加油站关门了，但几个男青年坐在里面亮堂堂的霓虹灯下，显然在总结一天的轶事。看到锁着的门旁她的身影，他们迟疑着相互低语着，然后其中一个站起来打开门，开玩笑似的说他们以为她是强盗，然后给她加了油。他的同伴给了她一杯咖啡然后说，你不是今晚我们的第一个来客，女士，看看我们这儿有个谁吧。办公室的一角，油污的地板上，卷在一张破毯子里全身缩成婴儿状，她看见了那一头乱蓬蓬的金色头发，然后她把他摇醒说，咱们走，给你找个医生。

他跟着她上车，昏昏欲睡的，安静，发着烧，而且见到她一点不吃惊：仿佛他不曾怀疑当晚她肯定会再找到他并带他走。他又坐到了她身边，牙齿打着颤，有爱的标语的背包滑到大腿上，两分钟后他睡着了。她从加油站里把他拽出来时他可能都没醒。他的头靠到了她肩上而他的金发散到她胸前。他的热度透过了她的套头衫弄湿了她的颈窝。在迈德埃库鲁姆的路口她拐向右边，因为她决定回会议中心，叫醒一个医生或者护士，然后早上逐一给农场打电话直到找到他的达夫妮，或者至少找到一个能收留他并给他一个工作的地方。但她迷了路，雾气和水从外边模糊了窗玻璃，而窗子里面由于他们呼的热气起了雾。接近午夜时她路过了马祖洼农场，看到一块亮光的牌子写着几英里外有旅店。她决定剩下的夜晚得找个房间。拐了几个弯发动机熄火了。她把车停在被风吹动的参天桉树下的临时停车场，坐着等待早晨。他的头这会儿已枕在她腿上。她从后座上拿出毯子盖到他和自己身上，这样他就不至于冻死了。然后她也睡着了。当她被清晨灰蒙蒙的天光弄醒时她发觉雨已停了而搭车客和他的背包消失了。一时间她担心了一下自己的手袋，里面装着她的论文、钥匙和现金，但是找了一下就发现它在她的座椅和门之间的空档里。六点半时来了一辆巡警的车。一个中年的阿拉伯人警察冲她闪了闪金牙，教训她说她太冒险了，然后想法让发动机打着了火。八点，回到会议中心，她给我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她的这件事，要我试着找到她生病的过客。也许农场志愿者登记里有个和羊在一起干活的、从利物浦来的叫达夫妮的姑娘？或者没准内政部会有昨天入境以色列的戈尔韦来的年轻爱尔兰男子的记录？

我觉得希望渺茫，但电话中她声音里的什么东西让我答应试一试。我整个早晨都花在四处打电话上，我甚至找到几个二十多年来未曾联络的位居高位的熟人，以她的名义给他们打了电话，但当然是无济于事的。电话那头我得到的反应只是伪装成客气的讶异的迷惑和不解。她当晚回了家，放弃了会议，让我在厨房里吃了一惊，邋遢、发热、颤抖，她抓住我，把头埋进我的肩膀哭了起来。我把她冻僵了的、血管突出的、老女人的手握在我的手掌里试着让它们暖和起来。然后放了热水，脱下她的衣服把它们直接扔进洗衣

筐，给她打肥皂然后冲水，用厚浴巾把她擦干然后给她裹上一件暖和的睡袍。我几乎是抱她上床的。我冲了一壶茶并给她倒了一杯，剩下装进她床边的保温瓶。然后叫了医生。诺娅睡了十六个小时。她醒来后空洞地盯着我看了十分钟，看起来既疏远又无望。我给她喝加了蜜和柠檬的草药茶。她只抿了一小口，然后突然对我爆发了一阵怒火，带着以往从未见她有过的——除了可能有几次她为了逗我高兴学她爸爸怒火发作时的那种——尖利的怨恨，就因为我往里加了一勺医生开的而她坚决拒服的咳嗽糖浆。她提高嗓音满含痛苦地叫道我又要把她当小孩照顾，说我是她生命中的沉重，压迫她令她绝望让她未老先衰，这个公寓就是个牢笼，特尔科达就是个流放地，而我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孤单单的像条老狗也都不会奇怪，而也许那正是我想要的。

第二天早晨时她觉得好多了。她的烧下来了，关节也不那么疼了。她要我原谅她。她道了歉。她坐在镜子前化妆，比往常更精心，仍面对着镜子背冲着我，告诉我她失去了的爱尔兰搭车客。然后她穿上一套很适合她的绿套装去学校了，以免耽误一次考试。我试图阻止她，因为大夫让她多休息几天，但仔细想了一下我决定什么也不说。尽管如此，她站在走廊中时我忍不住说，耳语般地，也许你应该留下来。她看了我一会儿，感到有趣，然后突然说，不带怒气地，别担心，我会回到你身边的。你照顾我照顾得很好。

自从一年半前的那个十二月的早晨以后她没再提起过她的搭车客。我也没提过他。身体恢复一周以后的一天，她给我办公室打电话要我晚点回家，七点而非五点。我七点一刻回到家发现她给我们做了一顿精美的三道菜的晚餐，还有闪亮的红酒和甜食。但我还是得把车做大修。本·埃拉车库的雅克·本·卢露说，瞧这儿，她可是到过战场了，有人开着她开过石头和岩石块然后又陷进泥地里，那以后她又被拭了一下，这儿，这儿也是，因为拖她的方法不对。不关我的事儿，西奥，但你可以听听我的意见，就是不论实际状况是什么，都不乐观。

清晨一两点钟，我独自在阳台上面对宁静的平原，有时设想她那个孤单的旅行者还在加利利的空山里游荡。在羊圈里找他的达夫妮，或者他也许已经放弃寻找但仍然沿着荒废了的道路继续游历，缓缓地，漫无目的地。所有

好心人到处都能遇到好心。我至今对此还都丝毫不能理解，但我越来越喜欢这些单词的乐符。而现在他睡着了，呼吸浅而平稳，他看起来像个漂亮姑娘，头枕在沉甸甸的背包上，金色的头发见所未见地像面纱一般垂在脸前，夜光下独自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在有鸟、有树、有泉水的偏远而可爱的山谷里。也许躺在那里的不是从爱尔兰来的木工学徒而是我，在树下，在和风中睡觉，在除了鸟儿树木和泉水之外别无他物的山谷宁静的阴影中，我又为什么会想要醒来呢？

早晨他去办公室后我回到厨房继续读《陷阱中的青年》，写下我打算要继续探究的各种细节。在特拉维夫区域有三家公立的戒毒中心：一家在哈提克瓦区，另一家在雅法，第三家在奈瓦埃来泽。三个都不是真正的寄宿中心。大麻和鸦片主要从黎巴嫩走私过来。最近吸食可拉克——一种高纯度的可卡因——变得广泛流行起来。在市场上最常见的强效毒品是波斯可卡因。大部分吸食者早上来一剂晚上再来一剂，它的优点是效力能持续几小时而吸食它上瘾的人在这作用下能够继续像常人一样活动。至少在一定程度内。至于戒毒，有的在监狱里戒的，而有的人则实际上是在监狱服刑时首次接触了毒品。让戒毒者在治疗中有其他戒毒成功的人陪伴，以及让他与惯常的环境隔离的尝试好坏参半。治疗最激烈的阶段是“停服期”，大约平均会持续十天左右，但也可能只要一周而有时候会拖延三个星期甚至更久。痛苦通常在第二或第三天达到顶峰，症状有疼痛、恶心想吐、痉挛和抑郁或攻击性的发作。在极端的案例中可能会有自杀。安眠药和止痛药和强力按摩能够减缓，但并不能消除停服期的症状。建议停服期这段时间待在家里，有持续的监护，有家庭成员和一个专家小组以及成功戒毒的以往上瘾者互助小组的参与。条件是这个家庭要有支持的氛围而且没有使病情恶化的因素，在这种案例里最好要彻底没有使病情恶化的因素。停服期之后是一段为期六个月至一年的脱毒期。在这个阶段，建议用频繁的尿检方式跟踪病人的进展，尽管有带他人的尿液标本欺骗化验的可能。尽量不要监禁开始吸食毒品的青年而是将他们置于监察官的监督下，并且迫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投身于定制的戒毒治疗。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读到严重的上瘾者是那种仅仅生活在情感层

面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情感伤害都可能会令其重拾旧习。我觉得“重拾旧习”这种说法不恰当而且甚至很唐突，而“情感层面”让我觉得是十分无礼的表达。

我明天是否该去埃拉特？

我是否该找那个叫玛莎的女孩？

我要不要调查？比对证言？

那个父亲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去埃拉特？还是他去了而没告诉我？他又为什么非要告诉我呢？

他的姑姑知道些什么？那是什么时候？

他在医务室找什么？他为什么溜进那里？我又为什么在他犹豫的问我有没有可写的东西时僵住？他真的眨眼了吗，还是仅仅是因为阿弗拉翰的故事我现在才这样想像的？

你可以把你的一切能源投入一百年。最终你一无所知。

与其试图解读真相的秘密还不如做该做的事。还不如，像那个警察一样，以一种冷静的同情尽力工作：精确和坚持，像在一天劳累后刚要开出医院停车场回家，然而看到很多死伤者被送进医院后又自愿加班的疲倦的、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那样。他转过身，停下车，默默地再次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回到手术台。

七月底，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来了，一个人，这次阿贝尔没有同行，一个精瘦、渐衰、肩膀单薄的男人，穿着米色牛仔裤和皱巴巴的丛林茄克。他用安静而忧伤的声调向西奥保证在两周内汇给他两万元以还借款，而剩下的也会很快。西奥说，着什么急？然后他们两人开始聊以前独立战争时的一些失误和错处。阿弗拉翰几乎没和我讲话，只是谢谢我给他的咖啡；也许是因为西奥一时不肯放开他。我出去上小卖部，回来后发现他们对依戈尔·阿隆和另一个外号叫沙给的著名军事家纳哈姆·萨里格作的某项决策意见一致。结果发现他俩都跟他很熟而且都反对过他的战术，而我从未听说过他，但当他们主动要向我解释这位传奇将军有什么特别的伟大之处以及他的战术在哪方面出了问题时，我说，谢谢，但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而且，我也不知

道背景。事实上我觉得是挺愉快的，甚至是享受的，就这样坐在他俩中间，听他们低声交谈，好像两个同谋者在酝酿一个秘密阴谋，仿佛独立战争还在内盖夫沙漠的某处地下进行着，而且失败和失去的机会和备用方案只能间接的商谈，用密语。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提到一个被强化了的高地比尔拉斯鲁戈，西奥不同意并说，我觉得你弄错了，在我记忆中那还要再往南去一点，挨着卡戴什巴奈阿。阿弗拉翰沉思着说，尽管如此，取道古罗马道向侧翼运动还是皮尼·芬克尔的功劳。然后西奥说，允许我持反对意见，我觉得你应得那份功劳，阿弗拉翰。皮尼·芬克尔不值一提，败落的时候他因为自己的浅薄被杀。顺便说一句，他有个儿子叫尼莫罗德，我扶植他长大，他还是穷小子的时候跟我一起住了两年，我给了他一份工作，提拔他，结果就是他把我踢出了发展机关，他没亲自那样做，但他是幕后的黑手。不要紧。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他从未告诉过我。我从未问过他。

我给他们又倒了点咖啡然后让他们单独待着。我决定离开去取一双送修的凉鞋。

我上午十一点在我的公寓召开了委员会会议。西奥准备了一盘盘的水果、一杯杯冷饮、胡桃和杏仁、切成薄片的全麦面包和精选奶酪放在木餐板上，然后把它们在茶几上摆好。路德米尔早到了二十五分钟，穿着卡其布短裤和踢里趿拉的凉鞋，说了他惯常的那句口号，没有火哪有烟，他一个人消灭了全部胡桃和大部分杏仁。埃塞俄比亚移民，他宣称，在这儿被像粪便一样对待，俄国人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无论如何，入境机构的人应该在墙边被排成排枪决，而采石场应该被炸掉，在我们被它的灰尘毒死之前。穆奇·佩莱格迟到了一刻钟，他看起来又像那个白兰地广告上的青年哲学家了，一头乱飞的头发，还有脖子上艺术风格的丝巾；他说了几个笑话，为去参加组织的约旦谷旅游的琳达道歉，跟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调笑了一会儿刚果的姑娘们，什么来着，尼日利亚，没什么差别，然后说，来吧，西奥，开会说说这事。

西奥说：

允许我简述一下我们可以预期的困难。首先，巴特希瓦能随自己的意愿在市议会拖延讨论。她可以在日程上不重视它。她能在政府部门和我们对着干，阻止我们得到许可。她可以让这个问题被讨论，但以各种正式和技术方面的问题无限期地将其搁置。第二，公众已经揭竿而起了。建立诊疗所会降低地产的价值，会导致犯罪和喧闹等妨碍生活的举动，会令当地青年接触可疑的因素。人们称他们在特尔科达投资买房是为了要过平静的生活，而诊疗所，连带夜晚的救护车，巡警的车子，暴力事件，瘾君子清醒后犯罪因素的上涨，将破坏他们的和平与安宁。无论如何，你不会为了一把钱就将一个几乎没有犯罪的城市变成疯子窝或者大城市背后的废物堆。这儿谁需要瘾君子？毒贩子？课间时绕着学校转悠的皮条客？十五岁的吸毒妓女？入室抢劫、偷车还有为得到点小钱抢老人的小瘾君子？还有花园里的脏针头，没准沾有艾滋病病毒？他们已经开始挨家串户准备在特尔科达征询签名以便请愿——治疗是怎么回事，一旦上了瘾总是个瘾君子，肯定后边有人打算藉此捞上一笔，而且为什么非得在这儿呢，往我们这儿堆满别处都没这么大数量的新移民还不够吗？他们就快从占领区送巴勒斯坦反以运动的孩子、丢燃烧瓶的人来这儿康复治疗了。反对意见越多，巴特希瓦就会有更多的辩论日，分别处理每个不同的反对意见，进程将拖上好几年，而这还都是在居民没有联合起来采取法律行动之前。除去这个不提，市议会依法可以仅仅凭现存的市政发展主要纲领彻底拒绝同意改变功用。将死。而这只是地方级别的。但还有其他级别：福利部，内政，健康，教育，警方，实际上是半个政府。而我们还没开始谈运作费用呢。要我继续吗？

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偷偷给了我一个他那冬季阳光似的笑容，忧郁地说：那怎么办？我们该罢手吗？就弄个里边有羽翼的纪念公园？

西奥说：妥协。

然后路德米尔：妥协。妥协臭气熏天。

之后穆奇·佩莱格向委员会报告原来属于那个姑姑、埃拉扎拉·奥维埃托的公寓的出售情况，那里从现在开始将是牙科医院。即将到账的卖房钱款，经奥维埃托先生的首肯，将直接进入基金会账号，一旦爱将偏见的藩篱

打破，就像拉比对修女说的，便可以用于整修阿尔哈里奇老屋。

我没说话。

于是就定下来下周西奥将与阿弗拉翰·奥维埃托一起去耶路撒冷，去确保四十年前曾和西奥在一个战争工程队服役、而且从阿弗拉翰在巴黎当军事随员时就和他相熟的部长的支持。甚至还决定将要会晤贝尔谢巴大学的高层和反毒品运动的首领。而且必须要改变委员会的成员状况。很必要把有影响力和社会关系多的居民、教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受尊敬的本地人士，甚至一两个思想进步或者孩子受此问题影响的家长还有当地报纸主编，甚至或许一两个艺术家的代表囊括进来。

看来，路德米尔面无表情地说，我是多余的。

穆奇·佩莱格加上一句：就像丈夫吃惊地发现躺在邻居臂膀里的妻子时说的一样。你们会留下琳达吗，至少？那样她还能继续打字？

会后，路德米尔和穆奇走后，穆奇踩着他天蓝的鞋子冲在前面按电梯而路德米尔踱着骆驼步跟在后面。西奥说：我离开你们一刻钟，下去上帕勒莫给咱们买一张比萨饼。这样可以省下做午饭的时间。我回来咱们吃了以后就下去把阿弗拉翰介绍给这里。

吃完比萨我们给来者介绍了特尔科达，因为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想要能“抓一些这里的感觉”。喘着粗气的雪弗莱启动时又出了问题，尽管最近修了两次。路上西奥主动承担起解释本城建造时依据的错误计划，一个自开始时就注定了命运的方案。也许是这些话让阿弗拉翰转向我又发出一个秘密的、转瞬即逝的笑容，好像让我瞥一眼一间明快、舒适、百叶窗很快就关上了的房间。一个虚弱的、身材瘦小的男子，有着渐疏的白发，他的脸由于非洲的太阳变得布满沟壑和皱纹：像一个现在将时间分割为读和想的、业已退休了的老金属镶板匠。他说得很少，用一种温和的灰色声调，带一股埋没自己般的犹豫，仿佛他觉得说话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吵闹的东西。“我们该在何处闪光，何人渴望我们的光亮？”我在后座上默默地问他。

我们缓缓驶过公寓住宅区和私人住宅区，驶过被沙漠微风拨动的棕榈树，稀疏的草坪。黄蝴蝶属植物的小苗还有生机，因为受着喷下的水的无限

关照。

真美，令人激动，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说，一个全新的市镇，没有圣经或阿拉伯传统，建得以人为本，而且你见不着贫穷的区域和被忽视的迹象。

我们想当然也许是错的。

西奥说：建得恰如其分并不一定是赞扬。

阿弗拉翰：不一定。但它是的。

信号灯旁边的广场上，我们在阵亡纪念碑前站了几分钟，上面用金属字刻着那些话，“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　杀”。倒数第二个字还是没有。二十一位阵亡者，同一种字体，只是型号小一些，从阿弗拉罗·约瑟夫到舒民·齐奥拉·乔治。老卡什纳驼着背坐在他那间小安乐窝外边走廊里的一把凳子上，读一本厚书。皮尼·波佐在他鞋店的橱窗里放了他的漆制约柜模型。在约柜里，路过的人可以看到，他死去妻子举起逝去婴儿的彩照，她的额头触碰着婴儿的额头，牙齿闪亮地冲他笑着，而婴儿用没有牙齿的嘴还以微笑。

然后我们到西奥在市政厅左边大楼顶层的办公室，“规划”，喝咖啡。墙上挂着各式地图，景观，一张是放大的本－古里安坚定地盯视一片荒芜的峡古广漠。西奥给他的访客展示了一些他设想的沙漠条件下重视环境的发展规划、方案，还有街道、广场、穹顶建筑的草图，它们经过精心设计而相互连接以投下阴影和遮住耀眼的阳光，形成像庇荫的峡古一般的曲折廊道。很明显尽管来客说的很少，他的存在本身点燃了西奥的某种惊人的活跃。第二杯咖啡之后西奥甚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蓝色文件夹，从中取出三套不同的阿尔哈里奇老屋改造方案。阿弗拉翰·奥维埃托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连他提出简单的同谋者的问题，并得到同样简洁的回答时，都没把眼睛从上面挪开。我没听见问题是什么，也漏掉了回答。

我走开来到窗边。看见兼卖彩票的衰败下去的台球厅上方一只断了的风筝缠在高压线上，在风中前后摇摆。药剂师沙兹伯格的那个新近死掉的老家伙，一直被称为伊利亚，因为他的习惯是礼貌地询问每一个人伊利亚什么时候来。从死亡公告里我得知他的真名不是伊利亚而是古斯塔夫·马尔莫莱

克。我突然想起贝尔谢巴的贝尼兹利说的话："毫无意义"。我决定待在那儿看窗外，才好不挡道。西奥和来客似乎开始建立一种我没份参与的亲近和惺惺相惜的纽带。我注意到西奥两次得到了百叶窗中壁炉的火焰般的笑容。我希望自己身在别处，比如在拉各斯。

和巴特希瓦·迪努尔的会晤中，发现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曾经指挥过她丈夫参与战斗并在 1967 年的耶路撒冷战役中被消灭的后备小队。阿弗拉翰没有忘记他，迪迪，那个高个子留胡子的男生，他们待命时他总在小弄里的柏油路上大步走，像读惊险小说一样读音乐总谱。

谈话结束时巴特希瓦让西奥写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我特别需要知道，她说，你们的围栏将会有多牢靠。还有事实上，如果真是一个封闭机构，对广大社区来说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职员又怎么样：是当地人还是外来的？要是外来的，是不是在合同上要求他们住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一天结束时他们就上车，留下个值班的人然后就列队被护送重归文明？还有，奥维埃托先生，阿弗拉翰，打算对这个项目投多少钱，以及，如果有的话，他会贡献多少钱到运营费用中来？如果你不能提供一份令人信服的五年细目单，那你们也就不必再麻烦回到这儿来了。让咱们说清楚，在刚才的话中我除了下次你们来看我时会得到的一杯清水和一块饼干——如果你们来的话——之外没有许诺任何东西。而且顺便一提，一个纪念，一项慈善，我理解也很支持，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国家就是某种纪念，而且我明白在这个项目里纪念必须是和青年有关的，没有青年我们就没有未来，尽管没有未来何谈青年。但为什么不，比如，弄个体育馆？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游泳池？教育系统微机化？一个手工和兴趣中心？新实验室？前卫剧场？诺娅，你说说。让他们面对现实。无论如何，你对西奥有点影响力，而且我要是没错的话，她对你也有点影响力，奥维埃托先生，阿弗拉翰，我说的对吗？啊？

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说他想做的是挽救年轻的生命。他说他儿子伊曼纽尔爱特尔科达，而他自己现在开始明白这种爱的个人原因了。他还说伊曼纽尔曾经喜欢诺娅，而他自己现在开始喜欢诺娅和西奥了。

下午将尽时，西奥开车带来客去看那座空屋了。

我头疼起来，我说，我待在家里。

十分钟以后我的头真的开始疼起来。

我吃了两片阿司匹林，去公共图书馆开了空调的阅览室坐下，那里空荡荡的。我找到一本讲拉各斯的殖民统治历史的英文书，读了几小时，然后开始读大猩猩，直到有人走来轻触我的肩膀并说，诺娅，抱歉，闭馆时间到了。回家以后，我得知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已经离开，前往特拉维夫去了，他托西奥转达他的感谢和祝愿。西奥自己坐在一张白色扶手椅里，和往常一样，耐心地等待我回家，静静地但并不宽厚地、并不屈从地等待着。他赤着的脚跷在茶几上，汗衫透出肩膀的强壮，他的泛着皮子味道的宽皮带被男性的汗水浸湿，但这次他没有坐在黑暗中，他开了灯好读一本从我床头柜上拿的关于成瘾的书，《陷阱中的青年》。我进门后他摘下他戴着的我的眼镜，问我觉得怎么样了，我的头疼好点了吗？

好极了，我回答道。

凌晨一点差五分。电梯的嘎嘎声透过墙壁；它没有停，借助呻吟的绳缆继续往楼上去了。诺娅在她床上，她洗了头发，穿了一件白T恤，戴着眼镜，床头灯给她头上套了个光环，她在专注地读一本书，《花朵一代的沉浮》。西奥在他房间里躺下听伦敦来的关于宇宙扩张的广播。阳台门开着。从东边空山处来的一股干风慢慢地扰弄着窗帘。没有月亮。星光冷而利。城里街上早就空荡荡寂静无声了，但广场上的交通信号没有停止节奏性的颜色变换，红黄绿。瞎子路波独自在电话交换室里，值夜班，听着蟋蟀的尖叫。他的狗在他脚边打盹儿，但时不时地竖起耳朵，然后一阵紧张的痉挛在它的皮毛上荡漾。伊利亚什么时候来？常问这个问题的男人死了，现在他可能知道答案了。瞎子在听觉的尽头倾听夜的声响，因为他觉得在多层的寂静背后，在蟋蟀刺耳的叫声下面搅动着死人的号叫，微弱而悲伤，像雾在雾中移动。还不适应微弱单纯声音的新亡人的哭泣，就如被丢在野外的弃婴的哭泣。死得久一些的人的抽噎是女人般持续、悲叹的哭泣，像是黑暗中被一条冬季的毯子弱化了。而那些古时的早被遗忘了的死者，饿死在这些山上的贝督因妇女、游牧民、古代的牧羊人，从更深处传来比寂静还寂静得多的孤独空洞的号叫：是他们回来的渴望在回荡。在这之下是悠长而单调的死骆驼的呻吟、亚伯拉罕时代被屠杀的公羊的哀号、古代营火的灰烬、大约千万年前某个春天里还一度繁茂于干涸河床中的石化了的树的沙沙声，还有它在高原的黑暗中仍旧低语不断的渴望。

路波站了起来，绊在了狗身上，道歉，摸索着关上交换室的一扇窗。诺娅关上了灯。西奥，赤着脚，去察看门是否锁了，然后回来检查冰箱。他想

要什么？他还是不知道。也许只是洒在食品上淡淡的光，或是里面冷的感觉。他放弃了，然后回到卧室。忘记了关掉收音机，他出去面对空山坐一会儿。

会议之后西奥出去上帕勒莫卖比萨饼，不做午饭，可以省时间。他想能带我们这位客人参观一下特尔科达，也想带他去看看阿尔哈里奇老屋。

门在他身后关上之后，我说：对于 1948 年内盖夫沙漠的战斗我没什么可以提供争论的东西。你赢得了那场以及所有的战斗，以少对多，不管有没有皮尼·芬克尔的侧翼移动，或者其他人的什么。所以现在我要给你联络信函、收据和账目，这样你就知道我们用你坚持每月寄来的钱干了什么。

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说没有这个必要。首先，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投资都来自西奥。他下一周就还他。兑现现金出了点问题。而且无论如何，越来越清楚的是还有更多困难在前面，并且可以说买房子还是有点为时过早了。

但我没有放弃。我得给他看我拢在一起的账本和收据，它们还没有全部整理清楚，还要给他看纸头工作和来往信函。他是给我带来这项使命的人，所以他是我要向他汇报的人。我这就去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拿来。还是要不然，我拉着他的手，去我的屋里，纸头工作都在那儿，而且那儿比较凉快，因为我早上没有打开百叶窗。

我屋里惟一的一把椅子被昨晚西奥给我脱下来的衣服和内衣占据了。我让阿弗拉翰坐在我床上，让自己立在床和床头柜中间，想用身体挡住椅子上的东西；我戴上眼镜把文件一张一张递给他。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扫视了每一份文件，他热情的脸露出同情、好奇还有大约是轻微的惊讶。过了一会儿我还是在他身边坐到床上，因为那样站着很怪，在这间透进来被百叶窗格折曲柔化的午后光线的房间里，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几乎罩住了他苦行僧般的

身体。我一坐下就觉得和男孩的父亲膝盖对着膝盖坐在我和西奥昨晚做爱——注重了每个音符，温柔地把对方抱回来——的这张床上更加怪异。

我说，好像是在对一个不专心的学生讲话似的：你在核对那些文件吗，阿弗拉翰？还是仅在浏览？你走神了吧？

你瞧，他说，你是他惟一喜欢的老师，而他可能有点文学天分。你要是想听的话我给你讲个故事。去年冬天，十二月的时候，在他第一次去过埃拉特之后，我来这里待了两天半。我住在科达饭店。最后一个晚上日落后他来饭店找我散步。每次我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走上一两个小时，尽管我们不怎么交谈。他穿着暖和的灯心绒裤子和一件棕色的皮茄克，是我来的路上在罗马机场给他买的一件时髦的飞行员夹克衫。我也穿着外套。我们肩并肩走着，因为我们差不多高。那是个寒冷的晚上，从山那边刮来很强的风。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绕过了高尚住宅区，穿过医疗所后面无人注意的小公园，从正面被隐置在灌木中的射灯照得通亮的创立者大厦那里穿了出来。突然开始落雨了。你不舒服，诺娅。你往后靠在枕头上好不好？对，就这样。冬日夜晚沙漠中的雨，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让人觉得难过。比在非沙漠地区正常季节的降雨还厉害：它像是一个故意的侮辱似的让人苦恼。是九点半，街上早没人了，而它们是那么宽所以看起来更显得荒凉。借着街灯的光亮，我们能看见风是如何斜抽着雨水，每一滴都如针头般刺下，大地散发出湿润的灰尘的味道。四处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看起来像个鬼城。有两三个人影，可能是贝督因人，头上套着购物袋挡雨，跑过广场。消失了。伊曼纽尔和我在巴黎电影院售票处的波纹锡铁遮雨棚下面躲雨。遮雨棚在风中急雨的攻击下呻吟。然后我们看到远处的闪电，把东边荒山的山坡照得雪亮。斜雨越下越大变成了大雷雨。广场仿佛在我们眼前变成了雾中的黑河，建筑也似乎从我们身边漂走。洪流的怒吼从干涸河床那边传到我们这里，不过再想想也没准只是头顶上的锡铁遮雨棚在抖动。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场大雨搅乱了我对沙漠的认识。当我这样对伊曼纽尔说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扭曲的笑，不过在紧闭的售票处微弱的灯发出的那种无处可去的潮湿的黄色灯光下也很难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自那以后沾上了毒品，也不知道他那时陷得有多深。这

些我是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有一次你对我说他的话少而精，你说对了，他总是那样，在雨中喀喀作响的遮雨棚下寒冷的铁栏里，他就是那样站在我身边。穿着那件我给他选的男性化的有拉链、口袋和金属扣的飞行员夹克衫，他不像一个硬汉飞行员而像一个被人搭救得以不淹死、然后被套上了救命恩人的外套的衰弱的小难民。他站在那儿，看起来衰弱而没有活力，当他朝后靠向电影院紧急出口时，门突然在他的压力下洞开了。可以想像他们那天晚上忘了上锁。雨更大了，于是我们进到空荡荡的大厅里躲雨，除了两边锁着的门上的“出口”字样下紧急灯的微微闪亮光之外，那里很黑。在里面，雨声听起来很沉闷，仿佛在很远的地方，而雷声则像是在水下。我们在那儿，我儿子和我，挨着坐着，就像现在我和你这样，在后面的一排。而且我们意识到我们湿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觉到他靠着我的膝盖的热度，我突然有一阵强烈的渴望，仿佛他不在那儿，在我身边，而是，该怎么说呢，在黑山彼端。这是以往的一个成语，尽管实际上在雨夜里所有的山都是黑的。我对他说，伊曼纽尔，听着，现在我们既然坐在这儿，干吗不试着聊聊天呢。他咧了咧嘴。问聊什么。聊你的学业？你母亲？或者也许我们该谈谈未来？他头部做了一个轻微的、不坚决的动作。于是，我又问了两三个问题，他只说些短语或是咕哝一声。你能明白吗，诺娅？我在那儿，一个冬夜里单独和我儿子在一个寒冷无人的大厅里，肩挨着肩，或更精确地说是衣服互相挨着。却什么话也没说，没有词语的接触，一点没有。而我属于能言善辩的一代，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尽管在非洲的这些年里除去能解决问题的言语之外我忘了该说些什么话。突然他对我眨了眨眼，像他小时候一贯的那样，深吸了一口气，好像在说等一等，他从一个口袋里拿出一套磁铁跳棋，我有一次在哪里的机场给他买的微型跳棋。我们在那微暗的亮光下玩了三盘，几乎无声地一盘接一盘地下，在猛落的雨声里。三盘我都赢了。现在跟你说，我认为这是个错误。我不应该赢下所有那三盘。这些胜利有何益处？另一方面，我若是撒谎欺骗让他赢了又何济于事呢？你怎么想，诺娅？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敏感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是不是让他赢了会更好？

我没有回答阿弗拉翰的问题，而是把手臂环到他的肩膀上。我立刻又缩

了回来，因为他把疲惫的蓝眼睛转向我并盯住我，给了我一个明朗的温暖小屋的笑容，一个在那迷人的皱纹里燃烧起来但立刻熄灭的笑容，像是打开了的窗帘但马上又拉上了。然后，他说，粗糙的手在身前移动像是在把什么不愿意被塑造的东西捏成一个球，雨渐渐停了，然后我儿子站起来和我一起一路走回科达饭店。第二天早上我飞回拉各斯。我想过再给他写一封信。但是西奥到门口了。咱们回起居室吃他带回来的比萨饼吧，然后咱们出去看他想带咱们看的，尽管我怀疑最终判定时他们是否会让咱们在这儿建一个诊疗所。我发觉很难相信他们会同意，而实际上就算我们放弃，转而用其他什么好主意纪念他的话，真的就那么可怕吗？我很抱歉让你难过了，诺娅。我要是没说的话可能会更好；是你告诉我我的儿子把词语叫做陷阱，而我们毫不在意。遗憾。

修整围墙要花去我六千谢克尔。而加上那个门很值得，就可以挡住晚上在周围游荡的人。我仍然不认为这里会办起一个戒毒中心，但我还是不遗余力地试图寻求一个妥协。我要追求什么？我不知道。巴特希瓦·迪努尔打来两个电话询问我向她承诺的那份详情报告何在。晚上我坐着读诺娅散放在四处的册子和书，它们打开朝下搁着，在厨房桌上，走廊里，沙发上，阳台上的扶手椅里，厕所里。我已经了解一二，但问题的核心仍旧不明。与此同时我必须保护房产不被怠慢，还要注意显然晚上在那里过夜的可疑之辈。我已经开始喜欢这座废弃的建筑了，每天都拿着铅笔和素描本在那里待上半小时左右。标注可行之举：北窗既可以在这儿也可以在那儿，可以开成现在的三倍大。在楼中央，大厅里，除掉石膏天顶的话，从地板到屋顶的距离可以达到二十英尺，而这样就可以，比如说，做一个有螺旋楼梯和木制扶手的平台般的陈列室。

我对诺娅说：再给我几天时间。

她不久以前还求我，别把一切从我这儿夺走，西奥，但现在她已不再干涉。仿佛她已失去兴趣。当我提议让她和我一起去耶路撒冷时她说，我有点发烧，而且我的头……你自己去搞定一切吧。我晚上回到家向她解说我办成的事儿的时候她说：省去细节，西奥，我对那些你曾是他们眼中光华时代里还记得你的人或者突击队在独立战争中的失误真的不感兴趣。现在看来有了至少一线希望，而她已失掉了那似乎总是从生命内核直接迸发出来的活泼的快乐。她那仿佛给世界打分似的宣布我的见解是冷是热、是好是坏、或者言不由衷、或者深藏不露时眼中常有的闪烁消失了。替换那种兴奋的火花的，

是一种以往我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心不在焉：她一早离开家，中午回来，站在打开的冰箱前抓点东西吃掉，留下杯盘让我洗，然后又走了。在学校放暑假、所有职员全跑去参加充电课程和会议的此时，她能去哪儿呢？我小心地不去询问。或是正相反：她整个上午坐着看电视里的儿童节目，然后晚上消失直到十一点。我甚至可以怀疑她终于给自己找了个情人，但正是这些夜晚里她来到我的卧室，满身甜甜的金银花香，赤着脚一声不吭地、穿着让她看起来像宗教寄宿学校女孩似的保守睡衣向我飘来。我站起来吻她发际线下的棕色胎记。我全身绷紧倾听她，像是医生在问诊，又好像她是我正受某种不幸折磨的女儿。我抓住她先衰的手，全身充满了不由欲望组成而源自温柔爱意的愿望。我罩住她的乳房，手指顺着抚弄着那前面，像是治疗者温和地找寻痛处。爱过之后，她立即入睡，头放在我的肩窝里，睡得像个宝宝，而我则半夜都清醒地躺着，小心地伺候，均匀地呼吸以免打搅她。尽管她睡得很沉。

有时我见她和一个黑头发叫塔丽或者塔尔的姑娘坐在厨房里，或是在阳台上，甚或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那显然是她的学生或者以前的学生。她是个苗条的身材很好的女孩，穿着那条打着补丁褪了色的牛仔裤看起来像个小红印第安人。要是我，就会给她穿一件火红的衬衫。从远处看她们像是沉浸在热烈的交谈中，但我一接近，她们就停止了谈话仿佛在等着我离开让她们独处。但实际上我不想走掉离开她们。我觉得那个塔丽身上有点什么魅力，也许正是因为她显得有些怕我，缩到椅子边上，机敏地上下打量我，像个受了惊吓的动物。这一点有让我坚决要加入她们中去的效果。她们的谈话立刻枯竭了。一种不情愿的沉寂降临。一通简短的问话引出塔丽十一月将要被征去服兵役的信息。她还要面对大学入学的数学考试，那个他妈的古丝塔·路德米尔在给她当私人辅导，但是太吃力了，对数，她是一百万年也通不过考试的。我还发现她是“沙漠时尚”的葆拉·奥莱芙的女儿，我最近就是在那儿差点给诺娅买了一条土气的裙子。她为什么来这儿？没什么特别理由。对占领区的情形她有什么看法？或是关于以色列的未来？或是特尔科达的生活？还有自由放任？还有广义上的生活？她的回答很单薄，显得对

此并不关心。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除了她的猫下了小猫而她想给我们一只。再给你来一杯冷饮？不，谢谢，我们刚喝了一杯。来点葡萄？不，谢谢。那么我想你们是想让我离开让你们单独待着？你把钥匙忘在桌上了。拿上你的文件。再见。

但我不着急离开她们。正相反。着什么急呢？我坐回我的椅子并且询问城里的人都在说些什么，比如说，关于那个新的管弦乐五重奏。或是关于广场上停车场扩建。塔尔暑假有什么计划？从现在到她应征入伍？她不觉得是离开对数，像其他人一样去看大千世界吗？为什么不是？大千世界有什么不好？她对拉美的一些东西感不感兴趣？

诺娅打断道：巴特希瓦·迪努尔给你打过电话。

我明白了暗示，回答道：那她是在找我了。好的。那样的话我就跟你们坐在这儿直到她再来电话。别让我妨碍了你们。继续吧。我就在这儿看看报纸。

有一次，开玩笑的，我早上喝咖啡时问诺娅她和她的印第安公主一起那么久都在密谋些什么。她是在说她的爱请问题吗？有什么关于吸毒的故事？有没有别的送上门来的纪念项目？诺娅脸红了，说：西奥。够了。这将惨淡收尾。而当她发觉我不肯松口时，就站起来开始变冷酷。尽管通常变冷是我的长项。

于是我决定后退，实行暂时回撤。我可能有机会什么时候和塔尔单独会面。或是自己去她妈妈的时装店给诺娅买条浅色几何印花的裙子作为惊喜的礼物。

现在我有自己要担心的事。纳塔利娅，那个星期五打扫办公室的年轻俄罗斯女人，把钥匙交给我说她不能再做了。这次我打定主意决不让步。稍加侦查就得到了棚户区小卖部的电话而他们答应，不无哄骗之功，去叫她来听电话。经过与害羞、礼貌、担忧和语言障碍的坚决斗争，我明白她无业的丈夫，在另一阵嫉妒的发作下，禁止她继续为我工作。于是我钻进雪弗莱花了整整半小时在棚户区游荡想找到那个丈夫的所在。我打算要说服他，但当邻居说纳塔利娅逃开他，去他住在广场附近租赁小屋——离我办公室不到两分

钟——的爸爸那儿过活时就烟消云散了。几天以后那个丈夫也搬进老头破败的小屋。到我找到那地方的时候，纳塔利娅已经离开回到棚户区去了。那个父亲和丈夫在同意拉开锁链让我进去之前从锁着的门里喊了五分钟的质问。原来我打断了他们正在玩的纸牌游戏，两个强壮、微秃的男子，像兄弟般的相像，两个都是圆脑袋大骨架，有健壮的举重选手的胳膊，笑的时候两排密密的尖牙，两人脸都是光光的，全穿着黑色T恤。出于什么原因，当我试图和他们谈纳塔利娅时他们爆发出潮湿、吵闹的笑声，像是我被在现场擒获。他们拍着我的后背，用俄语然后是我不晓得的语言然后又是俄语解释了些什么，之后又大笑了一通，露出肉食者的牙齿，然后用热情的手势和几乎野蛮的诚恳邀请我一起玩扑克牌。我待了一个小时左右，在那期间我喝了两杯伏特加，输了四十谢克尔。

自那以后我有时晚上去找他们，不言而喻是在诺娅出去的时候，至于可怜的纳塔利娅，很明显她已经离开，或逃走了，到她在加利利的哈措尔的姐姐那里去了。我在又输了两盘之后就从他们嘴里得知了这些。我喜欢在这些粗鲁男人中度过一两个小时。我几乎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喜欢他们雷鸣般的笑声、他们的拍打肩膀、他们的吼叫，他们用肘尖戳我的肋骨，伴着从小厨房飘过来的油炸的腻味的这个破败低矮的房间，是出于什么原因让我想起篝火旁，在加勒比海岸边偏远地区乡村旅馆的空场院子里和陌生人度过的夜晚。他们用辣味的美味无比的酸腌鱼和一杯伏特加招待我，我输掉五十或者八十谢克尔，有时我会卷入因他们嘲笑我听不懂他们的笑话而发出的粗哑的笑声中。我忘记了最初的目的是要消除他们的嫉妒，让那个丈夫带纳塔利娅回来然后让纳塔利娅回到我这儿并且在星期五打扫办公室。我的印象是他们试图用吼叫和滑稽的圆弧姿势告诉我纳塔利娅怀孕了，所以我追在她后面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她在加利利的姐姐马上也要有孩子了。但很难讲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还是我只是基于他们的手势和笑声自己编了一个故事。而且，事实上，这又关我什么事呢？

在这样的时候我几乎能看到她：才不过是一个姑娘，大约十七岁，金发，苗条，羞怯，安静胆小，她的腰和胸是女人的，但她脸上的笑是带着甜

甜的迷惑或是儿童般的惊疑的，即使是在她觉得我没在看她的时候。她的嘴唇在笑和笑之间皱拢像是要哭似的。无论何时只要我问上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比如她有没有父母，或是电暖壶里还有没有水，她就会变得煞白颤抖起来，仿佛她严重违反了礼仪，或是仿佛我提出了什么猥亵的建议，然后咕哝出一声微弱的道歉让我不指望得到她的回答，而且后悔当初提问题，继而掉过身去掩饰那突然把我变成犀牛的肉欲。当我知道她丈夫和他爸爸在摩尔多瓦老家都是技工，而来到以色列后就都一直失业时，我给穆奇·佩莱格打电话请他，算是帮一个私人的忙，看看可否给他们找找哪怕是临时的活儿。也许从某个和他整天同坐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的“解说律法圣贤之桌”的铲土包工头那儿找找。穆奇答应为我搞定此事，什么问题，像个火箭，尽管在我把他和路德米尔扔出委员会后我并不值得他这样；实际上，他帮的不是我的忙而是为了流亡者的聚集，就像犹太乘客要求空姐把她和他锁在飞机厕所里时空姐对他说的。然后他接着主动向我道出他要和杜比·维兹曼以及鞋店的皮尼·波佐合伙在本地兴办圆珠笔工厂的计划，是个真正的创新，这笔里有电子装置，这样如果你忘了把它放在哪儿的话只要吹口哨它就会冲你唧唧叫，而且巴特希瓦给他们又找了个投资者——也许是奥维埃托，我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三年内就会让钱最多翻两番，那是很保守的，因为实际上机会是我们两年半就能翻两番。

星期六我开始写下我的文件的开头。我从诺娅的一个小册子里找到在斯堪的纳维亚有针对十八岁以下的阶段式的住宿戒毒中心，并且正是在小城镇中，远离大都会，而且有成堆的证据说明他们很成功，甚至代表了一种聚焦该城市居民生活的社会和教育的挑战，并且有时候产生出一个“康复社区的繁盛榜样”，一个有了使命感和地方自豪感的支持环境。在我看来这个构想最适合特尔科达的就是社会实践伴以学术研究，而不仅仅是又一所提供毒品替代药剂比如 Adolan 或者美沙酮的供给站。经济方面来说，我们当然不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但从以色列中部富有家庭的孩子开始是讲得通的，而且，正如我向诺娅建议的，我们纳入两三个当地的孩子也很好，从贫困家庭里，收取象征性的费用。那会在这里扫清一些道路。那也许能提高我们的公众支

持率。但当我让诺娅看看这些要点时她说，别给我看草案。现在别给我看任何东西。不止是现在，西奥。你看不出我想安静地听听音乐吗？帮我一个忙，把唱片从头放起，行吗？

一时间我想提醒她，她每月还从奥维埃托那里，经手他的律师阿贝尔，收取三百元美元的支票；要是知道那是为了什么将很有趣，而有一天有人可能会问她她究竟用那笔钱做了些什么。现在她把一半的时间花在她的印第安公主身上，那个塔尔或是塔丽。从我办公室窗户中，我能看见她们同去发廊，看完午场电影从巴黎电影院出来，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柱子后面的情侣座里窃窃私语。有时我站起来锁上办公室，在吉勃阿店里买一份《晚报》，自己也上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去。我不加入她们中间而是在收银台附近找一处观望地点。杜比·维兹曼要是没事儿的话，会晚几分钟到。他有将军肚，满身汗毛，大汗淋漓，穿着布满灰尘的凉鞋，总戴着一顶尖帽，好像缠着金色发辫前面镶着闪光的锚的希腊船长；他坐下，给我们要冰可乐和一盘奶酪加橄榄，叹口气宣布：一个赌场，西奥，那是能拯救我们这儿的东西。不让特尔科达做一片坟场。一个赌场能带来游客、度假者、姑娘们，大钱会源源涌来，文化也接踵而至。对我来说，你是知道的，赌场是最后一招。文化，西奥，那才是目的。没有文化我们活在这儿就像动物。别把它当成是针对谁而发的。把它当做是思想的食粮。

几天以前他对我说：我每次去特拉维夫都注意到这座城市离我们更近了一些。霍隆附着在里雄莱锡安上。里雄莱锡安在向阿什杜德蔓延。阿什杜德将和克亚特嘎特连在一起。再有一百年特拉维夫就会到这来了，它会在一个早晨五点钟敲我们的门并说，早上好，亲爱的朋友们，醒来，我来了，然后就那样，流放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困在这儿的山峦下。炸掉它们，这些山脉能让人窒息。忘了它吧。咱们下一盘棋。你有时候没有觉得受够了吗，西奥？就把它当做是思想的食粮。

路德米尔有时候在广场上或是邮局外拦住我，许诺说他将改变世界并誓死和我欲图安在这里的蛆巢斗争到底，罪恶的城市所多玛和蛾摩拉，他对屈从于自己的一时糊涂而参加过委员会一事深感羞耻，而且他警告我，仿佛深

感遗憾，说“没有火哪有烟”。有几回，在厨房里，我有冲动想说几句真能伤害她的言语，就像往脸上抽的耳光。比如说，告诉我，你是否真的见过一个上瘾的人？就一个？远远的？也许，透过望远镜？就像你那位老呆在屋顶上他自己的轮椅里通过望远镜追随世界的父亲？而实际上，实话告诉我，你真能分辨出一个吸了毒的人和犯困的人或者仅仅有点智障的人的区别吗？你对它的了解程度不比我对爱斯基摩化妆品的了解程度多，你怎么有胆量挑起这个项目？而且是一个从未让你有一刻真正感兴趣的项目？这是否仅仅是一个从屋里出去的借口？是否仅仅因为你厌倦了终日教授文学？是什么让你把整个城镇搅得疯狂，而当应该卷起袖口干实事时，却决定换别的游戏而让我在你后面收拾残局？

我忍住了。

没道理引发争吵。

特别是我也冷落了她。我和她那个丈夫以及他爸爸共度时光，享受着腌鲱鱼和我已经习惯带去的伏特加。我痛饮俄罗斯浓汤，嘴里塞满布丁。突然发觉自己在发表概述，分期分批的，没有语言，用哑剧和支离破碎的词汇，讲述犹太复国主意的努力，沼泽，地下活动，非法移民，英国人，纳粹，胜利，西墙，恩德培，西岸定居点。这两个人看着我毫无意外之感但也没显出什么兴趣，他们并未停下大力的咀嚼，还偶尔爆发出我无法与自己的演说联系起来的疯狂的大笑。上次去的时候，我玩扑克时想办法从他们那儿赢了五十谢克尔，他们俩笑得都喘不上气了，拍着自己的膝盖和我的后脖颈，捶打我的后背，几乎停不下来。但是，星期二我还是到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坐上几小时，和杜比·维兹曼下象棋，与几年来的所为一样。我几乎每天下午都自己一个人到废屋去走一走。尽管我不再拿着素描本和铅笔。仿佛我已失去了线索。

穆奇·佩莱格激动地打来电话：他想办法给我的两个俄国农民争来一个试用资格，一周，本·埃拉车库的雅克·本·卢露，那个圣人，答应给一点点工资，让他们展示一下能干的活儿，就像希腊女王对她的三个土耳其人说的。你不知道那个吧，西奥？好的。到时候告诉你。你就记住一个土耳其人

跟一个希腊女人与路德米尔和采石场的关系有相似之处。要点是，告诉他们明天早上七点到。你觉得我怎么样？难道不是化装成乡野圣人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吗？

我说：没有人像你这样，马拉基。

穆奇道：这样也好。

尽管有那些破碎的瓦片、蜘蛛网和厚重的灰尘、缺失的窗户、断裂的碗橱、裂了或是被偷掉的洗手池和厕所的盥洗盆、在沙漠风损害下呻吟的屋顶、肮脏的注射器和一块块沾血的棉毛片以及小便和干了的湿胶布的恶臭，我最终还是开始觉得这房子买得很值，因为它建得很实在。坚固而大方。房间又大又高。墙壁厚实。所有房门都通向一个中央空间，建筑中间的一个很大的厅。这个中央空间幽暗而令人愉悦，在最严酷的热浪里也能保持一丝温和的凉爽。它的某种建造元素让我想起战前阿拉伯式或是美国式的房子，或是耶路撒冷的德国租界。拱窗的深度。走廊的弧度。地上铺的石板。在大花园里密密地长着一打松树，它们的树干因为南风而倒向北面。树比瓦屋顶还高而树阴将房子围在中间。每一丝微风都让树阴轻轻颤动。透过松针的一股柔和的光，你背后的一阵压低的轻语，和一片变化无穷泛着片光涟漪的阴影之河，在墙上游戏。有时这样的动静使你产生有人在邻室踮脚走动的紧张感觉。耀眼发热的夏季阳光在松树周围泻下，但花园和房子各自立在阴影中，像是飞来的冬季之域。沉入他自己的海底，诺娅说过，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摸了摸窗棂未发一言。

昨天早上六点钟我往雪弗莱里装上一把铁锹、一个整枝大剪刀和一把锯，从本·埃拉车库借出我那两个俄国举重选手，我们花了七个小时把松树间的脏东西清理干净还修剪了树木。午后琳达和穆奇出现时——说是他们刚听说我在修筑塔楼栏杆的居留地于是赶来帮忙——一切都完工了。我们甚至把我觉得太倾斜的树干都撑起来了。星期四的时候会来一个贝督因包工头，是杜比·维兹曼的一个朋友，来开始搭建新围栏并且装一扇熟铁门。

然后我就要重新弄一下整座房子，让它适合新用途。

但它的用途是什么？我不再有清晰的概念。我也还没有完成备忘录的起

草工作。我失掉了线索。

琳达仍然自愿打出我在办公室要求她打的信件，然后我们发往各个机构。但理念变得越来越模糊，仿佛意义已然褪去。而现在我们引起了路德米尔火山般的愤怒。在他在当地报纸的专栏“野外来声”里，他称我为可疑分子。他将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的捐献定为毁灭一切的武器贩子的肮脏钱财。我应该刊一份反击文章，但想不出来该写什么。我再次丢掉了线索。至于奥维埃托，他消失了。他可能已经回尼日利亚去了。这一回他显然还带走了他的律师。款项仍然没有兑现。也许就从未存在过。但纳塔利娅突然从加利利回到我们身边，怀了孕而且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漂亮；带着那纯真的表情和疑虑她给我端了一杯很浓、很热的茶，不知为什么这让她丈夫和他父亲笑得喘不上气来，而这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感染了我，而她则满眼泪水。但我没有卷进去，没有试图保护她或是安慰她，而是欲火缠身。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听到的伦敦来的广播，关于阿尔玛·马勒的生活和爱情。主持人将给听众讲述真实的她。我觉得“真实”这一提法是滑稽的但我想不出用什么替代它。人们又怎么能知道呢？

我在一片纸上写道：家具。设备。冬季取暖问题。大锅饭还是单独供应？内部改造。测量。布线。下水。供水。屋顶。铺地板。窗户上的护栏？合适的柜橱。电话线。一个治疗室？一间教室？一个看电视和录像的空间？电脑？俱乐部活动室？图书室？

这一切都在我们准备真正运作计划之前。但运作什么？又和谁一起？我内部垂下了一扇帘子，像一阵季风。仿佛这座空楼自己就是终结。也许是坐下单独和奥维埃托谈谈的时候了。试着一劳永逸地测出他的目标。在特拉维夫？或是也许在拉各斯？也许我很快会飞去见他几天。背着她。但不知为什么我仍旧躲着这个念头。若是我设想我们两人在她背后见面，那幅图景在我体内激起的是恐怖和羞耻的混合。仿佛我在计划欺骗她。仿佛我编了一纸谎言以便能和另一个女人独处。

于是我打电话给杜比·维兹曼把那个贝督因包工头和工人暂时往后延。星期四太仓促了。即便下周也太早了。在不存在的东西周围加上围栏有何意

义？围着一个梦想？我还没忘记她多年坐在轮椅上待在屋顶的残疾爸爸，越来越重，像个败了阵的摔跤手，从他望远镜的镜头里追随着世界的变化。要是那个屋顶有适当的栏杆，那个老人现在可能还活着。推土机不会铲平村边的那所房子。收集的明信片不会捐给托尔斯泰农场。而她将仍在那里，不在这儿，毫无疑问还在照看他，替他担忧，喂养他，扶他上床，给他换尿布，一天五次。

签合同那天我在特拉维夫给她买的新裙子有个小缺陷：屁股后面不能完整垂下来。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让葆拉·奥莱芙把它改一改。不知为什么想到她的手指要碰这条裙子就让我恶心。不知道那个印第安女孩塔尔是否从她母亲那儿学会如何弄平腰线。或者借着什么奇迹，纳塔利娅，我那怀孕的处女，能使针弄线。

但是诺娅今天晚上穿裙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缺陷。我们去高尚区的德莱兹纳大夫家听新五重奏的私人音乐会。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我几乎想阻住她指出腰线不直。最终我决定一言不发，这样就不会迟到，不过也因为这几乎注意不到的缺陷有着某种让人愉快、令人感动的东西。而且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它。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不要紧，诺娅注意到之前随它去吧。如果她没有注意，就不碍事。

他左膝裹了一个毛糙的弹力绷带，因为有一处老伤。午夜时分，我们从朱丽娅和雷欧·德莱兹纳家的音乐之夜回家后，又开始疼了。夏季刚过一半，而他已经得到了遥远冬季的信号。我让他坐进一把扶手椅，除下绷带试图用按摩来打散疼痛。他把手指搁在我肩上说，对，继续，起作用了。西奥，我说，这个膝盖比另一个热一些，你明天应该去一下健康诊所。急什么，他说，它时好时坏。

他站起来给我们冲了草药茶，关掉了顶灯。我们在厨房传来的柔和光线里坐着待了一刻钟。窗子和阳台门开着，迎接夜晚的和风。东边的山那边传来狐狸隐约的呜咽声，然后自以为是的狗马上在房子周围号叫起来。我用温热的肥皂水洗了弹力绷带，自信在沙漠的空气中它明天早晨就能干了。之后我冲了个淋浴，接着西奥也冲了个澡，然后各自就寝。在我快要睡着，或是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一个压低了的女人的声音，压抑着某种模糊的兴奋，从他房间传到我这儿：深夜伦敦的新闻。

第二天我和塔尔上巴黎电影院看了个午场电影。电影是关于背信和复仇的。之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喝着冰咖啡坐了一个半钟头。然后我带她上波佐的鞋店，因为我决定给她买双新凉鞋，带跟的。她有时候看起来就像个十岁的孩子，特别是从后面看时。那个印第安公主。西奥说，你们整天都在策划什么，她没有同年龄的朋友吗？

我们选了一双浅色、侧边有蝴蝶形状系扣的凉鞋。塔尔不让我给她付账但我坚持。

皮尼·波佐说：我也有特别配你的。试试这双。没关系，就试试大小。

最后我给自己也买了一双新凉鞋。是平跟奶油色的，有编成麦穗状的带子。

过了一会儿我们在广场上遇到西奥。他提出要请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喝一杯冰咖啡。我们笑了起来，说，你太晚了，我们刚从那里出来。我问他觉得我们的新凉鞋怎么样。西奥耸耸肩，说，合适，好极了。他眯起那只多疑的眼睛，就像个吝啬的农民：你们现在去哪儿？然后他又耸了耸肩总结道，好吧。我抱歉。我没问。只是别忘了你的数学考试。对数。其实我本人什么时候可以帮你准备那个考试。我想我还记得一两样。回头见。

他整天都干什么？他好像没再得到什么新项目。现在是夏天。他还有几项工作要结尾。他每天早晨八点半开始办公，打开强光灯在本－古里安坚定注视沙漠之景的照片下坐到制图桌前。他涂下几何图案。或是站在窗前注视广场上的生活。十点时他下楼到吉勃阿店里买报纸。然后围着广场走一走又回到他的办公室。不久前他告诉我说他主动帮助他的清洁工解决了家庭问题：他给她的丈夫和她公公找到了临时工作。实际上，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拿起电话，是穆奇·佩莱格安排了一切。尽管我想知道但我没问及细节，以免他觉得我在盯着他。

上午我到来图书馆角落里正对着空调的桌子，坐上一两个小时。而老图书馆员，阿玛丽亚，在她的柜台后面打盹儿，干瘪、灰色、皱纹，她的嘴唇缩进腮帮子里像是在嘲笑我；她时不时地发出一声鼾声，醒来，愁闷地瞄我一眼然后下巴又陷下去，再带着压抑痛苦般的表情合上眼睛。她一度曾是市政园林部门的领导，就是她种了一街的棕榈树并造就了创立者花园；她收养的一个贝督因孤儿最后长大移民了；她和巴特希瓦吵了一架然后提前退休了，得了糖尿病垮下来，年初的时候自动请缨要帮忙改造图书馆。但读者人数在下降。阿玛丽亚往整洁、照明充足的阅览室里摆放了几十盆精心照料的室内植物，它们长在装满细沙的花盆里，被试管里配上肥料和矿物质的蒸馏水浇灌，仿佛这里已由图书馆变成了温室或是茂密的热带雨林。爬山虎和蕨类植物枝蔓四散，在格架上爬进钻出，进军书本，将日光灯变作黯黑的植物汁液。但除了我和一些退休的人还有一群怪异的年轻人之外很少有人来。空

荡荡。大部分的上午都只有病怏怏的图书馆员和我自己。

这几周来一直为我保存在一格特别书架上的那些关于毒品、上瘾和治疗的书已经打散又放回它们原来的位置了。现在我得为新学期做准备了。但是着什么急呢？除了比亚利克的诗之外我还选了几本关于音乐家生平的书。也许是因为牙科医院的朱丽娅和雷欧·德莱兹纳打电话要我参加一个帮助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的音乐家融入社会的委员会。有个要在高中、工会和市政当局的协作下建立一所小型音乐学校的计划。有可能会把入境和文化当局拉进计划中。大家策划了一个下周和巴特希瓦的会晤。我被委派起草一封致那些古典音乐爱好者们的信，以便找出能做贡献的人。琳达自愿打出这封信，而路德米尔和穆奇·佩莱格会分发五十份。

我终于坐进自己靠窗的角落里，穿了一条花花的夏裙，浏览着书页并时常在这儿或那儿停下来看两三页关于勃拉姆斯对克拉拉·舒曼的奇特爱意、莫扎特的疾病和死亡，以及微胖羞涩的舒伯特，除了他母亲，别的女人是否爱过他很值得怀疑，他还把自己的创作称为是二流的和短命的；三十一岁死于斑疹伤寒前他只在公众音乐会上出场过一次。我的眼睛离开书页滑到背阴的植物上。我记起父亲的明信片收藏。阿玛丽亚两眼空洞地盯视着前方，像是很痛苦似地蜷作一团。她的头发稀少而干枯，在日光灯下她的脸颊像尸体的脸颊一般深陷。穆奇·佩莱格有一次告诉我，五十年代在贝尔谢巴，她是沙漠之花，她离了婚，再婚，分居，在葡萄酒节游行中穿着睡衣在桶上跳舞，让所有男人回头望，诱惑打井工人，和一个著名诗人同居。过了那些年，病痛蹂躏了她而现在人们在她背后称她为“巫婆”。

空调哼哼唧唧响了一下。从远处，沙雷特街的方向，传来沉重的挖路机的轰响。尽管如此，奇迹似的，阅览室里充满了幽深而完全的寂静：当我翻书的时候你能听到每一页发出的沙沙声。在垂下的窗帘外面，太阳在无情地烘烤着。一种暴烈的光笼罩一切。山峦顶峰的光环在烤焦了的沙粒中变得模糊。在一本题为《献给音乐的词句：从莫扎特到马勒的德意志浪漫曲》的书中我看到一首约瑟夫·冯·艾兴多夫写的 1840 年被舒曼谱成曲的名为《月夜》的诗：

微风轻抚田地，
麦穗微微摇摆，
林子柔声沙沙响，
满是星空的夜晚。

我的灵魂舒展，
她的双翼张开，
翱翔在寂静的地域，
仿佛飞往家园。

我合上书，胳膊放在桌子上掩住了脸。哪有[1]：没有火的烟。图书馆员阿玛丽亚走过来，朝我弯下身来，摸了摸我的肩膀。她看上去像一只濒死的鸟儿，下巴上悬着一块晃悠的嗉囊似的东西，但她的声音温和而焦虑：你不舒服吗，诺娅？要我给你冲杯咖啡吗？

我说：没事。别麻烦。已经好了。

她冲我咧开一个没有嘴唇的笑，骷髅的笑。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这并非绝望之后讽刺的轻蔑鬼脸，而只是疾病和年老造成的脸颊干瘪。塔尔要参军了阿弗拉翰消失在非洲西奥将关闭他的办公室把自己日夜交给伦敦的广播，紧张的日子过去了夏天会结束年复一年而我将在她的位置上，在已经变成了丛林而她那些叶子终将吞噬一切的沙漠图书馆的桌子后面。

这时琳达和穆奇，晒黑了还咯咯笑着，从萨法德附近度了个短假回来了。穆奇结束了他对我半戏谑的追逐。也许他终于在那儿爱上了琳达。还是我开始丧失吸引他的不论什么东西？这个变化令我难过，尽管我从未喜欢过他的追求。我跟塔尔开玩笑似的说了这个，垃圾，诺娅，忘了吧。那就是个小游戏，但还是很遗憾你把头发剪得这么短。以前，你的头发时而落到一边

①原文是 Noa：smoke without a fire，女主人公诺娅的名字与俗语的两个单词重叠形成双关语，汉语可以理解为——诺娅：没有火的烟——译注。

脸侧的时候，好看得多。

那她呢？她为什么决定要把头发剪短？

因为她不再"满心关心那些事儿了"。她只想要和平和安宁。她和一个什么人两个月前才分手；一天早晨她醒来发现自己一直在喜欢一个混蛋——"就像我们跟你学的《仲夏夜之梦》"。现在她只是对此厌倦了。她想至少在参军前在外面待一段。要是她能在这段时间里找到一份业余工作就好了，比如在什么办公室里干上半天。她不讨脑袋空空只知道比赛军队侦察连、赛车和赛摩托的男孩子们的欢心。而这里基本都是这样的货色。事实是，自从我们聊起来以后，她发现真正吸引人的是那种更成熟一些的男人。更接近那种懂得付出很多也想得到很多的人。就好像西奥，只是不要那么老，如果我不怪她这样说的话。西奥给她的感觉是那种内向忧伤的人。而她认为那是一个男人最美最吸引人的。只是在他身上还有一点冷和漠然，类似的东西，抱歉这么一直胡说八道。

我说：你瞧，塔尔，关于西奥，然后我停住了。尽管实际上我想不停地说啊说下去。

但不是现在。为时尚早。

穆奇抓到我时我正走出沙兹伯格的药店，店里还贴着去世的古斯塔夫·马尔莫莱克褪了色的讣告：听着，亲爱的。商量一下。你能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和我谈五分钟吗？琳达和我一起到梅隆山旅店度假时，第一天她就病倒在我身上。食物中毒。很严重。我省去细节。开始时我想，完了，你可真陷在这里了，这就是你要的，哥们儿，不作乐而是给她换尿片，跑去给她端热茶、煮土豆，到萨法德的药店给她拿药，给她洗内衣，因为显然她带的不够穿。但最后，你不会相信的，我竟然喜欢上这些了。也许我变成受虐狂了。我们不是没去享乐，别误解我，第三天时她已经健壮得像头小母虎了，而那时我就开始打击她的火花，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只是，很有趣，她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离她很近。你怎么解释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把这些告诉西奥。我提醒到他曾经答应带我去加利利。我们也去北边如何？去萨法德？或是戈兰高地？或是赫尔蒙山？不开你那辆破雪

弗莱。这次咱们租辆车。咱们轮着开。要不要带上塔尔？如果她想来的话？

西奥说：是可行的。

但日子过去，不论他还是我都没有提起北上的旅行。

上周末我们参加了巴特希瓦·迪努尔母亲的葬礼。她在睡眠中死去。她被葬在最后一区松树下的那一排，越过老伊利亚和伊曼纽尔·奥维埃托以及他的处女姑妈埃拉扎拉。图书装订商卡什纳致了辞。他提到在病重以前她数十年一直是吉夫阿塔伊姆工人子弟学校的一名历史老师和热心的教育工作者，还长期给《教育回声》投稿。他精细地勾勒了她的晚年，巧用暗示，还把两首赞美诗各用一半连了起来。他说，莫在晚年抛弃我也莫夺去我之圣灵。他和祈祷者的大部分话音都被低低地盘旋在满布灰尘的天空里互相追逐的喷气机的轰鸣声吞没了。

几天以后我们上巴特希瓦那里致哀。费了很大劲才挤进去。房子里和花园里全是访客，她的孩子们，孙辈们，儿媳妇们，姐夫妹夫，朋友，表亲，从永远敞开的大门涌进整个特尔科达以及附近的贝督因人，再就是邻居，像个盛大婚礼。我不认识的女人掌管了厨房，往花园和各个房间里发送出一批批饮料。我们努力推开人群走到巴特希瓦身边；发现她坐在花园里她的皇位里，在无花果树的树阴下，被一大群乱糟糟的亲戚朋友包围着。花园里跑动的孩子数量惊人，吵闹着互相追逐，但巴特希瓦看起来似乎喜欢这种骚动。一个熊一般的、长雀斑的女人，坐在一张天鹅绒面的旧扶手椅里。她平静地同时主导着四五个不同的谈话，在不同的方向，有关道路、生育、聚会政治、她母亲在斯摩棱斯克的童年、预算和菜谱。当轮到我们表示哀悼的时候，她说：嗨，看看谁来了，我那一对瘾君子，拉两把椅子，帮我拿一下这块蛋糕，你们一定得尝尝我的一个好朋友今天给我带来的橄榄，从加利利，戴尔爱拉阿萨德。来，来这儿，纳瓦夫，露个脸，这不是橄榄，是纯粹的狂喜，橄榄的精华。要是妈妈能尝一口的话她会一下子吞下整罐。她就是对辣味的碎橄榄、再加上点花式奶酪和一杯葡萄酒上瘾。无论如何，我们应在人死之前开这样的聚会，不是在死后，那样他们就明白要离去的想法多么愚蠢——那样人就死得少了。顺便说一句，那个计划，前天阿弗拉翰给我打了

个电话。一个多么高贵、悲惨、迷人的男人，我都已经爱上他了。你们不知道他也参与了解救叙利亚监狱里在押犯的行动？而且还收集在行动中失踪士兵的信息？我们在电话里互相聊了半个小时，而且我想我已经成功劝他放弃了瘾君子的计划转向学校电脑化，那将是他对儿子的纪念，真遗憾我不认识那孩子，我本可以管住他不让他自杀的。问题是你们困在了阿尔哈里奇老屋上。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但是别担心，它将自行解决；我想我找到了一个让你们脱开它又不会口袋空空的办法。关于这咱们下周谈。不是那个奶酪，诺娅，西奥，先吃咸味的，我在罗什皮纳的孙子自己做的。那可不是一块奶酪，是一首交响乐。那个给我做它的孩子在哪儿呢？艾塔姆？叫他过来打个招呼。路德米尔来了，过来坐下，野外来声，坐地下吧，你应得的，但首先你得尝尝我的一个朋友从戴尔爱拉阿萨德给我带的这种橄榄。

关于阿尔哈里奇老屋的拉锯就这样退出了日程，并且再也不会有什么改建了。在那个姑姑原来的公寓里开了一家叫“象牙”的牙科诊所，但最终发现还是德莱兹纳和尼尔大夫的：他们从西奥办公室旁边的老地方搬出来了。老卡什纳在锁了的店门外贴了一张告示：“商铺出售”。人家说他决定要离开特尔科达，他没剩下什么顾客了，所以他要离开去基德拉同女儿和外孙生活，尽管另外一些人说他是到那里的养老院去；他十年前给自己登了记现在轮到入院了。

沉重的掘土机从早上六点钟开始轰鸣到夜幕降临，并且卷起灰烟，在艾什克尔街尽头：他们终于要用一条往西拐的新路把它和本－兹维大道连起来。一大群乌鸦在灰云上盘旋。他们在交通灯边的广场上架起新照明设备的柱子，和大城市里的那些一样。朱丽娅·德莱兹纳要召开入境移民音乐家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薇欧莱特和玛德琳，互为姑嫂的理发师，在扩建香榭丽舍发廊，从今以后会添一个高级美容院。创立者大厦里很快会开一家西餐厅，而且他们可能决定要在玻璃展示柜中永久地陈列矿石。秋天时交通灯边上会开一家乐器店。城里日新月异。而西奥和我接到一封律师仑·阿贝尔的挂号信：考虑到反对势力和复杂状况，现决定将纪念计划暂缓六个月。同时探讨替代项目。奥维埃托先生会再写一封信函。计划并未搁置。至于存在于

双方之间公开的经济问题，将会以双方皆满意的方式尽快得到解决。相关各方将尽快基于情况变化之后的评价，以及多种可能性和替换方案的全面判断综合出一个意见。而我们被致以热诚的谢意——感谢我们的努力。

这时穆奇·佩莱格在和贝尔谢巴超正统派的团体接洽，原来他们热切希望购买阿尔哈里奇老屋，以便给俄罗斯移民的子女办一所教授犹太价值观的寄宿学校。他们愿意出我们购房时同样的价格。当然一切生意还没敲定，穆奇解释道。这时，一切公开，而与黑袍人的讨价还价是取决于我们的。在非洲的“上帝先生”确定对他曾想在这里建造，而最终因之将我们吊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项目后悔的前提下才会进行。就现在事态状况而言，我们有点困在其中：屋子在我们基金会的名下，钱是你出的，西奥，我们从阿弗拉翰那儿得到的只有口头承诺，倒是有一封他的律师来的信，但我不清楚它在法律上的价值。如果我们决定卖给那些圣教会的人，我照样也不会从这笔买卖里提成，尽管我现在手头真的挺缺钱的，因为琳达和我正筹划秋天上意大利开心地转一圈。你们俩干嘛不也结婚？这样咱们四个就能把罗马涂成红色而且在那儿告诉他们 dolce vita[1]的真正含义。在提图斯凯旋门下与牛奶和蜂蜜一起漂浮，如果你懂我的意思。事实是，摸着良心说，如果我们三个，我们四个，决定不放弃，管它会发生什么，我相信能建起诊疗所，无论如何。要我对你说两句掏心话吗？我们应该推进这个项目。我们应该为它而战。我们应该把城里搅翻天。这比将要用弥赛亚之类的东西毒害年轻人却不救他们于毒品的寄宿学校重要上千倍。我们应该寻找投资人，或是捐款人。组织针对巴特希瓦和官僚们的公众压力。不放弃。囊入一些这儿并不缺乏的好人。要我再说句掏心话吗？我们真正的悲剧是我们不是极端渴望做些什么事。那是真正的灾难。当你不再热切渴望着做些什么事，你就冷下来开始死亡。琳达这么说，而我想我同意她的说法。我们得开始渴望什么。用双手抓牢，这样人生就不会溜掉，如果你懂了我的意思的话。否则一切就都结束了。

西奥说：这会儿先别卖。如果阿弗拉翰·奥维埃托退出的话你的基金会

①dolce vita，意大利语。意思为“甜蜜的生活”——译注。

能找到另一个买主。

什么买主？卖多少钱？

我。而我们同意那个开价。

我晚上回家后西奥说，我对他那样说真怪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们喜欢那所房子但拿它干什么用？诺娅，你明白吗？因为我一点不明白自己的想法从何而来。

我说：等等，看吧。

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在日光渐柔并开始变蓝的时分，我们觉得想到那里去。呻吟的雪弗莱又点不着火了。于是我们走着。没有取道交通灯旁的广场而走了土路，那条挡住禁区峡谷的悬崖脚下的弯路。几丛黯黑的、被风吹乱的灌木在山顶上起伏，因为一阵强南风时不时吹起并把周围扬满成千上万尖利的沙尘，仿佛要变作雨倾泻而下。狂暴的风间歇地摇撼着山顶沿线的灌木，迫得它们弯下去，在痉挛的舞蹈中前合后仰。穿透一切的沙粒刺透我们衣服下的皮肤，满塞在头发里，在齿间摩擦，直冲眼球仿佛要把我们刺瞎。时而空旷的平原上穿过一阵低嚎。停住。接着又开始抽打和折磨久经蹂躏的灌木。我们向南缓缓前行，仿佛奋斗着逆流而上。我们绕过公墓。从墓穴那边传来被风摇曳的松树发出的悲叹。这是个小小的，新城，死者还不多，几十个，也许上百，除了波佐的小孩以外没有一个生于此地或与父母葬在一处。我爸爸和楚玛姑妈，他的姐姐，葬在我出生的村庄边上不受注意的墓地里黑暗柏树下的荨麻丛中。我妈妈应该在新西兰，那里冬季时这儿是夏季，而晚上时这儿是白天，也许在夜里雨滴落在她墓上，而我不知道名称的树木相互耳语又住口。一个星期六，我们去城北一处干涸河床散步时，遇到一处贝督因人的坟场，一堆堆终被沙砾覆盖的灰石坟头。那些也可能是早在贝督因人来之前就在山间空地里生活又死去的古老游牧民族的遗迹。

走到通往采石场的拐弯处时，我们取道岩石间向西的小径。风，刚才直吹我们脸上，现在从左边袭来，将我们向黑不见底的峡谷边缘推搡。光线渐暗变得混浊；沙漠模糊了，太阳将其染成一抹奇异的稍带紫色火焰的灰红色；它往下落，直到我们可以直视着它而不觉晃眼。一片微弱的、致命的大

氅在西边铺开，像是燃烧的化学试剂。然后它落下去了被平原的边缘吞下。

我们在最后一丝天光下走到了老屋。那儿有一股酸而湿的气味，尽管建筑向着风四敞洞开。我们从一间屋摸到另一间，踩着一堆堆的垃圾然后猜想我们可能看到面前有闪烁的黑影：借着余光映在墙上的花园里被风抽动的树梢的倒影。但不是：这次我们看来真的打搅了一对未被邀请的客人，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模糊，缓慢，我们显然把他们从熟睡中惊醒了；他们盯了我们一会儿，仿佛我们是幽灵，然后他们从东边墙上一个窗槛里跑走了，接着消失在黑暗的树木中。

西奥用展开的手指触摸我的后背：我说，诺娅，你得明白，那个男孩死了。我轻声回答道，我知道。知道？那就说出来。但为什么？说出来，诺娅，那样就是你自己的声音了。

我们站在那里等着天凉下来。

我们十点钟到家。我们穿过城里回家，穿过早已空无一人、被风吹纸片和随风飘落的沙尘吹打着的广场。我将胳膊绕在他的宽皮带上感受着旧皮革和汗水的味道。为防沙尘暴我们赶紧关上所有的百叶窗和窗户。西奥做了一份很棒的色拉，衬着一个雕成玫瑰花蕾的小萝卜。他做了个炒蛋，还拿出切片面包和各式奶酪放在木餐板上。我冲了两杯草药茶。我们放上一张唱片，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弥撒曲》，我们在厨房坐到很晚。我们没有讲话。也许我们会租辆车去加利利旅游。我们将住在村里的旅店里再去约旦的发祥地附近透过茂密的植物看日出。回家以后塔尔可以给我们拿来她许诺过的小猫。西奥给她一份琢磨他办公室的零工，直到她去参军，而他同时会帮她准备数学考试。我们要给她买一件漂亮的外套和裙子换下她膝盖裂口的破烂牛仔裤。我想起这天晚上在老屋那里打搅了的黑影。他们可能去了黑暗笼罩下的干涸河床底部，现在他们已走到海耶纳山腹地了。他们也没准栖在了树林里。或者在我们离去后又溜回到老屋里，现在已经躺在粉墙下的阴影中，头枕着腿，在平和中做上一个寂静的梦，远离他们自己，远离痛楚和悲伤，听着穿过老屋花园里蜷曲的松树顶端继而席卷全城又触摸我们合上了的百叶窗的那阵阵时吹时逝又再卷起的南风。要是你愿意，就能听到呼啸过低矮的灌

木。如果不，你不必去听。再过两周半暑假就结束了。所有好心人到处都能遇到好心。今年我也许会答应当一个正式的教员。现在，今晚，我要让他抛掉伦敦，因为我要冲一个澡然后摸黑去找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莫称之为夜晚
作者＝（以）阿莫斯·奥兹（ＡｍｏｓＯｚ）著
页数＝１５７
ＳＳ号＝１１７６０６２３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５９９２００２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６月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